

V  
21

# 目 录

东胜县社会自然状况 ..... 吴尚书 (1)

解放前夕东胜城关概况 ..... 边崑山 (12)

回忆东胜抗日一战 ..... 任继才 (24)

抗日战争前后的回忆 ..... 李先唐 (31)

抗日战争时期东胜县军政情况片断  
..... 李静泉 (43)

东胜军民守城抗日 ..... 郭歧山 (53)

东胜县“九·二八”事件的经过  
..... 马平 王金虎 (56)

我是怎样投诚起义的  
..... 孙风洲口述 吴尚书整理 (78)

东胜市第一小学校史 ..... 刘继祖 (82)

河西师范学校始末 ..... 王昕 (97)

古老的民情风俗 ..... 王之平 (110)

宗教信仰 ..... 王之平 (133)

百年以来东胜地区的植被变迁……刘懋功 (137)

解放前东胜县税收情况

……张泽源 王森柳 (142)

东胜县“九·一九”起义前后

……边媚山 (144)

人物简历介绍……刘继祖 (160)

刘牛的一生……刘懋功 (178)

我是怎样当选为国民党国民代表大会

候补代表的……郭岐山 (219)

高广俊在十六团是怎样活动的

……杜炳彦 王金虎 (226)

国民党东胜县党部概况简介

……陶立栋 李振华 (234)

解放前夕伊盟的灾荒与救济工作

……王森柳 (242)

责任编辑：程权胜、王宝珊、田永祥

# 东胜县社会自然状况 概要记述

吴尚书

东胜县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居伊克昭盟东部，乌兰木伦河上游，包头之南、陕西神木、府谷、榆林之北，是伊克昭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为了解东胜县的社会自然状况，现据有关史料概述如下，以供参考。

## 一、东胜县的由来

东胜原无建制，所辖境内为郡王旗和札萨克旗之牧场各一部。

清初，为开发地力，移民实边，设立山西归绥道垦务局，将大批陕北和晋西北农民迁往塞外开荒种地，由清王朝委派封疆大臣绥远将军主管其事，东胜为垦区之一。其范围东至准格尔，西

至乌审、鄂托克，南至神木、榆林界，北至杭锦、达拉特，东西广二百一十五里，南北长二百二十五里，面积约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平方里。

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绥远将军贻谷大臣看到东胜垦区境内居民约七八千家，为管理政事、民事之便，奏请清廷将垦区划为政区。清廷准奏后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在今板素壕设厅，名曰东胜厅，属山西归绥道，为口外十二厅之一。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改厅为县。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晋绥分治，属绥远直辖。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废特别区设立绥远省，东胜仍为绥远省之县治。但匪患时闻，地方荒凉，历任知事大都侨居距县二百里外之包头而遥治之。民户由原有七八千家减少为四千四百三十余家，“地荒十之六，民亡十之五”，盗匪烽起，民不聊生。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绥远省主席李涵础命令东胜县长移居县境理政，当任县长王文泉走马上任，

在陶油房设办事处，并于七月召集地方人士设董事会在现市区内筹建东胜县城，于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十月正式建成见方一里之东胜土城，从此东胜人民有所依障，成为国民党时期伊克昭盟的政治重心。

## 二、东胜县的建制

东胜县东至克善壕准旗界四十五里，西至乌兰淖西岸乌审旗界一百七十里，南至推磨铁井陕西神木县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包头县界四十五里，距包头县城二百四十里，东北到准旗界六十五里，西南至阿拜素陕西榆林县界三百八十里，东南到陕西府谷县界一百七十里。西北到珠拉敖包乌审旗界二百二十里。全县境先分为东西南北及五六台等五个区，编为三十四个乡。到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划分为三个区，三十个乡，八十五个村。即：

第一区在北，东至东神山，西至板旦梁，东西七十五里；南至色连，北至包头境达拉特旗

界，南北七十里。其面积为五千二百五十方里。乡有隆胜兴、咬来色太沟、水头沟、板旦梁、铜匠沟、不彦门肯、土亥沟、倒劳沟、阿不亥等九个乡。

第二区在南，分三段：第一段北至板旦梁，南至古城壕，东西三十里，南北六十五里，其面积一千九百五十方里。第二段隔陕西神木地三十里，东至补连塔，西至莽盖兔，东西四十五里，北自书会庙至南界二十里，其面积九百方里。其西南隔札萨克旗地三十里，又有讨害兔万寿地一块（备作与西太后拜寿之地，故名万寿地），是为第三段，面积一百方里。以上三段共计第二区面积为二千九百五十方里。

乡有古城壕、海子村、察汉素、陶油房、孔独伦沟、补连梁、木独十里、马成壕、莽盖十里等九个乡。

第三区在西，亦分三段：第一段东至板旦梁，西至白彦脑包，东西六十五里；南至讨好漫、北

至十大股，南北五十里，其面积为三千二百五十方里。第二段由白彥脑包西南隔郡王旗地二十五里之地，名五台地，南北四十里，东西四十里，其面积为一千六百方里。第三段偏西南隔乌审旗地六十五里之地，名六台地，东西四十里，南北四十里，其面积为一千六百方里。以上三段共计第三区面积为六千四百五十方里。

乡有广成永、石畔山、十大股、段拉圪堵、白家壕、杨四圪台，白彥脑包、主兰脑包、旧庙湾、台奈石梨等十二个乡。

以上三个区为东胜县之全境，总面积一万四千六百五十方里，四千一百二十户，三万一千五百五十四人。蒙汉杂居，汉民多系陕西府谷、神木及山西河曲等县人，居住分散、各村多系二、三户为一村，沙崖土穴、状如晨星。

### 三、财政税收

县内地方财政收入名目有六种，计：田赋附加、地亩捐、牲畜捐、油房捐、戏捐及地方公

产等。其征收情形，田赋付加由县政府随粮代征、每良一两、付加三分。地亩捐、牲畜捐、油房捐、戏捐均由各乡起收，交各该区经管。标准：地亩捐每良百两，收洋三分；牲畜捐牛马一头，年捐洋三角；油房捐分三等征收，一等年收洋六元、二等四元、三等二元；戏捐每演一日收洋一元；地方公产每亩租洋一元，由县政府经管。

据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统计，全县地方财政之收入情况为：田赋付加收洋二十元，地亩捐收洋四千五百元，牲畜捐收洋二千六百元，油房捐收洋五百元，戏捐收洋五百元，地方公产收洋六百三十三元，以上合计共收洋八千七百五十三元。

全年支出，以保卫团经费为最多，共有团丁五十人，枪械四十一支，子弹一千三百四十发，骑马五十四匹，年支经费四千零八十元。其次是公安经费，共有警官二员，警察十九人，枪械十一支，骑马十九匹，年支经费二



百二十元。各区公所，每区各设区长一人，助理员二人，区警四至五名，年支经费二千八百零八元。教育经费，仅有高初级小学各一处，教师四人，学生五十九人，而学龄儿童男为九百五十人，女为七百四十人，失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七，年支经费三百三十八元。行政经费八百一十六元，其他支出三百元，合计为一万零五百六十二元，收支相距甚大，县政府经费由绥远省财政厅从包头统捐局每月还给拨补四百元，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其县之瘠苦不言而喻。列为绥远省之三等县。

#### 四、自然地势

全境断续不正，所辖各段夹着于邻旗之间，北境阔，南境狭而长，东南境有突角，伸出于陕西境内，如半岛状，西境由西北至西南成长斜形，境内多沙，山梁起伏，无大山亦无深谷。

山梁形成，距县城三十余里之东有神山，又

名神山脑包，东与萨县西南界之马家梁毗连。循西大路而至段拉圪堵之北有石畔山，其山势均不甚高大。再如北境之碾盘梁、板檐梁、南境之板洞梁、乌色兔梁、百太梁、乌兰马梁、补连梁、阿龙太梁、均为土梁之属。其中以乌兰马梁为最长，南起乌兰马沟畔之南，北与百太梁相衔接，达乌兰马川之北，纵贯南北，长百十余里。

随着山梁起伏，凹凸不平，形成沟谷，北境有马场窰沟、可兔沟、台沁沟、淖沟、补芦沟、朝脑沟、吕家沟、纳林沟、大台沟等，北起三棵圪达塄、南迄二和壕，均在境内。南境有乌兰马沟，自乌兰马梁而北至乌兰马川。恰恰沟，经乌兰十里庙而北延向东北，至塔拉壕。公继沟、乌拉色太沟，出于东北延向西北与恰恰沟相接，是为境内沟谷之最长者。半为沙沟、半为石沟。此外还有一些小沟、诸如北境之小补芦沟、阿赞沟；中境之水头沟、铜匠沟、哎来色太沟、文贡沟、小素贝沟、鸡盖沟、哈拉兔沟、土亥沟、康巴

什沟、倒劳沟、孔独伦沟、南境之虎石沟、珠盖沟、纽扣哈达沟、察汗力盖沟、锁匠火盘沟、壕赖沟、乌兰沟、阿直沟、尔林兔沟、莽盖兔沟、活沙兔沟、活鸡兔沟，以及西境之阿善沟、塔并沟，浅深不一，均以沙梁起伏，高下形成。

境内之河流，以乌兰木伦河为主干。乌兰木伦为蒙古名称，即紫河之意。源出台石坡，经县城南，南流三十里许至恰恰沟入陕有西乌兰木伦河自西北来会；又南流十余里有公继盖河自东北来会；循乌兰马沟而行，转向东南流十余里有窝兔沟河自西北来会；又东南流有珠盖沟、纽扣哈达沟、察汗力盖沟、锁匠火盘沟、诸水依次自西北来会；又东南流十余里，有犍牛川自东北来会；并有考考乌素河，其上流为乃金和洛河会活鸡兔沟之水自西北来会；自窝兔河会合处至考考乌素河会合处，延二十余里，又东南流十余里，有活鸡兔沟之水会乌兰沟、阿直沟、尔林兔沟数小水自西北来会；又东南流入陕西神木县境。

## 五、物 产

东胜县境山梁起伏、凹凸不平，水土流失严重，又土质硗薄、旱灾迭见、物产贫欠。

动物：家畜以牛羊为最多，马驴骡猪次之；野兽则有狐、狼；青山羊、磬羊、黄羊等。

皮毛产量以羊皮羊毛为大宗。据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绥远省建设厅调查，年产羊十余万只、牛一万余头、马三百六十二匹，猪一百五十口、驴三十头、骡十头；羊皮三万张、牛皮三百二十张、羊毛三十二万斤、羊绒九千斤。所出皮毛除供本县运用外，其余皆销运于包头。

植物：土壤多系沙砾、地质硗瘠，又十年九旱，亩产不上三十斤，不宜耕植，故原垦地一万二千二百余顷，下种仅有四千四百八十余顷，占三分之一。

农产品以糜谷为大宗，荞麦杂豆次之，麻又次之。据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调查所得，年产

谷子二万余石，糜子九千二百余石，荞麦四千六百余石，麻子八百余石，花麻一万余斤，籽麻七千六百余斤。

药材：境内产有柴胡、大黄、黄芩等药材，柴胡产量年达六千余斤。

红柳、芫荽，大量生长，惟数不详。

林产以杨柳为主，多分布在县城周围及三区境内，约二千余株。

矿产：县城以东水头沟等地为煤产区。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有工人杜姓者首先土法开掘，日产五千余斤，煤质耐久、烟少，燃力柔和，为东胜境内之地下宝藏。惟价值甚廉，每五百斤当时仅售洋三角。

手工业仅有油酒业和铁、木、石匠等艺业，均系私人经营，资本无多，产量亦甚少，仅在县境内销。

# 解放前夕东胜城关概况

边 嵎 山

民国初年设县以来，东胜县长期处于遥治状态，县政府有几个工作人员也是住在包头广生店。民国十七年裴耀祖任县长时，将县衙门临时设在陶油房（原属东胜东区，现归伊旗管辖）。民国二十年王文泉任县长时，绥远省拨款一万二千元银币筹建县政府，民国二十一年，将县衙门由陶油房迁至东胜城。

东胜县城是土打城墙，东南西北墙的长度各为一华里，面积为零点二五平方公里。县城南门在现文化馆和供电房之间，是砖砌城门洞，有双扇大门，上有城门楼作为哨所之用；北门在今盟粮油公司楼和盟民族事务委员会之间；东门在今盟中医院以西民生街口处；西门在今市政府楼

前。东西门原没有，后来几经军事设施的变化，各挖了个很小的土洞门，只能行人进出。

城内建设县政府、法院、警察局分别为三个平房四合院。只是县政府有幢起脊砖木结构正堂，占地面积一万二千六百三十平米，围进城内的三户农民住有几间土房，其他居民和很少的几户小商贩，城内人口仅有百十多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归绥、包头沦陷，当时东胜城的地位显得比较重要。绥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迁来东胜，除县政府外，县党部、三青团也相继成立。此外国民党中央的和第八战区的伊盟守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统计室机关也迁来东胜，人口猛增至千余口。抗战胜利以后，城内有些机关迁走，机关人口相应地减少。

解放前夕的东胜城如前所述，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小商、小贩略有增加，城内人口达到四百余人。当时的政治经济状

况是：

一、党政军机关和团体、学校。城内驻有绥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地址在今盟公署楼处，专员张国林。公署下设三科一室和一个区训班：第一科是粮食科，科长徐云鹏；第二科管建设、训练，科长吕兰；第三科管人事、财政、总务，科长苗春生；机要室管印章、收发文，负责人张印玉；区训班教育长由吕兰兼。各科有科员若干人，共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

保安司令部和公署合署办公，张国林兼司令，副司令凌玉华，参谋有刘学相、薛华廷，指导员刘玉瑞，副官李志烈，保安队长刘应楼，连长张忠厚，电台台长雷启元，译电员刘瑞祥。保安队有士兵二十余人，司令部共有官兵三十多人。

县政府设在东街路北（今盟公署楼处）。

“九·一九”起义后，绥远省责成原达旗组训处长慕幼声担任东、桃、达治安司令兼东胜县县长。慕幼声指挥的军队有组训处康民众、王再成



的两个自卫团和桃力民的一个自卫团及**东胜县**的十六团。县十六团团**长王珍开**，团副**陈步云**，共有二百余人。县政府设三个科，第一科管民政，科长**李生华**；第二科管财政，科长**郝虎文**；第三科管建设，科长**赵文昇**。政府秘书**焦钟汉**，会计主任**魏生录**，人事管理员**杨文秀**，技士**贺聘珍**，统计员**陶立栋**，督学**赵昇平**，合作指导员**王亚夫**，社政指导员**乔增瑞**，户政科**员徐兴华**，税务科**员张铎**，军事科**员王秉忠、张泽清**，田粮科**员牛兆廉、刘石、韩恩寿、郑永年、辛正如、张凤仪、杨少桥、李文卿、边峻山**，度量衡检定员**刘文泉**，事务员**慕学忠**，会计事务员**任继才**等，共有干部二十八名，公役十名，编制三十八人。镇内设有一个保，四个甲。保长**魏二**，东街甲长**张卿相**，南街甲长**曹元祥**，西街甲长**郝成连**，北街甲长**孙元树**。

县党部设在东街路南（今市银行大楼处），

书记长康逸三，秘书李森瑞，干事孟志荣，助理干事李振华，公役苗德明，共五人。

三青团设在东街路北（今盟公署楼西），主要负责人是张铭卿，还有干事二名，公役一名，共四人。警察局设在县政府院内，局长许焕魁，局副许善，巡官张世英，警长有五人，警士四十人，共计五十二人。

城厢小学一所，校址设在城东北角处（今一完小）。校长李直哉，教导主任边崢山，教员有李适堂、苏秉怀、李海、李士伟、张仲臻、边崢山（又名边峨山）等，共有教职员工十名。全校有六个班，一百二十余名学生，中低年级复式教学，高年级单班教学。

县卫生院一所，设在南街路东（今宾馆楼后院）。院长陈文坛，护士樊耀清，助产士闻敏，药剂员武治基，检验员乔殿清，事务员郝正纲，还有公役二名，共编八人。

邮政局设在南街路东（今大东酒家），局长

高少其。全局有十余名工作人员，开展业务有电报、长途电话、汇兑等，邮差都是肩挑邮包，徒步送发。

二、城内开设大小百杂货铺共有十七家。

(1) 德玉公。商号设在南街路东，由山西人任沛（铜匠出身）和本县农民张进财、魏二拉三户合资经营。

(2) 三盛公。商号设在北街路东；由本县农民魏二和神木人白凤岐、张文玉，府谷来的小商甄二官四家合资经营。

(3) 东顺城。商号设在北街路西，由当兵流落于此的王池一家经营。

(4) 义发成。商号设在北街路西，由河北来的李佐智一家经营。

(5) 天义成。商号设在北街路西，由河北来的张福生（挑货郎担起家）一家经营。

(6) 三义成。商号设在北街路西，由山西来的孙元树和河北来的李相武、田进功三家合资

经营。

(7) 大德成。商号设在南街路东，由河北来的小商贩刘德安、傅永清、王焕章三家合资经营。

(8) 德庆公。商号设在西街路南，由山西来的武进财(卖豆芽起家)、府谷来的王有庆、王绍昌(挑货郎担起家)三家合资经营。

(9) 信义成。商号设在南街路西，以经营醋、酱油和小菜为主，由山西来的曹元祥(肩挑叫卖出身)一家经营。

(10) 玉兴德。商号设在西街路北。总商号在府谷，东胜是分号，由财主阎五毛楞经营，顶生意的叫康品三，店员任录马。主要经营绒毛、粮、油、布匹等，是东胜资本最大的一家商户。

(11) 张星海从河北挑货郎担来到东胜，在北街路西开设一个小杂货铺。

(12) 刘振华从府谷挑货郎担来到东胜，在南街路东开设小杂货铺。

(13) 刘全盛，山西人，当兵流落于此，在南街路西开设一个小杂货铺，兼营米面生意。

(14) 赵龙庆，原籍河北人，肩挑叫卖出身，在西街路南开设小杂货铺。

(15) 和文治，原籍府谷人，在东街路北开设小杂货铺。

(16) 杨五仁，原籍府谷人，在南街路西开设干货铺。

(17) 傅义，原籍府谷人，在南街路西开设干货铺。

### 三、饮食服务行业共有十八家。

(1) 兴美元饭馆。馆址设在北街路西，由府谷来的马振其一家经营。

(2) 兴盛增饭馆。馆址设在北街路西，由河北来的刘新民（二货郎出名）一家经营。

(3) 大东饭店。设在东街路南，由河北来的张卿相（县警察局巡官）一家经营。

(4) 许荣贵。原籍河北人，清朝太监，以

后当警察而改行，在北街路西开设车马店。

(5) 张星儿，原籍河北人，在南街路西开设车马店。

(6) 邵金林，原籍河北人，当兵流落于此，在北街路东开设车马店。

(7) 杨振岐，原籍河北人，在北街路东开设车马店。

(8) 尹德胜。原籍河北人，当兵流落于此，在北街路东开设小客店。

(9) 刘根太，原籍陕西神木人，一贯以理发为生，迁居东胜后在西街路北开设一个小理发馆。

(10) 剃头老曹（真名不详），建县城时从山西迁到此地，在西街路北开设理发馆。

(11) 刘克仁，原籍山西人，当兵流落于此，在东街路南开设肉铺。

(12) 陈锡明，原籍河北人，在北街路东开设挂面加工铺。

(13) 杨拉牛，原籍陕西府谷人，在东街路北开设一个小澡堂。

(14) 范满家喜，本县羊场壕农民，在北街路西开设碾磨房。

(15) 自昌盛中药店。店址设在北街路西，由河北迁居东胜的张应奎一家经营。

(16) 益源堂中药店。店址设在南街路西，由山西迁来东胜的张静源弟兄经营。

(17) 康氏大药房。店址设在西街路北，由山西来的康品山一家经营。

(18) 彭孟海、彭文义叔侄俩，原籍河北人，在北街路西开设中药店。

#### 四、小手工业者有九家。

(1) 武兴和，原籍山西人，一贯以缝纫业为生，迁居东胜后在西街路北开设缝纫店。

(2) 李春阳（绰号圪旦李），原籍山西人，一贯以缝纫业为生，迁居东胜后在西街路北开设缝纫铺。

(3) 陈银柱、陈凤山弟兄俩，从府谷迁居东胜，在西街路南开设缝纫铺。

(4) 李满荣，原籍山西人，在北街路东开设缝纫铺。

(5) 李满堂，原籍山西人，在北街路西开设缝纫铺。

(6) 李源，原籍山西人，在北街路西开设钉鞋铺。

(7) 李二娃，原籍神木人，在南街路东开设钉鞋铺。

(8) 廉铜匠(名不详)，原籍河北人，在南街路西开设修理锁子业务。

(9) 刘元尚锁，本县塔拉壕人，在西街路北开设铁匠铺。

#### 五、镇内没有具体职业的有四户。

郝财富：原籍山西人，家居南街路西，在本县农村找了个老伴，靠农业为生。

杨叔小：原籍陕西府谷人，家居西街路南，



靠迷信度日（神汉）。

刘大娘一家三口，住在西街路南，靠卖豆芽、凉粉为生。

郑生：原籍府谷人，家居北街路西，靠打短工维持生活。

六、镇内有农民五家，即：

贾德义、贾六在、贾绪女、廉二猫、郝成连等。

以上是解放前夕东胜城关的基本概况。从建县到解放前三十年的历史，东胜基本上没有多大发展。

解放后三十五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东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胜市区已扩展到七点六平方公里，市区人口五万多，建筑面积二百多万平方米，主要街道已全部建成柏油路，座座高楼崛起，道旁绿树成荫。各项事业飞速发展，整个城市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现在，东胜市已成为全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

# 回忆东胜抗日一战

任继才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来，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地向西进犯，很快就将绥远沿京包铁路线的集宁、归绥、包头相继占据。当时在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的康王暗地投靠日本。这时的东胜云集着各方的散兵，东胜城在战略地位上起了重要变化，它是伊盟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中心，又是进入陕北的主要门户，是有影响起作用的关键地区。但北有天然的黄河屏障，交通很不方便，这给日本侵略军的快速进犯是个阻碍，也给了我军队的喘息条件，所以在东胜地区集结的有正规部队如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五一五团，团长高

致凯；二营，营长李涵芳；地方团队如张步程、刘道宽；杂牌兵种如鄔青云、王永清、陈炳义、刘效贤、韩祥符、王伯谋等很多。这些部队的给养除上级调补少许外，大部分是由当地群众负担。在河西的人民经常逃日寇之慌，防日本飞机的轰炸，穷乡僻壤的伊盟尤其是东胜人民对抗日的负担是重的。他们食不饱腹，衣不遮体，仍然进行生产，爱国之心还是高的。

东胜设县后屡患成灾，好几位县长均驻其它地区遥治东胜县。在王文泉县长任职内，绥远省政府拨款于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建成东胜城。城的面积总共是二十五万平方米，地形东北高，西南略低，在一个丘陵环抱的小盆地中。自东胜城建成后，为了防御匪患，剿灭匪股，曾多次派各方面的军队驻防此地，但均属常来常往，在军事设施防御方面一无所有。一九三五年王靖国部队派四〇七团来此地驻防时间较长。该团团长刘良湘在东胜的周围建筑了碉堡及

防御沟壕，都是部队自己搞的。城北面在瓦窑渠的小山上，东面在现在的雷达站，东南在现在的二完校南，西南在现在的食品公司楼南，西面在现在的市农机厂院北部，共建筑了五个土碉堡，在当时防御匪患的军事设施还算巩固的。“七·七事变”后该部队调走，只留一些地方团队。一九三七年秋东北挺进军马占山将军的部队移防东胜，这时日本飞机几次来东胜城轰炸，城内居民的房屋和部队的马匹也受到损失，曾一度城内及附近居民搬迁到较远一点的山沟中暂住，以防日本飞机空袭。时隔不久该部队就移防到准旗、府谷一带。接着到此地驻防部队就是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二营李涵芳部队。他们在城的附近及城内修筑了许多军事防御设施，如现在的烈士塔、公园、瓦窑渠的北部小土山上挖了很多战壕、单人掩体、地面暗堡，城内在城墙根均匀地挖了防身洞，向外通一个枪眼，并沿四周挖通了交通沟，外围四周挖了宽而深的护城壕，在战备上加

強了好多。

当时这个地区的各方面军队的驻扎情况：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五一五团团部驻在原属东胜管的距离城南六十里的陶油房（现在伊旗纳林塔乡），该团二营李涵芳部队驻守东胜城，但是有一部分仍驻在离城东三十多里的旧庙沟，丰胜西驻守着一个连，城内驻守着三个连及营部共四百多人。其它部队多数驻东胜境内及达旗的梁外地区，黄河开的季节延伸向沿滩地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游击战。

日本侵略军侵占包头后，一直对我东胜虎视眈眈，意在将这个关键地方占据，好满足伪满的统治，进而向陕北侵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农历二月初十），由日本指导官督战，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率领蒙古军八师一千余人，随带几部大汽车，二百多峰骆驼运着弹药食品等，渡河后由达旗的新民堡顺喀什拉川向东胜城扑来。因为日本军来打东胜这个消息事先根本没

有得到，当时东营子（现在烈士塔南麓），南营子（现在盟银行大楼）分别住着两个排的部队。这天中午刚吃完饭，忽听的有枪声，认为是有土匪，可是出去一看，在烈士塔小土丘上有人打枪，这时军队就开始向高地争夺，接着雷达站的高地被占据，而大炮开始响了，第一炮打在城外的南边，这时人们才都确认是日本侵略军。所以，城里和附近的群众大都没有逃离开，南营子住的群众多数跑开了，有几个没有走脱的在山药窖里躲了起来，直到战斗结束后才出来。

日军和伪蒙古军的武器装备比较好，有大炮、小炮、轻重机枪，一开始的火力就很重，并将东胜城东北两面的高地全部占据，在这些高地上看东胜城内一目了然。一刹那就有倾城的危险。但是李涵芳营长仅有四百多人的兵力奋力反击，同时托城内的一个居民贾德义老人，骑着自己的马往城南的陶油房团部送报告并求援。这个仗自打响后，就从现在的烈士塔到苏家渠以西的几个

小高地上互相争夺，双方死伤很多。当晚日军已将东南面的土碉堡和南营子都占据，距城墙仅有三、四百米，轮番向城的东南角进攻。团部派至的援兵在这天晚上的后半夜才到，但是被敌方的火力压住仍然入不了城，又进不了阵地，在城南的三四里处潜伏。只有第一连由东南营子之间向雷达站高地反击，因地形不熟悉结果伤亡很大，也无济于事。东胜的城墙纯用泥土打起来的，因此，炮弹打上去只能穿个眼，不会整片倒塌下来，再加事先部队搞了些防御设施，当时一下将城占据看来也很不容易，城内战士们的死伤不多，而士兵伤亡最大的还是城外几个高地间的争夺战中。

从这个战斗开始打响，直到夜间十二点以前援兵还没有到达，就在活啥兔住的其他营的部队都不能到达，以后到达的救援之兵既进不了城，又入不了阵地，所以，东胜城内只有李涵芳营孤军作战。第二天拂晓才由东北方向（青杨树沟--

带)出现了部分杂牌骑兵,时打时避根本无济于事,从南面来的救援正规部队到达东西沙渠一带,被敌人的强大火力压住头都不能露。在远处山头上眺望的群众看到这种情景也很着急,据说这时有一个姓杜的老乡亲自跑去将这个部队领着,从东沙渠南沟(现在公墓南沟)绕到李五店,柴家梁从敌人的背后开始反击,不到半个小时将城东面的最高点收复,而日伪军才开始全线狼狈溃退,没命的向包头逃跑,这时杂牌骑兵乘胜追击,并且得到许多枪炮弹药、给养、全部骆驼及其它工具等战利品。

这次战斗敌人的死伤也是很大的,在逃回的沿途群众见到汽车上全是拉的死人,在临溃退时在南营子到雷达站高地间就留下三四具死尸。据碾盘梁沟的人们说打死一个日本指挥官,最后还抓住敌人一百三十多人。我方其他部队没有什么死伤,主要是五一五团伤亡很大,据说该团伤亡近四百人,李涵芳营除曹副营长阵亡外,伤亡在



二百人左右，受伤的战士们多数转送到榆林地区医治。为了安葬好战死的人们，在城的北门外（现在盟卫生处）修建了一个烈士陵园，二营的全部埋在这里，一营的及其他埋在敖包图。附近的群众除瓦窑渠的农民王二有在战斗结束间他出外被打死外，其它的财产受到些损失。

# 抗日战争前后的回忆

李先唐

一九三五年即民国二十四年安北设置局奉上级命令撤销教育局，让我担任第一小学校长。那时我老父亲和我同居，老人想叶落归根，我也无心在那里工作，于是就呈请辞职办理了交待手续，随同老少返回东胜皂火壕老家。一九三六年春天我的同学郭永岭担任了省城第三小学校长，给我来信聘请我当教员，我应聘只身赴归绥第三小学任教。这年冬天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使全国抗日救亡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号召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举国上下团结一

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当时省城的中小学教师都纷纷组织起来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和郊区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动员工农群众投入伟大的救亡运动。暑假期间省政府指示省城中小学教师一律参加绥远省干部训练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受完训后各回原校教学。时隔不久大概是九月下旬，日寇沿平绥铁路向绥包推进，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导致归绥包头两市沦陷敌手。这时我们学校自行解散，各奔逃生我长途跋涉跑回东胜。

绥包沦陷后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杂牌军队有的就地投降了日寇充当了日伪军，有的顾虑多端心有余悸，抢渡黄河云集东胜。这些残兵败将来了之后首先强行向当地老百姓要粮要草，甚至明抢暗偷勒索人民的财物马匹，人民遭殃社会一片混乱。我县的军政人员及绅家大户也行动起来，自己出马出人购卖枪枝弹药组织自卫队，在各区保安队的基础上扩大编制，目的是保卫地方

也保卫自己的家产以及维持地方秩序，制止游勇散兵为非作歹。当时我县原东区保安队长张步程要扩大他的军队缺乏文职人员，要我帮助他做自卫队的组建工作，我是东胜人又是知识分子，大敌当前决不能留居家中苟且偷生，决心走投笔从戎的道路。当时张步程把东胜东南北三个区的保安队扩大为一个拥有二百骑兵的自卫团。这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来一个军长叫黎明，责令外地来的一至五路自卫军和本地的一个自卫团改编为国民党五十八军，下属七、八、九、十四个团，七团团团长王永清、八团团团长王文才、九团团团长刘效贤、十团团团长是张步程。团部设副团长一人、军需主任一人、军需一人、军械官一人、副官二人、卫兵四名。第十团副团长是武国和并兼军需主任，我任军需收发和军队粮饷。军械官是尹彦文管理枪械弹药。副官有郭文明掌管文书，孟国华接洽联络，苏亚龙专管团部人员伙食。卫兵有金山、刘喜刚、焦绵羔、孙三，这四个

人都好枪法，是团长的四大金刚。下属四个连，一连连长李毛团、二连连长岳青山、三连连长刘永祯、四连连长是崔绪姜，各连的枪枝弹药马匹都由各连自行筹划，大都是当地穷人出人、大户出枪出马，象李毛团从自己马群中挑出二十多匹战马供战士骑乘。经过几个月的筹划第十骑兵团初具规模，发展到三百多人，全团马匹齐备，枪枝弹药约有三分之一的装备。不料在一九三七年农历十一月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五十八军各团到陕西榆林驻防。当时伊盟处于抗日前线，这支部队本应留在伊盟，为什么要调往榆林，全体官兵迷惑不解。我们团开到离榆林十五华里古城滩，人的口粮马的草料全部由当地老百姓负担。榆林四周本是沙漠之地，人民本来无法生活，那有条件供养起这么多的军队。到了榆林后军长黎明去重庆向中央国民政府请命去了，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下文，这时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认为这几个团的军队驻在这个干旱灾区确实无法存

在下去，就命令各团迁防陕西神木县听候上级指示。我们团驻防在距神木城十五里的栏杆堡，不到半个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来令要把几个骑兵团改编为步兵，同时命令调往甘肃天水整训。全体官兵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失望，建立自卫队一想保卫地方，二想抗日，结果上级收编后从抗日前线调到后方又要调到天水整编，这就意味着要取消这部分抗日武装。军心动摇，纪律松弛，众说风云，各团纷纷哗变逃回东胜及达旗沿河一带。我们团乘春节之夜，团长张步程命令各连官兵迅速集合在栏杆堡附近的大山深谷中，宣布哗变返回家乡。当时找了个识路的老乡带路，黑沉沉的夜晚一人拉着一匹马起程，走了三十多里羊肠小道入了犍牛川，放了带路人，我们骑上马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全部返回东胜东区淖壕一带住下。榆林二十二军高双成得到五十八军哗变的消息，立即向东胜达旗前线驻防的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五一二团高致凯和张子荫两个团长发申

报，命令这两个团截留收编这些哗变部队。每个团编为一个抗日游击支队，我们团是由高致凯团长派连长王瑞森（东胜人）来团部接洽点名收编的。一九三八年春天二十二军把五十八军哗变的部队和东胜、达旗沿滩的杂牌游击队改编为五个抗日游击支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是邬青云，第二支队支队长是王永清。我团收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是张步程，第四支队支队长是韩相符，第五支队支队长是段宝山。收编后各支队都移驻沿滩梁外沙畔一带防范日伪军渡河侵犯伊盟。一九三九年一支队邬青云伙同陈炳义叛变投敌，渡过黄河投靠了日伪军绥西联军王英部。我们团收编后队部设在张步程家中各顶盖，我任支队上尉军需，李澄任上尉军械，孟光华、苏亚龙仍任中尉副官。当年黄河解冻后支队率领全体官兵移防黄河南岸，当时第一连连长是李毛团、第二连连长是王文明、第三连连长是韩廷光、第四连连长是刘道宽，各连平均有七八十骑兵，分别驻在达旗

展旦召、关碾房和王家窑子一带，同年秋季又移至靴铺窑子、李块圪卜、常土圪卜等地。这时沿滩地区从西到东这条防线除了几个抗日游击支队，还有二十二军的正规军和马占山的挺进军联合防守，日伪军也不敢渡河侵犯。

这年冬天支队长张步程带了卫兵两人，还带四连排长一人、士兵二人，回伊旗各丁盖探家，路经东胜添漫梁刘牛寨子住宿。在半夜的时候张步程因慢性胃炎发作，自感疼痛难忍就用手枪顶在肚子上压痛，结果手枪顶门未退失火丧命。事后有人怀疑是刘道宽派人杀害，事实并非如此，第一张步程的儿子张继雄与刘道宽是结拜弟兄没有刻骨仇恨，第二张步程致死在刘道宽的家中，要刺杀不能在自己家中干这种事。据当时检验死尸的军医对我说：“子弹是从肚子前面进去，背上部出去穿窗户而飞”。这样证实是自死而不是他杀。张步程的遗体在各项盖隆重安葬后，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又派其女婿王伯谋任支队长，委任



郭树斋为副支队长，还派来军需主任一人，参谋主任张光远、参谋赵世明，原来的军需李先唐、军械李澄继续留用。我们支队由前防调回东胜休整，约半年时间又移防达旗王爱召，各连分别驻在新城、大小淖、马二圪卜等地。自移防后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空袭，每天早上携带马匹武器到野外隐蔽，日落西山返回营地。我记得有一天由包头飞来两架飞机给王爱召投掷炸弹数枚，炸伤连长一人、士兵二人和守庙喇嘛一人，因当时缺医少药抢救不及时活了数日而死亡。我和副官苏亚龙从战壕跑到野外幸免受害。之后这两架飞机又飞往新民堡进行狂轰滥炸，当天晚上日伪军率领三百余骑兵夜袭新民堡，当时这里的驻军是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五一二团张子荫部。张团长只带两个连的步兵坚守阵地，经过一夜激战，双方死伤残重，一直战到第二天下午天色接近黄昏，张团长从城墙根水道趴出通知我支队接应。第三天东方刚亮支队长王伯谋带了两个连前去支援，

日伪军看我增加援军，不能恋战仓惶逃窜。这时黄河封冻新民堡战役后决定移防上梁外，我们支队移防达旗乌兰加坝寨子，各连分别驻在石匠窰子、哈拉不拉、勾心召一带。

一九三八年农历二月间日伪军由森盖率领，派汽车六辆配备大炮多门，骑兵一千多名，从包头出发星夜行军来侵战东胜。当时城内只有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五一五团李涵芳一个营的兵力，黄昏时敌军已集中城下，城外高地已被敌军占领，基本上三面被敌人包围。李营长率一连步兵跳下城墙出击，双方在东城下展开厮杀，这时东北角的高地仍在敌手；夜幕降临时李营长决定死守东胜城。城墙上布置守卫扫荡扒城墙的敌人，在城墙下利用挖下的掩护洞，每个洞放三枝榆林造步枪，两箱子弹，两名士兵，只要看到敌人接近城墙脚下，就给以狠狠打击，使敌人多次冲锋都不能接近城墙附近。当时五一五团团部驻在陶油房，其他两个营的部队都分别驻在补洞、吉乐庆

皂火壕、西沙砂圪台一带。团部听到李营长呼救的消息，不是迅速派援军支援，而是将两个营的部队都集中在陶油房，第二天黎明才让部队向东胜进发，中午增援部队才开进东胜城。我们第三支队奉命派两个骑兵连从石匠窰子越过水头沟上了西山梁侧击日伪军。敌人看到我方增援部队陆续集结，本身死亡惨重，近中午将无力再战余部集中在碾盘梁沟，顺沟向北溃退，使东胜转危为安。战后清查我方阵亡将士七十余人，全部安葬在北门外烈士陵园。据说这次战役敌人伤亡人数大大超过我们，全部用汽车运回包头。

一九四〇年廿二军军部命令各支队回榆林、神木、府谷进行整编。当时一支队郎青云投敌，四支队韩相符部驻守在东胜罕台庙一带危害百姓，白日为兵夜晚为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罕台庙老百姓选派乔二栓等人到府谷哈拉寨向东北挺进军马占山将军告状，随后被马将军调回府谷收缴枪马全部遣散。二支队王永清部、三支队王伯

谋部、五支队段宝山部都服从二十二军命令，回榆林后都改编为正规军。我在部队开往榆林的时候，因家中无人照顾向王伯谋请假解甲归田。回来不久新任东胜县县长王恩荫是我过去的同学，当时绥远省教育厅决定在东胜建立两所省立小学，他知道我在家闲住，就派人把我找到东胜县政府，他说：“计划在城内建立省立第一小学，在南区尔林兔建立第二省立小学。城内聘任你负责，南区由韩廷瑞负责，呈文已报省教育厅批复，等候上任”。时隔不久，教育厅批示下来，我任职后和县长商议占用西营房作校址，聘请李继根、李宽唐、贺聘珍三人为教员，事务员高士奎，勤杂一人，学制设一至四年级，经费由教育厅直接拨，从此我又走上从事教育工作的道路。

一九四一年暑假教育厅下令归东胜县管理，随即县政府派我和李继根、贺聘珍到陕坝绥干团受训。结业回来后委任我为东胜第二小学校长，校址原先设在罕台庙，将罕台庙城厢小学搬回东

胜城内，一九四三年春天县政府又决定第二小学迁往西区杨七寨子并改名为自生堡小学，我一直任教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二年，先后在校任教的有张仲臻、白天佑、杨文华、杜锦、奥风华、李英、郭文清、卢怀德等人。

现在，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度着幸福的晚年。

# 抗日战争时期东胜县军政 情况片断

李静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发生了。猖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占了平绥铁路线（即现在的京包线），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绥远省的归绥（呼和浩特市）、包头先后失守。

东胜县相距包头百余公里，隔河相望，变成抗日前哨。从归绥、包头逃往山西河曲和陕西神木、榆林过路的难民、旧职人员络绎不绝，人心惶惶、局势十分紧张。当时东胜县县长邢宝鸿，闻风丧胆，不理朝事，企图和部分外地来的旧职人员携带公款潜逃。驻在县城的保安区队长张步程得悉后，立即召集部分地方人士商量，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收回地方公款，让其

滚蛋。一天晚上，张步程率领十数名队丁，解除了邢的武装。邢宝鸿天明离开了县城，逃往何处不知其详。打这以后，东胜陷入无人所管，乱世为王的局面。本县北区区队长刘道宽（又名刘牛）和东区区队长张步程（又名张交其）两人，各自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准备武装逃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刘牛的人马扩充到三百余骑，张步程的人马也有二百余骑，各自称为团长。这些地方武装头目，各怀心事，争权夺利。地方上有部分人员出面调解，让双方合作，以便进一步扩大地方实力，免受外来侵袭。当时刘牛扬言，和张步程合作他要统帅一切，让张担任副职，张步程深怕自己的实力被刘牛篡夺，互不相让，没有取得和解。在相持中，张步程率队撤出东胜县城，驻扎在城南郝家圪卜一带，刘牛仍驻老家添漫梁寨子。

不久，包头沿河地区的地方武装王永清（又名王锁子）部五百余人，邬青云（又名邬四儿）

部二百余人，先后撤退到东胜境内，进一步加深了东胜人民的灾难。此时，逃往张步程家的包头首富李聚五和国民党政界人士尹仁甫，向驻陕西榆林境内的国民党直属部队黎明军长多次联系，要求接收这部分流散东胜的队伍。当年古历十一月间，张步程率领自己的人马随同郇青云、王永清的队伍，一齐开往榆林郊区和神木附近，张步程部队驻在距神木十五里的兰甘堡等候黎明军长的整编。在此期间，留驻东胜的只有刘牛队伍，包头伪军授意达旗康王与其有过往来，后被路过东胜的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队所觉察，马占山借开会共同商量东胜防御工作为名，把刘牛当场逮捕，并将其所属武装全部解除，人员解散。刘本人随军押到陕西府谷哈拉寨，准备以军法从事，后经刘的家属和朋友到处奔走搬人说情，免于当时一死。这时，刘牛已成光杆司令。张步程部驻榆林附近等候整编期间，听到黎明军长要把他们编为步兵，开往天水地方驻防。张得到这个



消息后，联想到刘牛的下场，恐惶万状，害怕黎明军长把他们的武装解除。于是，趁大年三十晚上过节之机，率领全部人马从驻地出发，星夜返回东胜。接着，王永清、邬青云的队伍也开始向北逃窜，他们行动的比较晚了一点，虽在途中遇到追击，但终于开出了榆林境内。

为了榆林的安全，必须控制东胜。一九三八年春节后，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从榆林遣派一个步兵团，由团长高致凯率领向东胜境内挺进，先头部队驻在皂火壕（现布日都梁乡皂火壕村），团部驻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公社虎石沟陈步云家。高致凯将部队驻地安排好，立即派员分别到东胜各流散部队进行协商收编问题。经过多次交涉，达到了收编目的。前防指挥机构定名为伊东游击司令部，高致凯团长兼任司令，随高致凯到达前防的高双成军长的女婿王伯谋任参谋长，并分别任命邬青云为伊东骑兵游击第一支队长，王永清为第二支队长，张步程

为第三支队长，暂住伊金霍洛旗境内通岗浪、全盛久和东胜境内杨七寨子一带。派李涵芳为营长的步兵营驻扎东胜城内，负城防责任。与此同时，从团部调出陈品山任东胜县县长，管理全县行政事务工作。经过这样的部署，东胜县的混乱局面逐步有所扭转，人民的负担虽然日益加重，但人心有所稳定。

一九三八年春节刚过，驻包头的日本侵略军为了争夺东胜县城这一重要据点，遣派一千余名日伪军，在日本指挥官亲自率领指挥下向东胜进发。随军出发还有百余只骆驼满载“洋面”和弹药，准备在这座土城长期安营扎寨。

这年三月的一天，下午三时左右，日伪军和东胜守军李涵芳部队接火了，炮声隆隆，烟柱直升天空。这时，刚好到达皂火壕视察当地驻军阎平义机枪连的团长兼司令高致凯，在宁舍一个营也不愿直达县城担风险的思想指导下，置孤军作战的李涵芳部队而不顾，命令阎平义机枪连和驻补洞

沟的王瑞森步兵连撤回团部待命，不准支援驻城部队。后来，虽曾派了一班人护送四骡驮弹药支援县城，也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没有送入城内。李涵芳营在城内只好孤军应战。

县城的城防，由于思想麻痹，戒备不严，一发觉敌情，日伪已将城防外围工事重要据点——李明堂圪旦（现在的烈士塔）占领。他们充分利用做好的工事，居高临下，把几挺重机枪架在战壕里的转盘位置上，和侧面的几门大炮配合，一次又一次地向县城发起了进攻。驻在城里的李涵芳营，除留驻丰盛西的五连外，实际参战的士兵只不过三百余名。在这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年轻的李涵芳营长出于民族之仇、卫国之心，沉着勇敢，临危不惧，灵活机动地指挥全营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他充分利用城内的城防工事，如城墙上的单人掩体和城墙脚下的射击孔，南门外（位置即现在的市五金公司）筑有一个比较坚固的碉堡，是县城的咽喉。在拉锯战的过程中，敌人发

觉这个碉堡是攻城的最大障碍。于是，在夜半激烈战斗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争夺这座碉堡，李涵芳营长见势不好，立即命令必须守住阵地去夺回碉堡。经过激烈的争夺，但由于弹缺人少，此地若有失守，这对守城造成严重威胁，士兵的情绪也很低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营长镇定地又向连长下了命令，在城头上几挺轻机枪的掩护下，全排战士拼死战斗，碉堡守住了，但战士们的伤亡很大。此后，虽又经过无数次的争夺战，但碉堡一直控制在我方。鸡叫头遍的时候，战斗更加激烈，双方的枪声响成一片，形势十分危急。营长为了鼓足战士们最后一股劲，从玉兴德（东胜城唯一的商店）打出不少的白酒，又拿出一部分行军干粮，让战士们吃饱喝足继续战斗，等待援军。就这样，拖了不到一个小时已到拂晓，闻讯赶来的骑兵支队在外围与日伪军接火了。表现最突出的是张步程率领的三支队，为了保卫家乡，从侧面插入敌后，短兵相接，交手刺杀。这一支队伤亡也很重，不到一

个小时就伤亡了两个排长。在外围援兵的到来，日伪军在内外夹攻之下乱成一团，见势不好，在这天上午就全部撤退了。李涵芳营长经过将近二十小时的激烈搏斗，最后在骑步兵支援下终于转危为安，守住了县城，挫败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一向认为不敢摸的老虎尾巴，在东胜军民的奋勇抵抗下失败了。不久，骑步兵配合，又收复了达旗沿河一带重要据点，迫使日军在黄河以南仅仅固守了大树湾的一个大村落。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沿河一带虽然发生过多次扯锯战，但敌人不论战胜或战败，战后立即撤退，伊盟这块广阔的土地没有遭受日寇的长期践踏。

一九三九年冬，高双成军长为了巩固战果，派左世允旅长（人称左善人，因为他经常求神拜佛）坐镇东胜城，同时又派了段宝珊、陈秉义两个直属骑兵支队加强了防御力量。

一九三九年傅作义从山西河曲经过东胜开往后套陕坝重新恢复了绥远省政府，派马定国任抗

日战争时期第一任东胜县县长。马到任后基本上恢复了抗战前县衙门的编制，选派张伯平为秘书，牛纪纲为民政科长，还增设了法院、民训处、警察局等基层组织，行政划分为牌、间、邻。一九四〇年绥远省政府在东胜增设了专员公署，派遣陈应道为专员。陈到任后免去马定国县长职务，派自己亲信史其昌担任。史其昌接任县长职务后，废除了牌、间、邻的行政划分，改为区、乡、保、甲，甲为行政最基层单位。在农村根据全县农户分布情况，实行“连保连坐”，即每五户人家组成“连保连坐”，互相保证不出问题，一旦发生问题互有责任。与此同时，还在全县范围内颁发了良民证和盘查哨。在军事方面，榆林高双成部队逐步撤出伊东地区，防务工作由傅作义所属部队安春山军接替。一九四五年樊库县长任期内撤销了区，县级以下划分为乡、保、甲。乡长由省政府任命，副乡长由地方选举（实际是指定），保甲长由地方人担

任。这一阶段，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如统计粮（人民称之为要命粮、也叫硬定粮），还有什么自卫粮等，打十石粮就要统计七、八石，交不了粮绳捆棒打、冷房里冻；在税收方面，除土地、牛、羊、猪税以外，还巧立名堂，向人民摊派什么爱国捐，诸如飞机、大炮等各种各样的捐献。另外，还抓差、要兵，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苦难生活。

综上所述，便是抗日战争时期东胜县军政情况片断记载。

# 东胜军民守城抗日

郭岐山

东胜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中东部，是连接陕西、包头的枢纽，战略地位很重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归绥、包头相继沦陷敌手。达拉特旗康王投降日寇，危及东胜县和其他各旗。后来，国民党东北挺进军马占山将军率部开往伊盟准旗、陕西府谷县路过东胜时，派部队化装日军进入康王府，将康王扣捕解送榆林，后转解重庆，暂时稳定了伊盟东西南各旗县的局面。东北挺进军去后，国民党驻榆林的86师高双成部515团高致凯团长，率一个步兵团开驻东胜地区陶油房，派李涵芳营长率一个营进驻东胜城。

一九三八年农历二月中旬一天下午，日寇骑



炮兵两千余名从哈什拉川进入东胜城郊，分两路进攻东胜城。一路进入碾盘梁沟侵占了东胜城东北的置高点，一路进入宋家渠侵占了城北的置高点，几处炮台也被占领，将城三面团团围住。敌人趁占有利地形，以强烈的炮火向城猛攻。面对危局，守城的李涵芳部队坚守阵地向敌拼搏一夜，夺回了炮台。就这一个营，从当天下午一直与敌战斗到第二天中午，伤亡很重。这时，支援李涵芳部的高致凯的步骑兵分三路与敌接火，步兵从塔拉壕向敌推进，郎青云（又名郎四儿）骑兵团分左右两翼向敌推进，右翼杨占山连长（又名杨小三）从水头沟梁与敌接火，左翼金虎臣连在刘牛寨于威胁敌军。日寇死亡甚重，又兼一昼夜的战斗，筋疲力尽，支架不住，狼狈逃命。东胜守城战役宣告胜利。

东胜守城战斗胜利后，高致凯团长率步兵和他所指挥的各骑兵游击支队向达旗前进，先后收复了新民堡、达旗大二王府、大小淖、新城、展

旦召等，把日本鬼子赶到史家营子、大树湾、昭君坟、柴登等地，迫使投降日寇的森盖部马子禧弃暗投明，率部回归国民党部队。

在对日作战时期，东胜的劳动人民不但支援军马食用，而且还出壮丁给国民党军队补充兵员，再加上各种徭役，人民的生活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广大劳动人民支援抗日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东胜城没有被日寇占领，与劳动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东胜守城战役的胜利不但稳定了伊盟的局面，也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向榆林、神木进攻的企图。

# 东胜县“九、二八” 事件的经过

马 平 王金虎

东胜县“九、二八”事件，是东胜比较早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事件狠狠地打击了贪脏枉法、鱼肉百姓的国民党东胜县县长卢成瑞等反动派，首次打开了东胜革命斗争的局面，为进一步开辟东胜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条件。

## (一)

一九三六年二月（民国二十五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任北路军总指挥的刘志丹和宋任穷同志率领的二十八军，从瓦窑堡出发向神府地区挺进。到达神府之后，二十八军指战员在

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在佳县的挑柳沟，神木的杨家塬、沙峁等地先后歼灭敌人四个连的兵力，同时击溃敌骑兵黄、黑马队的两个连。这样，就基本上肃清了神府地区的残敌，解除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威胁，进一步巩固了苏区。

为了庆祝胜利，庆祝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帮助神府根据地的军民肃清了顽敌，神府特委在陈家坪组织召开了万人大会，在会上，刘志丹同志和神府苏维埃主席王恩慧同志，就加强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等内容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了扩大根据地建设和加强党对兵运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同时指出要利用多种斗争形式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壮大红军的力量，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一九三六年三月，陕西神府特委白区工作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力量，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大量派遣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深入蒋统区，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发动群众，同国民

党反动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从一九三六年三月到九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当时任神府特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王光先，先后派出了康金虎、杨远智、习如等五六名地下工作人员深入东胜地区活动。

康金虎是陕西府谷县康家伙盘人，任神府两特支队特务队队长。到东胜后找到了同乡的磕头弟兄胡门东，落脚在胡门东家里。在平时的闲谈之中，康了解到胡门东曾在刘牛部下当过兵，同时有个磕头弟兄叫薛罗。薛罗是一个讲义气，有胆量，好抱打不平，受人尊重的硬汉子。康金虎认为薛罗和胡门东可以做依靠对象。他让胡门东进一步给薛罗做工作，同时积极依靠广大群众，具体了解东胜敌人内部的情况。

五月，康金虎、杨远智就东胜了解到的情况，回去向特委作了汇报。在汇报中，详细介绍了县长卢成瑞与薛罗、高奋银之间的矛盾，以及卢成瑞欺压剥削老百姓的情况和老百姓对卢成瑞

的憎恨。

薛罗是东胜添漫梁薛家圪台人，在东胜县北区区队刘牛手下当勤务兵。有一次薛罗奉刘牛的命令到县政府给区兵们领餉，卢成瑞不给，薛罗与卢成瑞争吵了几句，卢成瑞觉得有失他县长的尊严，命令其部下把薛罗按倒在地打了四十军棍。薛罗因挨打受气回来便病倒了。康金虎和杨远智得知薛罗被打的消息后，赶忙到了薛罗的家里，给薛罗熬汤煎药，寻人治病。在康金虎和杨远智的精心护理下，时间不长薛罗的伤便痊愈了。薛罗甚是感激，并向康金虎、杨远智吐露了他要寻找机会报仇的想法。康金虎、杨远智根据薛罗的思想状况，委婉地向他宣传了党的政策，介绍了红军的情况。薛罗听后很是称赞红军的伟大，特别是听了康金虎、杨远智说在红军队伍里官兵一致，亲如弟兄，薛罗更是十分感动，便问：“听话音你们也是红军？”康、杨二人告诉他，我们是神府特委白区工作部派来搞地下工作

的。薛罗向康金虎、杨远智提出要帮他报仇，把卢成瑞打死，回陕北投红军。

高奋银是东北人，随卢成瑞来东胜后，就给卢成瑞当了勤务兵。据说，由于高奋银与卢成瑞的老婆王氏暗中有勾搭，后来这层关系被卢成瑞知道了，就把高奋银给打发了。高奋银被打发后生活没有着落，从而产生了伺机报仇，可又苦于单人匹马，力不从心。正在高奋银无可奈何的时候，忽然想起薛罗被卢成瑞打了，他想利用卢成瑞与薛罗的矛盾，就来到了薛罗的家里，提出了干掉卢成瑞，共同报仇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卢成瑞以绥远省参议员的身份到东胜调查县长王文泉在修建县城时贪污现洋七口袋（牛皮红筒），还有贪污百姓的洋烟款等事。查清后调走了王文泉，卢成瑞出任县长。

卢成瑞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来东胜，任东胜县第七任县长。上任后，就大量向老百姓摊派粮

草、款项，动用民工引差，使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苦。特别是在钱财上，如士兵的餉金，他改变了县政府开条子自己到下面要的做法，从各区老百姓手里起回餉金全部存起来。对士兵他说没有全部起回，待全部起回后一并给，实际是准备把钱带回老家东北去。当时人们称这种做法为“喝兵血”。卢成瑞喝兵血引起了士兵们极大的怨恨和不满，老百姓和下层士兵们给起了一个綽号叫“烂楼（卢）斗子”。

神府特委在听取了康金虎和杨远智在东胜了解到的一切情况的报告后，认为康金虎比较熟悉东胜的情况，而且在东胜还结识了不少朋友弟兄，对于开展工作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所以，决定再次派康金虎来东胜，利用卢成瑞与薛罗的矛盾，进一步激发他和胡门东等人的革命意志，积极依靠群众，在东胜县拉起一支人马，组织一次兵变，如果条件允许，就干掉卢成瑞，为老百姓除害。这样可以使东胜地区的群众尽早的觉悟



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另外，打开县城以后还可以搞到一批枪支弹药，加强红军的装备。

## （二）

六月，正是东胜鸦片烟上市的季节，康金虎又以倒贩鸦片的身份来到了东胜。他找到薛罗和胡门东后，传达了神府特委的指示，并建议跟他一道回陕北投红军。薛罗和胡门东当即表示同意，想在投红军之前把卢成瑞干掉，把县政府的几十支枪搞到手，到红军那里好有个见面礼。这个想法正符合组织上的打算，康金虎当即表示同意。

在这以后，康金虎一边应付买卖，一边与薛罗、胡门东秘密拟定行动方案。当时县政府院内住有三十多个警察，又大多是骑兵，装备也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出现意外，行动人员仅薛罗手中的一支枪，成功的把握是很小的，闹不好整个行动计划都有落空的危险。基于这种情况，康金虎决定与东胜县警察局的刘局长（此

人情况不详)取得联系,请他做为内应。同时,康金虎提出要充分利用高奋银的作用,因为高能提供出准确的有关卢成瑞的情况。只有对卢成瑞的情况彻底了解了,才能保证行动计划不落空。康金虎还布置薛罗和胡门东秘密地发展一批人,这些人人都要靠得住,信得过,不至于出现问题。

薛罗和胡门东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通过磕头结拜的办法,先后串通了四、五十个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北区人,都是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穷苦百姓,与薛罗和胡门东一起长大,交往较深的朋友弟兄,他们都愿意跟着薛罗、胡门东回陕北投红军。

九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康金虎领着高奋银秘密地到了胡二满家里(现添漫梁马家渠)。召集了有薛罗、胡门东等十几人参加的行动准备会议。会议由康金虎主持,他讲述了党的政策,宣传了全国的武装斗争形势以及红军的战绩,着重宣传了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

中央政府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主要内容。高奋银介绍了警察兵的装备和卢成瑞的工作、生活、活动规律，以及卢的住房、枪库的管理和设置等情况。在开会期间，有个别人担心事后会被国民党满门抄斩，全家老少跟着受连累。薛罗听到这些顾虑，明确而坚定地说：“如果我们都这样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假如我们不干了，这风声以后让卢成瑞听到，能饶了我们吗？卢成瑞这个人心狠手毒你们是知道的。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只有一杆子插到底，干他个鱼死网破”。康金虎说：

“警察局的刘局长说过，你们家里的老少由他来保护，你们干完一跑，逮不住就算了事。再说民国还有一条规定，谁做谁顶。刘局长打了保票，你们放心干就行了”。

薛罗、康金虎的一席话，使参加会议的人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一致表示

坚决为薛罗和广大老百姓报仇，干掉“烂楼斗子”。会议最后决定了行动的时间、人员、路线、接应和撤退等事项。

会议结束时，以古老的传统方式，一起喝酒结拜，并发誓。

### (三)

古历九月二十八日晚，按照预定计划，薛罗、胡门东、康金虎、王润、胡红洞、胡满红、高五斤半、白掌爱和刘老代共九人，从集合地点营盘壕胡门东家出发，大约在十一点多钟到了东胜西城外。

三十年代的东胜县城，是一个很小的土城，转圈儿只有四点三华里。城墙有一丈多高，是用土筑成的，设南北两个城门，晚上十点左右就全部锁上了。

按照行动计划，进城必须从西城墙进去，这是因为城里西边住的大多数是商贩和市民，行动

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薛罗等人在西城外搭起了人梯，先上去了一个人放下绳子，把其余的人用绳子吊上去，然后进入城内。进城后，看到街上很多店铺还亮着灯，小贩们在算帐，薛罗命令所有的人隐蔽起来。大约十二点多钟，店铺里的灯火全灭了，薛罗等九人来到了县政府大院门外，听听院内没什么动静，便翻墙跳到了院内。门房里亮着灯，只有一个老头坐着，身边立着一支步枪，这就是县政府大院的唯一岗哨。卢成瑞常常打骂士兵，他怕警察兵造反闹事。所以一到晚上就下令把警察的枪支全部收回放入枪库，只允许留一支门岗使用。枪库设在门房的套间里，由门岗顺便看守。东边一排住警察兵的房屋里毫无动静，这是因为，刘局长为了策应这次行动，给警察们有的请了假，有的派到各区号草料去了，三十多个警察大多数被打发在外。

薛罗一脚踢开门岗的门，命令他不许动，乖乖地坐下，很顺利地缴了门岗的枪。从老头身上

取出钥匙，打开大门放进了外面等着的人，随后打开枪库，把二十多支崭新的平山枪和二十多支旧步枪捆成几捆，驮在从县政府马厩里拉出的马上。把缴获的四支手枪和两支冲锋枪（山西造，土名叫山药蛋），分别发给了没有枪的人，每个人又带足了子弹，然后把剩下的几箱子弹装在几个面袋里，也全部驮在马上。

枪支弹药搞到手之后，薛罗请康金虎守南门，在奎素不齐（南门外的一个土丘）观察动静，顺便看约好的人来了没有，最后全部在奎素不齐集合。康金虎走后，薛罗又留下了高五斤半和刘老代看守枪支马匹，自己带着胡门东、王润、胡红洞从小院的东北角上翻墙进了卢成瑞住的小院。卢成瑞住的房里还亮着灯，他们上前从玻璃窗上看见卢正背迎门脱衣服，卢的老婆已经睡下。薛罗见卢成瑞毫无戒备，便让胡门东守住窗口，自己端着冲锋枪，一脚踢开了顶着的风门，没等卢成瑞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梭子弹飞

了进去，卢和他的老婆双双毙命。薛罗跳上炕，从墙上摘下了卢成瑞的手枪。

枪声惊动了住在卢成瑞东边的王秘书（此人名字不详，东北人，卢的内弟，跟随卢来到东胜后，任卢的秘书），他听出枪声是在卢的家里，并从他的住处向外打枪。薛罗、胡门东高喊交枪不杀，喊了一阵他还是不停地向外射击，薛罗等就开始还击。对打了一阵之后，听见屋里没有了动静，胡、罗冲进去见王秘书已被打死，手枪压在毡底下，原来是子弹打光了。

薛罗、胡门东把王秘书的手枪带上开始寻找孙小人，准备连孙小人也收拾了。孙小人又称“红笔师爷”是东胜的一霸，孙小人与县长串通一气，在大堂上经常敲诈勒索，凡到县衙门打官司的人，给他贿赂，他就可以帮助说话，把没理的官司打赢，如若不给或少给，那就会把有理的官司打输。孙小人在东胜吃喝老百姓二、三十年，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康金虎等人在商量行

动计划的时候，就决定除掉这个地头蛇，为老百姓出口气。孙小人也住在县政府院内，到家一看人已经跑了，寻找了好一阵仍不见。为了争取时间，决定先放押在监狱里的“犯人”，砸开监狱门后，放出了王三有等三、四十个被押的人。

王三有是陕西神木人，王国安的三儿子。王国安原在陕西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地主出身，但他很早就与陕北苏区的党组织有过秘密联系。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主动把自己家里的几支枪和一些弹药送给了王兆相的红三团，而且王国安还常把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些枪支弹药偷偷送给红军。王国安的这些活动，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了，事情暴露后王国安跑到东胜，他以前一度在东胜县警察局里当过所长。一九三五年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不久就被王文泉和东胜国民党驻军捉拿。王国安与他的大儿子都被杀害了，二儿子取保释放，因他原就在东胜居住，三儿子王三有被投进了东胜监狱。王三有从



监狱营救出来后，经过薛罗等人的宣传教育，有五、六人一起跟随想去陕北投靠红军。

这次行动除了孙小人逃跑外，基本按预定计划顺利地实现了。由于时间紧迫，不能久留，薛罗就让白掌爱上北门，一是看北门外以前联络好的人来了没有，二是到西城外把薛罗的马拉上，最后直接到马连圪卜集合。

白掌爱出了城以后，不见高五斤半和刘老代，也根本没有人来，拉上薛罗的马直奔马连圪卜。可是，天黑得就象锅底，加上道路不太熟，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天亮时竟转到不彦门肯。眼看大天白日，已经无法走脱了，只好把马放了，把枪埋了，跑回添漫梁，回家躲藏了两天，风声很紧，觉得不安全，就跑到了巴盟一带。

高五斤半、刘老代听说薛罗、胡门东开枪打死了卢县长，害怕扔下枪支马匹出了北门，连夜逃回添漫梁。

高五斤半是刘牛手下的马官。二十九日早

上，他神色慌张地对刘牛的心腹孟金贵吐露了实情，并谈了他和刘老代如何害怕偷跑的过程，孟随即将此情况告诉了刘牛。正在这个时候，县政府派来送信的人也赶到了。信上告诉刘牛，县长卢成瑞被薛罗打死了，命令刘牛立即率领区兵火速追击打死卢县长的薛罗、胡门东等人。这时东区的张步程的兵也出发追捉这些人。刘牛在出发之前，亲自绑了高五斤半，并让严加看守。刘牛返回后，将高五斤半枪毙了。刘老代听到高五斤半被枪毙的消息，知道在家无法躲藏，逃到达旗一带，后被刘牛的部下柴虎则、刘成厚捉拿，用铡草刀铡下了头，挂在东胜南门城头，进行示威。

康金虎出了南门，刚到奎素不齐就把马惊了，到了天明仍未将马追住，他立即返回添漫梁，赶了几只羊做掩护，向府谷方向昼夜急行，准备接应去了。

薛罗等人出了南门，到奎素不齐找不到康金虎，等了一阵仍不见人影，以为康金虎提前赶到

马连圪卜了。当他们到了马连圪卜的集合地点后，仍不见康金虎和白掌爱的影子，直等到天快亮时还是不见，薛罗等人就决定先向西走，好在附近打问康金虎和白掌爱的下落，因为康金虎还担负着带路和与红军接头的任务。

二十九日天黑时到了海子湾，经台什壕晚上住在老爷庙，三十日返回板旦梁，到了刘牛的叔父刘三的家里。找到刘三后，薛罗叫刘三赶紧回添漫梁告诉刘牛，就说县长是他们打死的，他们现在已经投了红军；刘牛如果敢把他们家里的老小动一动，可操心他们带着红军回来，把姓刘的满门抄斩，杀个鸡犬不留。另外，还让告诉刘牛，在追他们的时候，追得紧了可小心他的脑袋。刘三走后，薛罗等人也随即起身从吉乐庆、皂火壕、准格尔召一线，向府谷方向行进。在沿线，薛罗等人一直未打听到康金虎和白掌爱的消息。他们在不分昼夜的行进中，好几次与沿途的自卫军、民团发生遭遇，但都被他们的猛冲猛打给

击溃了。

十月初一傍晚，薛罗等人到了石岩塔，正准备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不料刘牛的区兵和刘方亮的马队追了上来。薛罗看到这样被追着走很被动，他命令进行一次反冲击，十来个人全上了马，利用充足的弹药，把追兵击退了十几里路。这次出击他们争取了主动，一直使刘牛和刘方亮的追兵没敢紧逼上来。

十月初二清晨，薛罗率领十来个人已走得人困马乏，决定在油坊梁休息一天。油坊梁地处神木、府谷和伊盟的交界地带。油坊梁属东西走向，西端延伸到神木境内，东端终止在一条南北的大川西岸，与幅川的府谷相望，梁的南北都是笔陡的岩壁，从东端上梁的唯一通道就是从川底伸向梁顶的一条蜿蜒的、仅能容一人一马独行的、铺有石头台阶的小路。薛罗等人就从这条小路上去。王润找到了他的姑舅，上了梁以后，薛罗等人准备在梁上休息一天，利用险要的地势轮流

把守路口，到晚上再行动。后来王润说他姑舅也当过兵，可以让他姑舅替他们站岗，其余的都可以休息。薛罗同意了王润的建议，给了一支枪让其把守路口。

刘牛和刘方亮的追兵到了川底后，就从这条小路往上爬，组织了好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因为凭借险要的地势，再加上居高临下的阻击，根本没办法上去。天快黑的时候，刘牛部下有个叫张巴图的在川底向梁上高喊，叫薛罗赶紧撤退，不然的话就走不了了。薛罗由于对地形不熟，以为追兵已经从其它地方包围上来了，于是决定从西梁撤退。结果刚放弃了把守的路口，就见追兵从路口冲了上来。薛罗等人立即明白，原来是中了张巴图的调虎离山计。追兵越来越多，与薛罗等人在短距离内展开了激战。薛罗向后退了一段，准备利用反冲击的办法把追兵压回去，再夺回路口。可是，由于力量悬殊过大，再加上在近距离的山地地形下，骑兵很难发挥威力。在反击

中，王三有、胡红洞和从监狱里跟出来的另外两个人都牺牲了，王润、胡满红和其他几个人都被冲散，逃命跑了。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后，仅剩下了薛罗和胡门东两人，他们边打边退，后来在撤退途中与康金虎、杨远智巧遇了，四人一起到了府谷。薛罗、胡门东经康金虎、杨远智的介绍加入了红军。

薛罗和胡门东加入红军以后，受到了独立师师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和神府特委的表扬和热情接待，神木小报还以“毛生骡（罗）子踢烂了烂楼（卢）斗子”为题，对这次事件做了专题报道。

国民党的报纸也登载了告示：谁能捉到薛罗和胡门东，赏给现洋一千元。

十月中旬，神府特委再次表扬了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勇敢顽强的薛罗和胡门东。经杨远智介绍，党组织审查批准，薛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被任为赤绥游击队队长，胡门东为游击队委员（相当副队长）。他们曾先后配合独立师参加攻打哈拉寨和五字湾的战斗。红军北上抗日开始后，派薛罗、胡门东一面回东胜探家，一面继续开辟东胜的工作。从此，他们踏上了新的征途。

# 我是怎样投诚起义的

孙凤洲口述 吴尚书整理

一九四七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推行了戡乱建国政策。在民族地区，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勾结民族上层人士，组建了地方保安武装。我当时在准格尔旗保安师二团任团副。这个师共四个团，七百多人，七百多匹马，五百多支枪，还有十几挺机枪，其任务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当时的司令是奇致中，副司令奇志刚，一团团长奇培南，二团团长黄克清，三团团长郝德明，四团团长黄文庭，均系蒙古族。

这个部队虽然组织庞大，建制完备，但军心涣散，士气不振，家庭式的部队缺乏战斗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府谷麻地沟和共产党红四团打过一仗，失败了。这时我在战地被俘，后来把



我送到绥蒙军区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新民主主义论。通过学习，使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初步有所了解。绥蒙军区领导为了争取保安师，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将我放回准格尔旗，让做奇致中的工作。这时保安师的驻地已移至党三窰子。我回到保安师后，奇致中见到我很稀奇，问我这个时期在那面主要干些什么，我说主要是学习新民主主义政策；接着又问我共产党的政策究竟怎样，我说共产党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争取，争取蒙古民族中立，不要打内战，欢迎民族上层人士参加组阁。情况介绍之后，他让我先回部队以后再谈，接着任命我为保安师参议。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共产党三兵团部队由杨成武带领，从山西朔县、左云、右卫路经集宁、丰镇、包头等地，在古城湾打了一仗，占领了包头，声势很大。奇致中很震惊，因为奇致中这个部队缺乏实力，既怕国民党，又怕共产党，两头都不敢惹。这次吓坏了，没过几天就找我商量，

让我和四团团副刘子威带信去包头找解放军暗地联系，准备投诚起义。事关重要，不宜迟缓，我和刘子威当即起程去包头麻池和三兵团泰山部队负责人李水清接头，说明来意。李水清表示欢迎，并讲明他们是野战军不便接待，将我们介绍到绥蒙军区政治部主任裴周玉（此人住包头先天巷17号奇景峯家）那里。接头后，裴主任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欢迎，并商定了部队整编、番号、接收等项事宜，待请示西北军区后决定。我们等了几天，西北军区来电同意我们起义，正式编为伊盟警备旅，奇致中为警备旅旅长，孙凤洲、刘子威为参议，同时商定接收地点在达拉特旗大树湾王贵窰子。事情办妥后，我和刘子威回到保安师驻地——包头中滩骆驼窰子，给奇致中作了全面汇报。第二天，奇致中、刘子威和我同去包头，当面见过裴周玉主任，并有韩峯（当时伊盟盟委统战部长）、赵英（伊盟支队参谋长）、孙义（总务科长）等人参加，经过研究达成协议，

决定三日內正式通电宣布起义，并派赵英去做具体接收等工作。

协定达成后，保安师内部发生了矛盾，四团团团长奇志义反对起义，暗通刘万春军长。刘万春获悉后带领军队开来七十八辆汽车将准格尔旗包围，将奇致中带回绥远关押起来，任命准格尔旗副官奇子祥为保安师司令，起义失败了。

在这关键时刻，我和刘子威冒险偷去纳林和伊盟支队联系，尔后带了一个连，连长叫常付喜，八十多人，八十多支枪，四十多匹马，两挺机枪，宣告起义。当时团长是朱帮仁，我为伊支司令部参谋，刘子威在准伊团帮助工作。和我们一起起义的还有准旗地方办公人员二十多人，其中有马骏英、张玉山、杨玉堂等人。

# 东胜市第一小学校史

刘继祖

现东胜市第一小学，是东胜建县后第一所公办学校。一九二八年，即民国十七年，县政府委派光绪年间贡生，刘恆龄创办东胜学堂。因为城内当时只有文武两个衙门，办学没有校舍，就借用圪堵队张进财的屋房作校舍。教师大部分都是聘用神木、府谷等地的前清秀才，教材一律使用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通用课本，即《共和国国文》和《共和国算术》，取消了科举考试的《五经》、《四书》教学内容，故当时被人们称为“洋学堂”。学堂的规模只有一至四年级，在校生只有四五十人。刘恆龄病故后，由其兄秀才刘

松齡继续主办。当时此地时有土匪出没无常，县城曾一度被土匪焚毁，学堂也时开时闭。由此县政府曾迁往忽羊兔陶油房，学校也一度迁往陶油房。

一九三一年，王文泉任县长时营建东胜县城。在县政府门前东街北侧东城墙附近，建起正房数间，还有东西厢房的一处校舍，学校从陶油房迁回东胜城内，委派中学毕业的高耀先主办。规模仍然是初级小学，学生只有三四十人。

一九三三年，卢成瑞任县长时，学校校舍被邮政局占用，学校又搬到县政府西院即法院旧址，委派主任教员李澄、教员王瑞杰继续办学。后因东胜发生“九·二八”事件，县长卢成瑞被击毙，学校也停办了。

一九三八年，马定国任县长时，决定恢复这所学校。当时日本侵占包头而时有飞机轰炸，城内又没有校舍，就将什拉乌素私塾改为公办学校，校址在什拉乌素李润虎院内，委派王瑞杰、李适

堂等在校教学，学生发展到五十多人。

绥包沦陷后，在外地工作的本县部分有文化的人，如高光耀、李先唐、李廷辅都相继回到东胜。一九三八年，高光耀、李廷辅等积极主张发展东胜教育事业，特别是李廷辅放着区长、科长不当，请求县长马定国把什拉乌素公办初级小学改为东胜城厢小学，自荐当校长。当时因城内驻兵太多，又经常遭日本飞机轰炸，很不安全，李廷辅就亲自和郡王旗东协理奇兆祿交涉，借用东胜境内喇嘛庙作校舍，把城厢小学迁至罕台庙，学生全部住校。没有教室，春夏两季采用复式教学法，五六年级借用喇嘛曼架房作教室，一、四年级把欢乐殿前殿作教室，二、三年级把正殿前廊作教室。秋冬季因没有取暖设备，就采用以寝代教，合一上课的方法。当时办学经费困难，没有课桌凳，李廷辅组织校董会，发动热心教育的富户，动员各区群众献工献料、捐款，解决教学设备。通过专署和县政府，招聘沦陷区逃来的马述曾、

杨子明、王子英为教学人员，又通过亲戚关系把包头逃来达旗的史守业、史秉衡也聘为教员，后来还通过神木友好聘来张国珍、宋子峯任教。由于办学条件得到改善，教学效果显著提高，临近各旗的学龄儿童纷纷前来求学，在校生最多达一百七十多人。学校实行抗战教育的方针，课程一律上《战时读本》。学生除了上课，课余时间还组织了歌咏队、戏剧队，利用庙会和唱社戏集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专署的积极抗日分子地下中共党员王小庄、刘乙山经常来学校作指导，排练《打城皇》、《割麦忙》、《捉汗奸》等戏剧，刘乙山还给教了不少的抗日歌曲。当时，这个学校既是东胜的文化教育中心，又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

一九四一年，东胜城厢小学送出东胜有史以来第一届高三毕业生。年龄大的边进业、李振华、苗德秀、刘守贵、贾有明、张守宽等分别到当地党政军机关录用工作，杨广材、刘文泉、任

继先、任继才、李华、杨居仁、王怀智、王治国、白天佑、苏汉章等十人考入当时河套地区国立绥远中学。

一九四二年，第二居高小毕业生边崢山、边峻山、王怀纲、白永厚考入国立绥中，郭嵩山、李春耀、郭守诚、郭文信等考入国立伊盟中学，郝芝昊、郝芝显、王天智、陶世昌等因年龄太大呆在家中。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因东胜地区鼠疫流行，学校半年没有开学。这三年暑期未期满的高小毕业生李士伟、孙万光、杨效彩、刘懋功、张存礼、李生荣等考入国立伊盟中学。一九四三年，校长李廷辅调为东胜县民教馆长，校长由马述曾接任。同时，县政府决定将罕台庙城厢小学搬回东胜城内，学校设在陈长捷守备军总司令部院内。正式教员只有张廷芳、董肋吾、张风仪三人，其余的都聘请党政军团中的知识分子兼课，勉强维持教学。



一九四三年，第三届高小毕业生祁新云、边凤翱、魏秉礼等考入国立伊盟中学，韩世昌、李杰、张永胜等在当地找了工作。就在这一年，解宝武县长向全县各区乡摊派木料，征调民工，重新在现在一完小校址上兴建校舍，共盖了三排土房计二十六间校舍。当时寝教室总算是分开了，但没有一套桌凳，只给学生每人发一个很小的骨排板凳，一块宽十五公分、长三十公分的图板，学生只好放在腿上記笔记、写作业。这时候，正式任教的教员有王德微、张廷芳、张凤仪、李景贤、高俊猷、李莲芳、鄂秀莲等人。在校生只有八十多人。

一九四四年，第四届高小毕业生解砥柱随父先去考入陕坝奋斗中学；张德茂、张德奎、贺文华、耿廷杰、刘继祖等人前往河套投考国立绥中，但因路远误期而考入该校补习班学习；苏汉杰、苏建武、边峻天、李永珍、赵武明等考入国立伊盟中学初中部和简易师范班上学。这一届出

现了东胜第一个女高小毕业生佟健如，当时也考入国立伊盟中学上初中。

一九四五年，校长马述曾调任东胜爱民乡指导员，由桃力民调来的刘子敬担任校长，教员有宋培梧、杨居仁、弓照清、李莲芳等人。第五届高小毕业生孙文明、王学文、杨岐山、郭仲勇、苗志仁、李振忠、郭良锁、崔化清、高占山等考入了当地新办的绥远省立河西师范学校。

一九四六年，第六届高小毕业生苏汉文、任效先、和文智、李子明、杨广智考入河西师范学校上学，郑世昌考入国立伊盟中学。当年五年级学生周树云、凌慧如、贾玉如、刘世英考入河西师范补习班。

一九四七年春天，绥远省教育厅决定，把东胜城厢小学改为绥远省立东胜小学。校长由王金灵担任，教导主任是边崢山，教员有苏秉怀、王肃、张存义，李海等人。这年中断一届毕业生。

一九四七年，当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一九四八年饥饿成灾，学校基本处于关门状态。一九四九年后半年，绥远省“九·一九”起义的前夕，专员兼县长慕幼声委派李逢唐为校长，恢复东胜城厢小学。正式教员有边崢山、李士伟、李海、苏秉怀等人。到一九五〇年，六年级只有六个人。袁留智、刘永珍、郑世明没有毕业就送到伊盟公安训练班受训就业，杨进祿、陶文耀、李鲁正考了学校继续上学。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伊盟自治区人民政府接管了东胜县政府。当时经费没有标准，人员工资也没有规定，每月经费只能向县财政科借支来维持。学校没有课桌，李逢唐就动员全校师生，利用课余时间拆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以取木料来制做课桌凳。当时教职员工连夏服都换不上，李逢唐就把拆回的木料拿出部分同新建的苗圃换了两匹市布，给人们换了季服。一九五〇年后半年，东胜县人民政府把学校正式定名为东胜第一完小。校长由李静泉担任，教员有边崢山、李

士伟、刘继祖、康振孝、周树云、凌慧如、赵洁萍等人。经费由地方附加税项下开支，人员工资以小米计算，校长每月小米三百斤，教员每月最低二百斤，最高二百八十斤。年终结算工资时，把小米折成粗粮领回来，再按市价卖给贸易公司。当时贸易公司只付给百分之四十现款，其余一律付货，款货再分发给个人。

一九五一年，解放后第一届高三毕业生李润德、冯明明、刘文蔚、赵金堂等，分别考入伊盟一中简师班和呼市二中。一九五〇年后半年，盟党政军机关迁来东胜，在校生猛增到二百多人，校舍严重不足，县人民政府决定拨款扩建校舍。因当地原材料缺，又没有施工力量，扩建学校困难很多。木料只好到农村购买，青砖包给当地人现烧，质量最次，木工也承包给本地木匠，勉强扩建教室一栋共十二间房，学生有了课桌，初步改进了办学条件。

一九五二年，县人民政府又拨款扩建校舍两

排，一排做教师宿舍和办公室，一排做教室。这一年，解放后第二居高小毕业生共十六人。张茂林、郭雨林，徐兴邦等人考入伊中师范部；冯明玉、刘喜英等分别考入包一中和呼市二中。教师后来又充实了呼市师范毕业的梁秀云、包头调来的陈竹青、新录用的张欣等人。这一年，全国进行了小学教育的整顿工作，通过听课、考试，审议合格的教师留用，不合格的解雇。整顿后，又从东胜区乡调回张仲臻、白天佑、袁廷佑来接任教，李恩祥任专职事务员。学校规模除四五六六年级单班外，一二三年级均增为双班，在校生增加到近四百人。同时，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办了两届成人速成班，学员大都是职工干部家属，毕业后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插入五六年级正班继续上学。

一九五三年，上级正式拨基建费，由伊盟建筑公司承包，新建了临近校门的两栋教室。学生课桌全部更新。教师队伍得到进一步充实，从旗、

下调入越世雄任教导主任，鄂旗调来张子颖，盟短师班分来阎文清、许荣华、侯长顺，呼市师范毕业的刘燕玲等当教员。这一年第三届高三小毕业生共十四人。胡承德、苏汉英、李万众、左武信、陈修亮、尹凤贞、康迺清等考入伊盟一中，张贵和、王俊山因家庭生活困难从事了农业劳动。

一九五四年，县里又拨基建款新建了一栋教室和两间教师宿舍，同时还拨了大量维修费将原有校舍整修一新。这一年，师资队伍得到进一步加强，盟一中师范毕业生任忠生、何怀仁及陕坝师范毕业生崔自强来校任教员。第四届高三小毕业生，除杨树宇、郝世荣被银行招收工作外，杨恒礼、康兰英、尚立孝、张秀兰、叶荆兰等二十多人考入伊盟一中。

一九五五年，学校规模没有扩大，校舍也没有扩建。这一年充实教师最多，从乌审旗调回周蕊莲任教导主任，刘继祖任副教导主任；盟一中毕业的简师生张茂林，包头师范毕业生唐孝，呼

市师范毕业生杨增、范璘、张世旺、慕雨生，以及从杭锦旗调来的孙沛等任教员，师资队伍实现了标准化。这一年，第五届高小毕业生有四十多人。康润清、张桂林、张同仁、王福义等考入伊盟一中，有的社会招工招干参加了工作。

一九五六年，学校人事变动较大。刘继祖、白治仁调盟一中任教；崔自强、阎文清提任农村学校教导主任；张茂林、范璘、张世旺投考呼一师深造学习；调李志立担任教导主任，张美荪任副主任；普师生张万元、张文选、于忠文和呼一师简师毕业生宁自成、陕坝师范毕业生张义等来校任教员。这一年，第六届高小毕业生共五十多人。当年伊盟一中初中招生数增加了一倍，这届毕业生基本全部进入盟一中高中班。

东胜市第一小学是东胜教育史上的摇篮。从一九二八年创建到一九六八年的四十年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抗日战争前朱叫学堂，后叫初级小学，基本处于时办时停的状态，为东胜的启

蒙教育奠定了基础，培养了第一代有文化的人，如解守英、郭文明、高耀先、刘鸿龄、边凤林、冯进义、刘开亮等。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东胜第一小学由初级小学发展成为完全小学。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共送出四届高小毕业生约一百多人。杨广才、王怀智、王怀纲、李华、白永厚、郭守诚、张存礼、杨效彩、郭文光等东胜第一代大学生就是在这所小学启蒙的。

解放后，东胜人民获得了新生，东胜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东胜第一小学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送出近二百多名高小毕业生，除逐年少量就业外，绝大部分继续升学深造，成为解放后第一代有文化的新人。他们中间好多人，现在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解放后东胜第一小学保持和发扬了好的教学传统，一直是全盟小学教育质量最高的学校，师资质量比较高。一九



五二年，张茂林获取全盟中考第一名；一九五三年，康迺清获全盟中考第一名；一九五四年，杨恒礼获全盟中考第一名；一九五五年，张桂林又在全盟中考中夺魁。该校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解放后一直居全盟首位。主要是他们认真贯彻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树立了全心全意对教育事业负责的思想，教师做到了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认真批改作业，每天早上坚持一小时的政治业务学习，每天晚上坚持二小时的备课和修改作业，当天作业当天改完，从不用多布置作业压学生，课堂教学力求做到当堂消化，不留“剩饭”给学生吃。那时候，教师工资待遇开始是二百多斤小米，后来改为薪金制，月薪最多三十六元，最少只拿十八元。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热心，工作再苦再累不说一句怨言。在大家的努力下，东胜第一小学越办越好，美名长传。

我只把东胜第一小学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五六年的简要情况作了忆叙，很不完全，希望知情

者给予补充。至于一九五六年以后该校的史实，因我已不在这所学校工作，情况了解甚少，请知情者补叙为好。

# 河西师范学校始末

王 昕

河西师范系绥远省设立的一所培养师资的学校，地址在东胜县城郊。该校从一九四五年开办到一九四九年结束。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它走的是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其设备简陋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罕见的。情况虽然这样，但教师的认真负责态度和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是远近闻名的。在那种困难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终于完成了四个班（约二百名学生）的毕业任务。回忆当时的绥远省教育厅长潘秀仁、第三区行政专员陈国楨、东胜县县长樊库等人，对东胜的教育事业还是办

了一件好事。在不长的四年里，仅校长就调换了三人。这三位校长在办学上虽尽到了一些责任，但在经济上都程度不同的捞了一把。正当全国解放的时候，河西师范四个班的学生相继毕业了，这给东胜和部分旗培养了一部分人才。现在，这些同学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县团级干部、科股级干部和中小学教师遍布全盟各旗，其中有不少人已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 建校与开办情况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东胜县属于绥远省管辖，又是第三区行政专署的所在地。全县仅有几所小学，除城内和罕台庙两处小学象样外，其余几所与私塾无异。群众说：“我们让孩子认得糜麻五谷就行了。”

专员陈国桢、县长樊库看到东胜教育事业的落后局面，以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名义，上报绥

远省政府要求在东胜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当时包头也在报请成立师范学校）。在东胜、包头两地的竞争中，于一九四五年春正式批准在东胜开办省立师范学校，定名为河西师范，任命专员陈国桢兼校长。一面配备教职员工进行筹备工作，一面通知各旗准备招生。陈国桢任命郭良田（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为教导主任）、赵月丰（专署的科长为事务主任）、王士英（县政府的协理为数学教师）、王桥（警察局长为体育教师）、奥书斌（邮电局长为音乐教师），还有部分专职教师，如语文教师郭即安、许锡五，生物教师秦汝霖等，兼职教师包括校长在内都是兼职兼薪，有一定的教学水平。

筹建时绥远省政府只拨给开办费、办公费、教职员工的工资及学生的膳食、衣服、学杂等费，其余费用一律从简。校址由专署选定在东胜县东门外一公里处（原为干部训练班的旧址）。这里有旧土房八排，每排十间，师范学校只占用

了一半，其余的仍归于训班使用。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随后新盖了两座教室、一个伙房，全部都是土打墙、椽盖顶。学生的宿舍都是利用旧房。有一个礼堂，能容纳四五百人，也是土木结构，四面用四十八根柱子撑顶。上课的教室是土房，学生坐的是土台，写字用的是土桌。

招生是在当年的五月份进行的，各旗（县）的考生按规定时间和指定地点统一进行考试。当年招收了两个班，即第一班和第二班，共一百人左右（外省的一般不收），七月份正式开学上课。在设备简陋条件不好的情况下，由于教师的认真教学，学生才有一个安心学习的良好秩序，确实做到了地方、校方、家长三满意。在此基础上，学校又报请省政府批准，于一九四六年夏又招收了两个班，即第三班和补习班（第四班），两班是一起招考的，成绩好的为第三班，成绩差一些的为补习班，补习一年后为第四班。

## 学生与校方的纠纷

学生的伙食标准很低，每顿饭除了小米咸菜别无它样，肉面之类的食物根本见不到。上级规定每年给学生发一套单衣，二年发一套棉衣，而校长陈国桢改为二年发一套单衣，一年半以后每人发给一件破皮衣。学生用的笔墨纸张上级也有规定，而校方不按数供应，造成“吃穿不足家中济，用品不够个人筹”。纸里包不住火，时间长了学生也听到了师范学校的待遇标准，又打听到本省和外省的师范学师的标准都高于这里，因此学生与校方逐渐有了对立情绪。开始是暗中议论，随后指明骂事务主任赵月丰，要求公开标准、公布帐目。于是耍衣服，耍伙食，反尅扣的行动此起彼伏，有时形成自发的集体行动。有一次围困了事务处，并高呼“不准尅扣，改善生活”的口号。这样，弄的陈国桢束手无策，内心里十分矛盾。如果以强硬手段镇压学生吧，本来

自己手脚不干净，怕闹大了，反为自己不利；不理吧，时间长了越闹越大，纸里包不住火。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天学生张德茂家中为给干训班加工小米问题与管理员发生口角争执，由语言冲突打在一起，当时又来两名学生燕国珍、张永胜也凑在一起添拳打人。这一架打的给陈国桢、赵月丰有可乘之机，他们以打一儆百的手法，第二天派保安队荷枪实弹控制了学校，把全校师生集合在大礼堂对学生进行训话，斥责学生无理取闹，后将三名学生交保安队押回专署审讯，就便关了禁闭。两个月后，校方以打架闹事的罪名，将这三名学生开除出校，并向家长追回学费两千元。回忆一下陈国桢等人究竟贪污了没有？！其实他们都大大的捞了一把。事过不久陈国桢就被调离学校，据说与此事有关。

### 教师的大变动

一九四六年末和一九四七年初，陈国桢被调走后，教育厅任命李雨化（北京师大毕业）为河



西师范的专职校长。李雨化上台后将从前的人员全部撤换，任命王季明(北师大毕业)为教导主任、周善德为总务主任，英语教师王立斋(大学程度)，数学教师刘海宽(大学)，语文教师张之繁(大学)，钱学之(大专)，理化教师刘克让(中专)，音乐教师李雨田(中专)，体育教师陈德(专科)，图画教师王书荣。从上述情况来看，师资质量是比较高的，相应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李雨化到任后，绥远省将河西师范改名为包头师范，校址没有变动，任命王书荣专负三青团工作。这时学生的生活略有改善，每人发了一套单衣。在经济问题上李雨化比陈国桢巧妙些，他除尅扣部分学生的费用外，还上报了教职员工空额十余人。

由于学校改名为包头师范，李雨化本人和全体教师都报着作客思想，认为东胜不是久居之地，待机迁往包头。学校开办将近两年，既无建筑，又无设备，学生的课外活动除有两付木头篮

球架外，其它设施一无所有。教师的家属全是借民房居住，这就给历任校长造成贪污的好机会。

## 迁移校址

一九四八年二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准格尔旗各镇。当时东胜城内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并进行反宣传，群众恐惶不安，有些士绅、大户和公职人员的家属已开始向包头迁移。河西师范学校乘时局紧张之际，报请绥远省政府迁往包头，但省政府因包头校址未定不予批准。同年三月底，人民解放军占领了神山地区（距东胜四十华里），东胜城内陷入混乱状态。学校采取边收拾动身边请示报告，先将教师的家眷送往包头，同时决定学校暂迁达拉特旗天义长。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二日由东胜出发，除公用物品和部分行李雇车拉运外，全体师生一律步行。原规定集体行动，实际上乱如一团，走了三天才到了天义

长。这个地方地形宽广，人情憨厚，靠近黄河，对岸就是包头。师生的宿舍都是借用民房，安排就绪后正式开始上课。先把途中误下的课补上，之后继续进行正常课程，大院和场面就是唯一的教室。在两个月中把所有的误课都已补齐，接着暑假到来，第一班和第二班是本学期的毕业班，学校决定于六月下旬由教导主任王季明率领赴绥远、包头等地参观学习。在参观过程中由学生刘继祖兼管总务，先后在包头参观了五所小学、三个工厂，在绥远参观了五所小学，随后回到天义长举行毕业典礼。放暑假后毕业生等待分配工作，在校生放假回家。就在这时东胜将要解放，达旗更为吃紧，绥远省政府批准学校迁往包头，暂住东河区文昌庙十字大街，租赁了一所民房——毡匠大院，做为临时校址，教师们在大院集体居住。在未开学前，经校方与当地政府联系寻找校址，一月后校址决定设在包头东门外一个旧兵营（即现在的第三医院），全是砖房，但破烂不

堪，大营房内的放枪架、瞄准台到处皆是，经校方大致整修后初步分开了教室、宿舍和教师的办公室。

## 李雨化垮台

李雨化在任职一年多里不比陈国桢好多少，只是在手法上比陈国桢巧妙一些。他在给上级报教职员工名额时，假捏名字，虚报名额。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派来一个督学到绥远视察教育情况，来东胜住在县参议会。到校视察时分别与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谈话，当时刘继祖将自己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作了介绍。督学说：“你们不要怕，写成材料签上名交我带走”。随后由刘继祖、李涛、郭瑾三人写成材料交督学带回教育部。开学上课后不久，上级给予李雨化撤职查办处分，随即任命李崇德为校长。李雨化被撤职后，经过多方活动其查办问题也就不了了之。新任校长李崇德让他表弟刘继之任教导主任，原教导主任王

季明为教员，其他教师变动不大。这时因时局吃紧，学校经费开支十分紧张，有一两个月只给教师发点生活费。

## 二次流浪

大约在一九四八年的九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包头的消息广为流传，国民党军队扬言要固守包头。后校长接到当地政府的通知，让全体师生准备撤离包头，逃往后套，次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一夜之间逃跑尽光。当校长带领部分师生撤离包头时，沿途人山人海，吃住无着，数日内在后套收集师生时学生缺三分之一，教师缺王季明、李荣二人（这二位教师根本没有走），学生有走亲串户的，有回家避风的。解放军进驻包头后秋毫无犯，除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初步建立政权和恢复商业外，并把未走的教师和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联合中学，校长吴平（解放军派的），王季明为师范部主任，李荣为教员，

校址在包头一中，未走的师范学生也在联合中学上课。快到一个月的时间，解放军因战略上的需要奉令撤退包头，他们在未走之前向广大群众说明情况后全部撤离包头。时隔一两日，国民党的党政军又全部返回包头，张牙舞爪不可一世，把个别没有走的公职人员和给解放军做了点工作的人进行三审查五谈话，纠缠不休。同时，社会上流传着国民党要捕人的说法，随后经过城防司令邓宝珊说了话，群众才免遭灾难。随着情况的变化，联合中学又分了家，河西师范的学生仍回原校址整顿复课，校方在街上贴出通知，要求学生限期归校。同年十月下旬正式复课，因逃跑耽误了课程，故将寒假推迟一月。

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学校很安定，不但毕业了第三班，还招收了两个简师班、一个普师班。后半年的九月绥远和平起义，后来把这所学校正式合并到包头市第一中学的师范部（包括人员、财产），任命王季明为包一中的教导主任，其他

教师仍担任教学工作，原来的河西师范就此告  
终。

# 古老的民情风俗

王之平

在封建制度统治下，东胜蒙汉两族的婚丧礼节、生辰满月、祝寿贺喜、春祈秋报、穰灾祈福，卜筮算命、求签问卜等习惯，沿袭了多年的封建遗俗，杂以满族习俗而形成。

## 一、汉族婚礼

汉族婚礼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无自由的包办婚姻，往往在结婚时夫妻才第一次见面。重视“门当户对”，允许一夫多妻、养奴蓄婢。由于贫穷，“童养媳”很普遍；还有“换亲”，即甲乙双方各以自己的一女换给对方的一子作妻子，免得互出彩礼。



其婚姻手续，男女双方的父母认为子女可以匹配，由男方请起双方都信任的人作为牵线“月老”，携带礼品去女方家商话。征得女方家长同意后再履行“问名”、“换帖”、“合婚”、“纳彩”等手续。

“换帖合婚”是，男方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时写在红纸上，叫“庚帖”、“月老”持庚帖去女方家换回同样的帖；男女双方家长获得对方庚帖后进行合婚，请测字先生测字，以求稳妥相合。

彩礼，彩是衣料等，有钱人家要洋货，如泰西宁绸、德国缎、湖绉茧绸、明花葛、织贡呢、印花布等，穷人家只要两身土布衣服；礼是钱，有钱人家要银50—100两，银币50—100元，穷人家起码得20元。合婚无问题，彩礼也商量通了，方可举行定婚礼。定婚后男方给女方每年七月十五日送面人一对，八月十五日送直径一尺三寸，包馅“囍”字大圆月饼四个、大西瓜

四颗，一般送一至三年。

到十八至十九岁时，男方选好黄道吉日，由“月老”携带酒二瓶、羊一只或一件，去女方家商量（也叫探话），女方同意后可举行婚礼。到了迎婚日，男方带上四支斗（即白面、炒米、红枣、绿豆，别名四包）和催妆糕点（即糕鱼两条；大馒头十个，意思要催促新娘尽快妆扮，以便及早回程），有钱人家备上骡驮轿或轿车、马车等，穷人则骑马或骑毛驴，娶送戚是男方三（一女二男），女方四（一女三男，女方如系神木人送戚可二三十人）。还有些禁忌，主要指娶送戚女人，凡是寡妇、活人妻和不生育的妇女均不得参加；另外“姑不娶，姨不送，姐姐送了妹子的命”也是一大禁忌。娶送戚中男女双方必须有外祖家一人，所谓人主。新娘在临近婚期前三天就不敢吃东西或少吃点鸡蛋，为新到夫家二三天内方便。

新娘上轿前，头发打一抓髻，穿好夫家送来的装新衣服，上身内穿红布阻腰子，足穿公爹的

毡靴，手中握着红布裹住的酒壶，面部蒙“盖头”。这时新娘思想感到异常，总得哭注一番，以不离开父母之悲泣。接着由男送戚一人把新娘抱上轿或马车，鼓乐齐奏，鞭炮齐鸣，亲朋相送一段。

新娘轿子一到夫家门前，锣鼓喧天，鞭炮震地。新娘轿落地后，由女娶戚陪伴新郎伸手将新娘的黄毛拔三下，再用梳子梳三下，这是因为嫁前是留头大闺女，黄毛不准动一根。再由男送戚一人（一般是新娘外爷家的人），把新娘抱到香案前，或在红毡上走过来。此时，还有一名念颂歌的，手持盛器，内放红枣、铜钱、彩纸屑、桃杏核、五谷等，随着新娘边走边撒，口中念念有词。香案上放着灯斗，内盛谷子，上插衡器、弓箭、镜子及新娘一路上手中握的酒壶。斗壁正面贴着红纸，纸上写着“小登科”三字。另有“某姓氏三代宗亲”黄纸牌位。新郎新娘并立香案前，一齐跪倒连叩三头，谓之“拜天地”。从新娘落轿

到这一段时间，寡妇、留头女子一律不准露面，农村的碾磨代表“青龙”、“白虎”，都用毡被盖严，以防冲着新娘不会生育。

拜罢天地，新娘由女娶戚搀引回洞房，新郎将“灯斗”抱回洞房，放在炕桌上一盏长明灯，新郎给新娘揭掉“盖头”。当晚要“闹洞房”，由亲朋邻居中青年男女们提出要求，让新娘说“绕口令”或唱山歌等，闹个半宵，博得大家大乐一场。接着送来“消夜茶”、酒壶、馒头供新郎、新娘吃夜餐。公婆前来“引孙子”，在洞房门外背些吉利的、盼望早日抱上孙子大富大贵之类的顺口溜，随手把枣、米、糖、茶食等丢入洞房，新娘、新郎拾食之。

次日早晨起来，首先给新娘拔“黄毛”，梳洗打扮，把抓髻改梳为妇式的“把把头”或“盘盘头”，头上戴上钗环首饰及项圈、手镯、戒指等。上身穿装新左衽衣，下穿宽裆裤外加大袄裙子，足穿红花鞋。新郎除着装新衣裤外，再加长

袍马褂，头戴碗檐盔或礼帽、瓜皮小帽等，足装绒鞋或双脸布鞋等。新郎、新娘穿戴齐整，并立香案前，案上供着本家各先辈神主牌位及香蜡灯台供献等，由司仪一人掌握开始“认大小”。司仪唱：“向列祖列宗行四拜礼”；接着念外祖家亲戚称谓，再念父母、兄嫂、姐姐、姐夫、姑姑、姨姨、本家堂伯叔父、母、兄、嫂以及朋亲邻居的长者各叩三头。在行礼过程中有一人持一盘，给谁叩头向谁索要拜礼钱，按其亲、疏、贫、富随意付给，也有给实物的，如衣料首饰等，外祖家礼重点。还有一条“礼尚往来”的原则，彼此在红白事务中付礼数相等。最后夫妻交拜礼成。“认大小”后，新娘在洞房中坐在凳子上，长辈进来必须站起，以示尊敬。

第二天或第三天早饭后，新娘拜辞神主和公婆，由送戚领着新郎和新娘到岳父家，叫作“回门认亲”。新郎拜认岳父、岳母后，小舅子们想方设法百般耍笑，出各种难题让新郎做。特别是

饺子馅里包上辣椒等，闹的新郎无法应付。期满岳父家派人把新郎、新娘送回新郎家。如此，结婚全过程就结束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倒数千年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婚姻形式及结婚仪式大同小异，仅在礼节服饰等方面稍有变更。如在城市，悬挂国旗，由司仪按程序逐项进行，首先宣告新郎新娘就位、奏乐、来宾就位，向国旗行三鞠躬礼，主婚人讲话，证婚人讲话，大意是从问名、纳彩、到探话、结婚经过，以及鼓励新婚夫妇和睦相处，成家立业等。

服饰方面，男人剪掉大辫成为二毛子，也有剃成光头的，但不是普遍的，头上不戴缨帽而戴礼帽或瓜皮小帽，足上不穿靴子而穿平底布鞋；女人头上不戴头箍，不穿挽袖大袄，而穿窄袖紧身上衣。这~~是~~是少数人，余皆依旧。还有封建余毒较深的男人脑后仍然拖着大辫，妇女仍然缠足，放足的妇女很少。

1925年以后，在城镇结婚以行鞠躬礼为标准，叩头者居少数。男人由长袍马褂改为中山装，女人一律穿紧身衣裙。自民国以来，法律虽然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夫妻不睦，可以离婚，但执行者寥寥无几。有钱有势者，仍可多妻。离婚虽然取代了“休妻”，但真正能离者，万人中无一人，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情况下，逼死无辜妇女者，时有所闻。

## 二、生辰满月

在封建意识浓重和重男轻女的年代，除婚后正常生育者外，凡数年不生的妇女，四月初八日要去奶奶庙拜神拴儿女，得子后有的起名叫拴儿子。生婴儿几胎不活，最后活下的要请巫神保佑，就叫张保、李保等名字，并戴锁儿（用红头绳结扎，拴上铜钱和一把锁，每年过生日戴一次，直至十二岁过生辰，请原保锁的巫神在“佛”前开锁，并用重礼酬谢巫神，从此就不再

戴锁儿了)。有的生下婴儿恐怕不活，假装出去，预约好人留回来，起名张留住、李留住等。生婴后第三天，要进行“三朝洗儿”，用艾叶汤洗，以取卫生。洗儿节有亲朋送礼者，过满月时必须请来以酒食招待，农村则用糕面，以取糕粘而拴长寿之意。

有的人到六十岁的生辰开始祝寿，亲朋也来祝寿，晚辈还要磕头拜寿，每年如此。来祝寿者需带礼品，如点心酒类，一般是送寿桃（桃形大馒头）十二至三十六个，以取蟠桃长寿之意。

### 三、丧葬祭礼

（一）初亡。先烧“倒头纸”。做一碗半生熟的米饭，谓之“倒头捞饭”，供在尸前。按岁数每一岁用白纸一张外加两张剪成连三页，用白线绑在木棍上挂在门前，谓之“冲天纸”。寿衣男穿袍褂女着衣裙，内衣用红色料，谓“上红儿家，下红女家”。头戴便帽，足穿“莲花鞋”



(鞋底上缝一朵莲花)。棺底铺褥，尸上盖被，均用红色料。然后举行“入殓”，口里含一枚铜钱，谓之“口含钱”。夏天在尸两侧放香把或锯末，用以防渗。捏七个面饼统在袖中，谓之“打狗饼”。虚掩棺盖三日开棺，尸脸擦油，谓之“开光”。然后将棺盖钉死，死者一生的优、劣、美、恶从此就“盖棺定论”了。

孝子、孝女从头到足穿白布孝衣，手持“丧棒”到各亲戚家报讣并磕头，途间每遇熟人就要磕“报丧头”。将灵柩移于院中灵棚内，设供桌、香案、烧纸砂盆子。亲家和女家要献饌(八大碗菜)。亲朋来吊唁携带麻纸一刀，供献馒头十二至二十个。来吊唁者都要在灵前烧纸叩拜，孝子在后陪着亲朋逐一叩拜。早、午、晚上烧香纸，每晚由孝子、孝眷(女婿)伴灵。不论安葬前后，每七天过一次“七”，每次无论在家或坟地都要烧纸上供献，直到第四十九天即第七个“七”为止。

(二)念经超度。请来僧道设起经堂，有“昼夜经”一天，“预报经”二天，“启正经”三天。早饭后开始念“依山文新经”。上午送三道疏，即“往生文疏”、“度亡文疏”、“升天文疏”。一疏念“华严宝忏经”、“刀兵忌经”，一僧手撒红枣、铜钱、米至灵堂。众僧吹奏笙管枚笛和打击乐器——铙、钹、大钹、锣、鼓等。下午行道念“滴文”。傍晚“坐道场”，念“金刚经”。夜间“游莲池”，念“往生咒”。“启正经”三天，加念“梁皇宝赞”，“大悲十小咒”。在各次活动的念经间隙中，吹奏乐和打击乐交替进行，一直到结束。

(三)烧纸火。有纸骡、纸马、童男、童女、金山、银山、金银斗、冥宅(俗名斗库)，分“楼斗库(无大门院墙，又各跳崖斗库)”，“三五间”，“五七间”，“七九间”，外跨围房。出殡前，先由女儿和儿媳们将主副食及茶食点心、斗库馍馍(四厘米大)装入“库房”、

“厨房”内，谓之“装库”，然后由孝子、孝女、孝孙、媳妇们举行拜库，最后点火焚掉。

(四)出殓。亲朋送的挽联、挽幛悬挂于灵堂左右，在扬幡行道中，各种纸幡、香幡、挽联、挽幛等都要扛出游街过巷。出殓前举行辞灵焚香、烧纸，祭奠后撤去肴饌供献等。开始动灵，孝子、孝女、孝孙、媳妇等要大哭一场，打破烧纸盆移柩上车或绑卧牛抬杆，由八付十六个青壮年交替抬到坟地。途间有亲家和女家作的八大碗肴饌，摆在路旁谓之“路祭”。媳妇由娘家，女儿由婆家，给一件衣料斜围在肩上，叫作“收头”。在棺上放一雄鸡，谓之“引魂鸡”，“冲天纸”也放在上边。“引魂幡”固定由孝长子或“承重孙（长子的长子）”亲扛到坟，插在坟顶中央，其它除挽幛外，冲天纸、挽联、香幡、纸幡等完全烧掉。在灵柩下墓穴前，孝子要给人主家（女是娘家、男是舅家）斟酒磕头，得到允许后方可下墓埋土。

安葬后第三天要“复三”。孝子、孝眷和近亲们带上香纸供献，焚香烧纸后哭祭一番，特别要在坟地炸油糕扑撒一番，据说是给亡人安锅。

#### 四、日常小节日

1、每月初一、十五日，要给神主、财神、灶王爷烧香、敬表、响炮、磕头，并改善生活一次。

2、大年初一。从腊月中旬就开始准备，每个人都要从头到足换新衣、鞋帽等，全换不起的也要拆洗干净。铺盖要拆洗，室内外大扫除，门窗玻璃擦洗干净，墙壁粉刷一新。进城办年货，如买香烛、纸张、调味品、鞭炮、双炮、麻雷等。做年饭，如蒸糕、蒸馒头、擀豆面、烧肉、炸丸子，压粉条等。请先生写春联，如“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粮仓上写“千粮万石”，门头上写“出门见喜”，房梁上写“抬头见喜”等，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春联上。

黄昏前贴上春联，垛起“火龙”，上祖坟、龙王庙点“火龙”、焚香上供，然后全家人享受丰盛的晚餐。家门大门挂灯笼，各屋长明灯，人们玩乐通宵不眠，谓之“熬年”。雄鸡一唱，各家先放开门炮迎接新年，而后在神主、财神爷、灶王爷前焚香上供，点“火龙”放鞭炮，上庙祭奠一番。晚辈要向神主及长辈拜年磕头。亲朋邻居一见面双手合十，都说“见面发财”。相近的人彼此互请吃年夜饭，富家美餐吃到月底，贫家糕、米窝窝等也吃到正月十五日。

3、正月初五“送穷日”。人民常年受穷，无法摆脱，这一天把扫下的垃圾送出去，口中默念：“穷媳妇穷，早离我家门，一炮送在五羊城，路过某家打一间，最后某家扎老营（某家暗指附近的地主家）”。

4、正月初七“人七”日。这一天也叫“过小年”，一切和过老年一样。庭院大扫除，神祖前焚香上供，响鞭炮，吃饺子，通宵长明灯，终

夜不眠叫“熬人七”。传说除夕魂走了，初七还能回来，初七夜走了就回不来了。所以门前用灰封锁了，门槛外放上炭和刀。一些老年人在炕头还放着刀斧宝剑等，以防魂走。

5、正月初八“接新神”。黎明时神祖前焚香上供，响鞭炮，点“火龙”，磕头礼拜迎新神（因去年腊月二十三日，旧神已送走）。

6、正月十五“元宵节”。城镇十四至十六日大办会场三天，唱二人台，玩狮子，舞龙灯，踩高跷，大头人，扭秧歌，走街串巷，游行演唱。晚上点“火龙”，响各种炮，放各种焰火，四乡农民都进城看热闹。有的地方栽九曲黄河灯，让人去转，转错就出不来。为了禳灾祈福，庙里出符，人人配戴，以防疫病。到十六晚“纸烛银船照天烧”，谓之“送瘟神”。

7、二月初二日“龙抬头”。这一天龙王庙要开门（上年十月初一闭庙门）。有的地方举办“平安会”，敬神上供，家家户户用米面捏灯盏，

添油插芯在神前点着。有的“围灰蛇”，抓一把灰，把自己围起来然后跳出去，再用水壶从井上装上水，沿路洒一条线引回家中，谓之“引钱龙”。这也是禳灾祈福，求得一年通顺丰收富裕之意。

8、“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不在家”，是指农事活动，蒜和许多菜秧（准备收籽种的）节前一定下种。

9、五月初五日“端午节”。门上贴画有雄鸡的画儿，小儿胸脯上也戴彩布做的鸡儿。为防毒虫蝎子，小孩还用雄黄酒抹额头，每家都要吃粽子，以纪念屈原。

10、七月十五日“鬼节”。这一天下午举行“盂兰会”，由僧道念经超度屈死冤魂。儿女们去野外朝着埋葬亲人的方向，烧纸上供祭奠一番。这一天家家户户蒸“面人”，送给小孩。农民要宰羊，吃炖羊肉。

11、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天上月儿圆，

地上人团圆。有诗云“月到中秋夜，光辉分外明。离人当此文，不尽故乡情”。当此秋高气爽之时，游人在外，总有思恋故乡之情。家家都要烙月饼，晚上赏月，院中设香案供献上月饼、西瓜及各种果品。农民中午吃炖羊肉，晚上吃月饼及瓜果。

12、腊月二十三日“祭送灶君”。晚上准备好草料、米糖在炉口前念“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西天；草谷节料谷节，吃得马儿驹蹶子；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一块米糖糊住嘴”。灶王爷上天向玉帝汇报一年的工作，正月初八日再迎新灶王爷来。

## 五、迷信活动

(一) 庙会。主要是“春祈秋报”。特别是龙王庙，农民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农牧业丰收，就许愿唱戏，有的因病或其它灾祸也要许愿唱戏。到了庙会期，富者唱一至二天，贫者唱一出



戏，或者杀羊领牲摆供。这时各地行商小贩汇来，设摊卖货卖饭，农牧民买卖牲畜等。实际是春祈秋报兼物资交流。

（二）谢土。一般是农村活动的多。凡遇逆事或重病大灾祸，认为动了不应该动的土，惹下土神爷，就焚香上供许口愿，请来平事（阴阳）念经谢土。死了人也要请平事念经下镇物，死人埋葬后，还要谢后土，以保家中吉祥和人口安全。

（三）求签、问卜、算命。凡遇危难之事、行人走失、灾病大难或想知道流年运气，就上庙求签。求签者焚香跪地，说明所求事物，手摇签筒，甩出一支竹签，根据签上号码查签簿，解释神赐谶语含义。

问卜是卜者以“尚经卦”、“诸葛孔明马前课”或“一掌经”等为依据。问者手摇铜钱或随便写一个字，卜者找到课题按卦辞含义作解释。

算命是求算者说明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算者按天干、地支及五行相生、相尅等法，

推算你一时或一生的事业成败，吉凶祸福，富贵贫贱，寿命长短，儿女多少等。

（四）巫神。东胜地瘠民贫，文化落后，缺医少药。无论大人小孩，一患病除城镇部分人求医服药外，大多数人都是请巫神。请来巫神先要围坛布，插香米（一律归巫神）。顶神的人叫“马童”，求者沏上茶给“马童”饮上，一喝茶巫神就下马了。求者净手焚香，虔诚祈祷，求神医病，巫神便咬牙切齿，乱动一阵就开口了，先吹一通神的威风灵验，然后说一些病因、病症及治疗方法，最后把香灰收起给病人服上；或在黄纸上画一道“符”，火化后给病人服上，以观疗效。如病人家有油水，巫神不是说“家鬼作祟、坟内有问题必须解破，否则后患无穷”；就是说“灵魂被鬼摄去”，必须取“魂”。取“魂”要的米和布更多，谢礼也不少。

## 六、蒙族的习惯与礼节

(一) 码尼红杆子和一些禁忌：杆前不准撒尿，杆后乘马不能行走。马鞭子不准带入住的屋，否则就认为污辱了主人。以马厩为中心，来客要小便时，男向东女向西，不能混淆。

(二) 见面礼：喇嘛如回到自己的家里，弟弟、妹妹必须两手持平，口说“架！阿木勒赛”！双手献哈达，还要行磕头礼。在愚民政策下，蒙族同胞绝大多数把自己的前途，一生的吉凶祸福，儿女运气，寄托在一个“佛”字上。有的蒙族人民背上负着元宝、银锭，从家中起用等身头（前一个头印是后一个脚印的起点）磕到五台山上去上“布施”。他们认为喇嘛就是“佛”的传话者，所以给自己的喇嘛兄还要行如此重礼。如果平民遇到平民，开口便是：“架！阿木勒赛（好）”！边换鼻烟瓶，边问“波浪赛”、“亚玛赛”、“活尼赛”、“马勒赛”，“五哭勒

赛”、“铁也赛”！即先问雨水、羊、马、牛、骆驼好，最后才问人好。

（三）蒙族生辰：生下第一胎，无论男女第一生辰前不剃头，生辰以后由外祖或舅父剪下十绺头发，缝在布包中，戴在颈项一直到十二岁为止。生辰礼物，送一盘“本儿酥（饼）”、一块砖茶，送钱多少不限。用羊背子招待亲朋。

（四）庆八十：不是在生辰那一天，而是在过年那一天庆祝一次，二月初一日再庆祝一次。亲朋需送羊背子、砖茶、八个饼子，送钱多少不限。来客都要给八十老人磕头拜寿。招待亲朋一般是放“五叉”吃手抓羊肉和喝酒，人们边喝酒、吃肉边奏乐，男女老少一起唱，直至酒酣人醉为止。

（五）一般节日：

1、每月初一、十五日都要敬神，改善生活。

2、清明节：大祭祖先，献羊背子、本儿

酥、奶茶，全家人都要磕头礼拜。把羊肉撕一块，拿一块饼子放入奶茶中，向祖先及四方扑撒一番。

3、腊月二十三日祭皂王爷：一般是煮羊胸祭灶，将羊胸煮熟后剥下胸茬肉，另贮存，三天不见人，留作以后招待贵客；再把羊腓骨抽去，把肉翻过，在凹处放入酥油、枣、软米、大米、酪旦子，做熟后大部分食用，少部分用五色绸缎包好，跪在灶火口双手托在额前，口念“来年平顺，牲畜旺盛，人口平安，万事大吉”，最后把彩包投入炉口。

4、过大年：在院中央撒两条沙线，摆上香柏煨着火，再数上三百六十根苕芄，一端裹上棉花蘸上酥油点着火，由家长手持向东南西北四方转一圈，以祈求一年三百六十天太平无事。然后，再把羊背子、酥油、酪旦子、饼子等各种祭品分一点，放在碗中，向东南西北四方各扬三下，扬完为止。

5、正月初一日接新神：仍是过年的礼节和祭品，男女都穿长袍，妇女要戴“头戴”，都要跪下磕头，以虔诚的心迎接新神来临。回到家中，晚辈要给长辈磕头拜年。

# 宗教信仰

王之平

东胜市蒙汉两族人民都信仰释迦牟尼佛教。蒙族以召庙为基地。较大的召庙内有活佛为总领导，下设各级各类僧官，有管僧徒学习经文的，有管理经库的，有管理日常上独瓜（大殿）念经的，有管理袈裟穿戴的，有管理跳鬼面具衣着库的，有管理人们前来做法事的，有管理众僧火食的，也有管理财产及采购的，还有掌印僧官（也叫掌印大喇嘛）。

一、市境西部最大的喇嘛召——陶黎庙。该庙始建于十六世纪初，距今四百七十年左右。建独瓜十二座，计一百一十八间，喇嘛宿舍六个院。最兴盛时有喇嘛二百多人。原来是活佛制，活佛名叫葛勒掙柏林第，五十年前外出死在河套。以后废弃活佛制，三年一届在全体喇嘛中民

主选举大喇嘛。

经库一座，内藏经卷有：桑兑，顶木，曲格，当郎鄂托，桑格沁鄂托气，阿勒亚补隆，牛利，阿拉吞格勒力，达拉勒，当郎补拉合得束独勒，西木勒山，干竹勒，单竹勒，阿拉奔当格仇等。这些经卷都是藏文本，包装十分精致，均毁于十年浩劫之中。

铜质乐器、盛器和袈裟有：依肯卜勒（大号）十四对，银包一对，铜饶钹三十对，肯纳二十对，格阿格利（小号）十对，冬（海蚌）十对，茶筒二十对，茶壶八个。大小铜器共计一千五百件。在十年浩劫中，这些铜器大部分流落于群众手中，一部分卖给供销社。

大独瓜拆卖了一百一十三间，仅剩五间念经用的毯垫2尺×15尺的9块，2尺×8尺的五十块，背**靠**毯三十块，坐毯两层。跳鬼用的衣着两套计一百件（都是缎子的）。鬼脸头戴五十二个。七蜜各、瑞金、五十二人的全身穿戴、



喇嘛念经时头上戴的杀色勒（鸡冠帽）二百顶，占裙二百件，披衣袈裟二百件，还有跳鬼时穿的靴子和厚底马靴等物，全部毁于“文革”之中。

陶黎庙最盛时有二百多名喇嘛，解放初期还有八十多人，以后流散的剩下五十余人，还俗娶妻和外流到鄂托克旗、杭锦旗当蒙医的二十多人，现在仅剩下喇嘛三人。

二、各地较小的召庙有：山炭庙，独瓜、僧舍约五十间。板儿色太庙，独瓜、僧舍约四十间。巴音特勒亥庙，独瓜、僧舍约二十间，解放前已毁掉。阿鲁独木庙，独瓜、僧舍约七间。解放前已毁掉。木勒古清庙，独瓜、僧舍约四十余间，全盛时有喇嘛二十余人。吉劳庆庙，独瓜、僧舍约三十间，曾有喇嘛十余人。哈拉不拉庙，独瓜、僧舍约二十间，曾有喇嘛十余人，喇嘛白板定解放后被选为人民代表，“文革”中被遣送回家。阿贵庙，独瓜、僧舍约三十间，曾有喇嘛十四人，一九五八年拆毁。罕台庙，独瓜、僧舍六十间，

全盛时曾有喇嘛七十人，经卷、袈裟、跳鬼穿戴、乐器等都齐全，小庙陆续拆卖掉，三座大独瓜及僧舍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拆毁。

以上各召庙，除解放前被毁掉的外，其余都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封、资、修”的东西被拆毁。

# 百年以来东胜地区的植被变迁

刘懋功

东胜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中东部，总面积二千二百平方公里。这里资源丰富，煤炭储量很大。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东胜将是祖国未来的能源基地之一。

东胜属丘陵地带，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远的不说，就近一个世纪以来，东胜的植被和水土流失的变迁，就足以说明人类由于不懂得合理利用土地，进行无休止的开荒、毁林和掠夺式的耕作，破坏了植被，使原来一个林草丰美的地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东胜是我的故乡。我六十年代在东胜工作时，每逢下乡总爱顺便走访一些年迈的老人，结合我童年的记忆，可以说她原来确是一个春来满

山披绿，百鸟声喧，秋至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好地方。我幼时常听祖父说，他十几岁从府谷逃荒到东胜时，满山遍野，望不到头的酸刺林，牛羊进去吃草不留意就找不到了。茂密的芨芨林到处都有，芨芨杆有筷子那么粗。如今罕台庙乡色连二自然村一带，我们家称之西山，麻黄草深及腰际，每到秋季，累累的麻黄果红的象珊瑚珠一样，把西山装点的分外妖娆。至于黄柏啊，柠条啊，马茹茹啊，山杏等灌丛也杂处其间，狐兔出没，野狼成群。那惯于奔跑的黄羊也成群结队出没在林草之间。尤其是东胜往西过了城梁进入柴登，黄羊群更多，少则二三百，多则八九百，千数的大群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在柴登板旦梁舅舅家放牛时，常常被这草原上大群奔跑的黄羊群所吸引，每逢遇到我大声呼唤，喜见它们那矫健的腿脚快速如飞，我目送它们到辽阔的远方。黄羊，是那一带猎手追逐猎取的对象，有时打到一只不论炖

肉或包饺子都是鲜美无比的。

抗日战争前的东胜，匪盗频繁，骚扰百姓。每遇土匪来抢，柴登壕一带的老百姓则扶老携幼潜入那骑着马也看不见头的芨芨林躲藏起来。

东胜的植被在百年以前更为丰茂。据罕台庙建庙记载，大庙那些松柏的柁柱椽檩，当年都是采自补洞沟、不彥门肯一带的山梁沟渠。所以东胜的一些地名至今仍保留当年那茂密林草的痕迹。如酸刺沟、麻黄湾、山丹丹（百合花）渠、柠条梁、酸刺毛儿渠、青杨树沟等等。就东胜城区在的羊场壕，当年是西至不彥门肯，东至割蛇壕的一片广袤的好牧场。那么为什么当年植被那么好的地方如今变得如此荒凉了呢？说法很多，有的归因于气候的变迁，有的归因于人口的增殖。我认为二者皆有，但最主要的是当年的开拓者们，生态观念淡薄，一再向大自然贪婪地索取的结果。苏联著名的土壤学家威廉姆斯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最坏的土地，只有最坏的耕作

方法而破坏了土地。”我们都知道，地表的林草植被有涵蓄水分，调节气候的作用。水分在大气的环流中，枯草植被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我的祖父说，他们初来此地时，人们只拣沟渠川河畔肥沃平整的土地耕种，山梁丘陵都是牧场，山沟里则是清沏见底的溪流。人们烧火做饭的燃料都是满山遍野的柴禾，真是柴水相连的宜人之地。后来由于采伐过度，许多山梁荒坡地面裸露，每逢下雨，则雨水夹带大量泥沙形成冲刷淘毁土地的山洪。我记得幼年时，东胜许多大川两边都是盛产五谷和罌粟的肥美滩塔地，而有那么几年，尤其是土匪杨侯小骚扰作乱的年代，每逢夏秋暴雨成灾，第一天还是阡陌纵横，长势喜人的庄稼，经一个下午或晚上的暴雨，则成片成片的土地连同庄稼被山洪毁尽，洪水冲坏了土地，露出紧贴山根的砧砂石河床。所以，我认为东胜东部区植被的毁灭一是人们的无知，不知养地护林，更主要的是无情的常年累月水蚀的结

果。

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党的政策英明，解放了束缚八亿农民的各种绳索，实行了联产计酬的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个人承包治理荒山荒坡，卓有成效的林草专业户，在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生产方针指导下，大搞“三种五小”建设，给植被建设、水土保持开拓了广阔的美好前景。我相信，我们东胜人民只要团结奋斗，吃苦耐劳，在市党政的正确领导下，不久的将来，东胜定会郁郁葱葱，重披绿装，焕发她当年那美丽的青春。

# 解放前东胜县税收情况

张泽源 王森柳

解放前，东胜的税收业务由县财政科兼办，主办人乔占英，帮办人张泽源。开征税目由省财政厅下达。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下达的税目有：工商统一税、屠宰税、契约税、牲畜交易税、印花税和车船牌照税。

东胜开征税收情况是：

契约税，系指全县所属各乡买卖土地，税率为百分之十。由买卖双方写好草契，经乡公所加盖印后，交给县财政科办理官契，发给买方立为执照，凭据存查（按契立价征收）。工商统一税由财政科核议派征和估征，县城内由工商联包交。工商联包的税下来后，由各小贩分摊。城内有四十余家商贩，大一些的商户有玉兴德、德义



公。小的有天义成、东顺城、义发成、三义成。药铺有益源堂、自昌成，此外还有理发、铁匠、屠宰户等。一年征两次，征收回来的税款交到会计室，作为行政开支。

每年能征收屠宰税一百余元，只征城内屠宰户的税，居民不征。工商统一税年征八百元，其中杨七寨子征一百五十元（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共征过两次）。契税约征三十元（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无人买卖地）。屠宰税率标准：羊按肉斤计算，每十斤征一斤肉价，按只计算每只收五角；猪以口计算，每百斤以下征税二元，百斤以上征税二元五角。

除上述外，其它税收东胜县未执行。

# 东胜县“九、一九”起义前后

边媚山

(一)

东胜位于黄河南面，交通不便，偏僻落后。抗日战争前在东胜的国民党、政、军机关人员寥寥无几，县城里仅有二百来人口。当时老百姓的负担还不太重，可以勉强糊口度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绥（远）、包（头）沦陷，绥远省政府西迁陕坝。这时东胜的地位就显得重要了，成了绥远某些要害机关及人物的避身之地，各路军队的过往也比较频繁，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以后，部分单位才东迁。但是，“追起狐狸住下狼”，国民党二十二军、暂三军、三十一师、东桃达治安司令部及郭四儿的土匪兵，等等，你来他往，

抓兵要粮，弄的百姓衣不遮体，食不饱腹，从此东胜再没有宁静之日。东胜的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又利用东胜地方偏僻，文化落后的有利条件，大肆进行反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做”。不明真象的老百姓信以为真，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

## (二)

一九四九年春天，东胜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闻风解放军要攻打东胜，人心慌慌，各自逃生。县长兼十六团团长沙克让逃到达旗河浪图其岳父郝四召家，东、桃、达治安副司令凌玉华搬在罕台庙一带，一部分有资力的买卖人也迁离县城，唯独十六团还想“固守”东胜。但当共产党伊盟支队在耳字壕歼灭了组训处康民众、王再成两个团继而挥戈东胜时，十六团也弃城逃跑了。这样东胜就成了一座空城。伊盟支队顺利进城，休整了两三天后，十六团突然来偷袭，在城西南鸣枪。后

据十六团的团副李澄讲：“十六团根本没有战斗力，原来不准备也不敢接火，但又怕解放军撤出东胜后，国民党给加上不战而逃的罪名，所以想打上几枪后再逃跑，以便交差，并能逃脱罪责。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一直跟踪追击至罕台庙的李飞雄寨子，全歼了十六团。在李飞雄寨子接火前，李澄从地形看出大势已去，领着勤务魏秉智骑两匹快马向西逃至合同庙壕一带与奇全禧会合了。

伊盟支队在东胜战斗后，分析了形势，认为东胜不是久居之地，黄河解冻国民党会大兵压来，决定撤出东胜，将俘虏送往解放区的山西保德县集训。我军对俘虏的政策是，愿留则留，集训后大部分人员回到了东胜。

东胜战斗后不出我军所料，在四月初黄河解冻，绥远省派三十五军军长刘万春杀气腾腾进占东胜。这时驻东胜的各单位及东胜县县长贾克让、十六团团副李澄等都陆续返回东胜。狡猾的

贾克让为了逃避罪责，将杨康换以通共罪名枪决了，做了他的替罪羊；将十六团团副李澄以“临阵脱逃”的罪名逮捕，也准备枪决，后经别人多方营救免于死。

杀了杨康换，逮捕了李澄，东胜又是一个什么情景呢？鄂四儿匪部数百人盘踞在东胜刮老百姓的地皮，二十二军又派来石佩玖的一个团，配合本地一些一贯道大小头目到处发展道徒。东胜县一贯道的盛行主要在“九·一九”起义前这几个月里，后来以王珍开、陈步云为首又开始招兵买马，重新组建保安十六团。由于县长贾克让躲在包头做买卖长期不回东胜，当时王森柳主持日常工作。

不管调遣也好，组建也好，目的是继续与人民为敌，大搞“反共防共”活动。但在第一次解放东胜时，我党我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说：“共产党、解放军并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无恶不作’的坏党派、

坏军队，而是不打骂老百姓，不向老百姓派粮要草，有组织、有纪律的好军队。”亲身的经历，鲜明的对照，谁好谁坏，在老百姓心中一目了然。

### (三)

一九四九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继平津战役后，绥远和平起义势在必行。在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政策的感召下，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峯等将领率领绥远军民于九月十九日和平起义，东胜县及所属人员随绥远政府一同起义。

起义不久，决定由东、桃、达治安司令部司令慕幼声兼任东胜县县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东胜县当时也举行了庆祝活动。从

此，人们不再愁眉苦脸，而是喜笑颜开，工作之余扭秧歌、闹红火。在这年的元旦，当时十六团和一完小两个大型秧歌队在东胜街头比较活跃，我当时是一完小秧歌队的领队。东胜虽然解放了，但新旧政权还没有办理接交手续，旧政府、旧军队中坚持反动立场的人还有，如县政府的科员张铎（接收前就偷跑了）和十六团指导员毛占元，在庆祝解放后第一个节日的活动中有意搬弄是非，使两个秧歌队闹起纠纷，直至发生了武斗。当时一完小的秧歌队办得比较好，市民子女多，喝彩的人也多，这引起了十六团的嫉妒。学校为了避免是非，躲开十六团的活动场地，但学校走到哪里，十六团追到哪里，一直追到县卫生院内（现在的宾馆楼后院）用盒子枪托将学生（秧歌队员）王玉宝等人打倒在地，引起群众的愤怒。后来学校秧歌队退走，十六团在毛占元的指示下仍不甘心，又从南街追上来用高跷腿将数名学 生 绊倒。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校秧歌队行进至十

字街炮楼(现盟公署楼前右侧)外将高跷卸下,我命令学生包围了东、桃、达治安司令部(第三专员公署院内)。随即我又到警察局将许焕魁局长叫醒,责问原决定由他们负责维持秩序,为什么不出面?后来我回到东、桃、达司令部请慕幼声解决这件纠纷,学生们在外面高呼口号。慕幼声看下不好收拾,一面给我戴高帽子,一面劝我将学生带回。当时我要求他与学生见见面,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但慕幼声始终不敢见学生,一直围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校长李直哉来到司令部,经过研究达成协议,由县政府、十六团、学校、商会四方派人组成调查组,查清后再作处理。这时学生才撤出司令部。

三天以后问题查清了。其调查的结果是,军人打学生不应该,追着学生闹事不应该。调查组向慕幼声汇报后,确定在星期六晚上召开生活检讨会,我校师生(六年级学生)准时到会,会议地址在县政府的审判厅(今公署楼院内),主持会议的



是慕幼声，他说：“今天召开的是干部生活检讨会，学生不准参加，士兵也不准参加。”无奈，六年级学生只好由袁留智、刘永珍等同学带队回校。会场里我们发现士兵参加，但没有提出抗议，坐下来听主持人讲话。慕幼声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今天召开的是干部生活检讨会，具体解决一完小与十六团在街头活动时的纠纷问题。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双方带队人介绍打架经过，然后进行自我检讨，与会人员可提出批评意见。一完小由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后来教师苏秉怀进行补充时，慕幼声说一方只能有一个人介绍经过，苏秉怀再没往下讲。十六团由毛占元介绍情况，但他们又连续有两人做了补充，慕幼声未加阻止。这时，一完小校长李直哉站起来说：“慕司令宣布是干部生活检讨会，不准学生、士兵参加，今天为什么有士兵参加呢？第二，双方只允许带队人介绍情况，我方不准补充，而十六团为什么连续三人发言？慕司令为什么不加制止呢？这个

会议不民主。”随即一完小全体教师退出会场，顿时会场混乱不堪，校长李直哉、教员苏秉怀被打倒在地，其余教员有的躲起来，有的从后大门直奔一完小。我们连夜寻找商会会长张福生和当时绥远银行派来的一位姓姚的干部，他们到县政府把受伤人员抢救出来抬回一完小。

第三天是星期一，全校来了个总罢课，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同时写出“宣言书”。“宣言书”一式三份，一份寄给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一份寄给绥远省政府，一份寄给中共伊盟工委。绥远省政府派来三十一师，师长安春山带领吴参谋长等人来东胜整编部队，并协助解决地方纠纷问题。对此问题由于安春山一屁股蹲到慕幼声的一边，不能作出公正的处理。当时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一完小大错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十六团小错误，打了人向李直哉校长赔礼道歉。”判决书被我们扔掉了，安春山的代理人吴参谋长被我们讲得理屈词穷，偷偷跑回去了。

正值这时，伊盟工委派了以伊盟政务委员会的科长白俊明为组长，带领组员武廷秀、王秉国、弓占元、武丕显共五人，为接收东胜县先遣工作组，他们的任务是了解情况，为正式接收作准备。

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骑五师派一个连进驻东胜，将十六团调到萨县整编去了。骑五师一到东胜就主动和一完小取得联系，课余时间和学生一起搞文艺活动，关系处得非常亲密。两个军队两种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九五〇年元月二十八日学校放了假，在东郡工委的领导下，在郡王旗的圪丁盖张继雄寨子开了会，工委书记云北峯同志主持会议，参加会的共有二十人，其中东郡工委三人，一完小五人，其余均为各乡代表。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组成清算贾克让（起义前的东胜县县长）委员会，为接收县政府作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

云北峯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从

经济上把贾克让的贪污问题，经过群众控诉、斗争全部检举出来，归还人民，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经过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清算斗争以后，东胜确实能够出现一个新的气象，就是“再不敢贪污了”、

‘再不敢反动了’，能变成真正的解放区化。……希望与会同志们本着这个意思，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坚定我们的信念，去克服当前困难，认真完成我们的任务。”（摘自一九五〇年元月二十八日会议记录）

会议讨论研究了组织方法和组成人员，以县成立总会，会址设在圪丁盖张继雄寨子。总会委员由十三人组成，即：李直哉（一完小校长）、刘忠亮（东郡工委副书记）、李静泉（原十六团团副）、云开雷（东郡工委委员）、边来喜（忠恕乡农民代表，未到会）、贺文富（义永乡代表，未到会）、李进厚（县参议长，未到会）、李士伟（一完小教员）、白四仁（忠恕乡代表，未到会）、杨金山（东区代表，未到会）解铁猫

(六台区代表，未到会) 何世明 (五台区代表，未到会)、郝凤歧 (南区代表，未到会)。主任委员李直哉，副主任委员刘忠亮。

总会下面以区或乡设立了十个分会，第一分会为东区，第二分会为南区，第三分会为六台区，第四分会为仁乐乡，第五分会为忠恕乡，第六分会为孝友乡，第七分会为义勇乡，第八分会为和睦乡，第九分会为五台区，第十分会为城内。

当时由于总会及分会有很多组成人员未参加会议，这些人在东胜地区又是有影响的人物，要开展工作必须将组织情况和任务向这些人交待清楚，故各区乡指定到会者分头下去做工作。东南两区由刘忠亮负责；仁乐乡由李静泉、李清负责；忠恕乡由边嵎山负责；孝友乡由李士伟负责；和睦乡由白永昌负责；义勇乡由张德仁、苏秉怀负责；平治乡由云北峯负责；城内由陶立栋负责；平定乡由苏秉怀、白永昌负责。

一九五〇年元月三十日会议结束，有关人员

分别到各区乡开展工作，一般都是以保为点，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控诉贾克让的罪行。另外，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欢迎新县长的到来。经过二十多天的工作，清算贾克让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各乡向东郡工委及总会的汇报象雪片似的飞来。与此同时，特务、坏分子的造谣也减少了。根据这种情况，东郡工委和总会决定召开第二次反贾会议。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三月一日，历时三天，在圪丁盖寨子召开了第二次清算贾克让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共六十九人，李直哉主持了会议，刘忠亮作了政治报告。

刘忠亮同志在报告中说，今天在这里开会得到了很丰富的材料，给我们接管东胜县创造了有利条件。东胜虽然起义了，但情况比较复杂，尤其还有特务的活动，我们不能麻痹轻敌。再加东胜在历史上就归绥远省管辖，这次要划归伊盟直接管辖，有些人要有误会，我们要很好地宣传。如

何接管的问题，高政委（伊盟盟委书记高增培同志）去绥远省汇报商量。关于贾克让的贪污问题由法院彻底清算。会议结束后大家要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好好工作，努力生产，为建立新政权铺平道路。

#### （四）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共产党接管人员冯开选、徐凤翼、云开雷等同志到达东胜。具体办理移交的人员是原县长慕幼声，主办人是原县政府秘书焦钟汉，接交人是冯开选，监交人是军区副政委韩明正。经过登记造册，历时一个月才将这个烂摊子交接清楚。

东胜县人民要求派真正人民县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与此同时，中共东胜县委的架子也搭起来了。从此，东胜县二万人民在中共东胜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的。

接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照党的“既往不

卷”的起义政策，改组和调整县人民政府的机构和人员。除了个别反动家伙如张铎逃跑外，对旧职人员均适当地给予了工作。在原来三个科的基础上，调整为一室四科，即：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文教科。

第二件大事就是禁烟除害运动。接收后正是春播生产的大好季节，部分农民将优质土地种了“洋烟”。县人民政府发现这种情况后，于四月上旬在东胜广场（今市银行大楼处）召开了有工、农、兵、学、商参加的数百人大会，冯开选县长宣布了禁烟令（禁种、禁吸、禁买卖），动员各行各业积极行动起来，不到一个月将五百零八户农民种植的五千一百二十亩大烟苗全部铲除。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设农村基层政权，全面开展了“废保建政”工作。将原来的忠恕、孝友、仁乐、和睦、义勇、平治六个乡，根据地理条件及行政管辖方便起见划为四个区，即：忠恕、仁乐两乡划为第一区；孝友乡则为第二区；和睦、义



勇划为第三区；平治乡划为第四区。各区都配备了区长、副区长、文书、民教、财粮、公安等助理员。废除了三十个保、二百八十九个甲，建立了十九个行政村（内有一个街公所）一百零二个自然村。

第四件大事就是于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召开了东胜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剿匪肃特，减租反霸，建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代表会议，传达贯彻了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安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蒙汉人民的团结。

第五件大事是和全国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当时，全县有八千余人进行了“和平签名”运动。

光阴似箭，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回首往事，看看现在，展望未来，东胜将会在党的路线指引下，在四化建设的三途上阔步前进。

## 人物简历介绍

刘继祖

刘恆岭（1897—1914），出生于东胜西区板担梁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幼勤学，清光绪年间取得贡生学位。当时清王朝要委派他到河南省一个县当知县，他打听到这个县的老百姓很厉害，又远离家乡，不敢去，请求回绥远做事，后被绥远将军府委派回东胜厅办学堂，是东胜教育史上第一个创办新式学堂的人。学堂校址设在羊场壕张进才院内，在校学生达一百多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后其绿营兵（满清时征集来的汉人的士兵编为绿营兵），芦占奎部到处为匪抢劫，一九一四年窜来伊盟骚扰掠夺，路过板担梁将刘恆岭家的东西枪劫一空，住宅放火焚毁。当年刘去绥远将军府告状，要求严惩芦占奎，中途

患病，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刘松岭是刘恆岭的二长兄，东胜最早的秀才。他一九一五年接任东胜学堂的校长，继续为开发东胜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当时东胜地区土匪四起，社会动荡不安，刘松岭为了办学安全，把学校搬到城里县政府院内。后来大股土匪到县城抢劫，放火烧毁了县衙门，又把学校迁到东区忽羊兔陶油房继续办学，东胜开垦后第一代有文化的人多出于他的教誨。

郭文明（1896—1964）出生于东胜东区海留素（现伊旗新庙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绥远省归绥中学高中毕业，是东胜县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当时东胜县政府很器重他，任命为东胜西区区长。该人任区长后生活腐化堕落，整日吸食鸦片，不务正业，后被撤职。抗日战争开始后，五十八军第十团团长张步程招用郭文明为文书，因其继续吸食鸦片，精神萎靡不振，又不习惯部队生活，回家改行教书。一九四三年县长樊库

东胜全县教师考核，郭文明只顾抽大烟不教书，当场被解聘，从此生活没有着落，临近解放前到处讨吃要饭，成为东胜有名的郭讨吃子。

张步程（1883—1939），家住东胜县东区补连（现伊旗新庙乡），是一个大老粗。他起初经营土地兼营商业，东区保安队长王三计打土匪阵亡后，由他继任东区保安队长。这个时期，他协助正规部队多次打退来犯土匪，保卫了地方安全。抗日战争爆发后，绥、包相继沦陷。为了抗日保卫家乡，东胜东区、南区保安队联合在一起，共二百余骑兵，组建了一个团，他担任了团长。一九三七年冬，这个团被国民党五十八军收编为第十团，开赴陕西神木兰杆堡驻防。与此同时，要把骑兵改为步兵移防甘肃天水。年底，他率部哗变返回东胜，被国民党二十二军收编为骑兵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移防达拉特旗王爱召、新城、新民堡，沿黄河前线，直接打击日伪军的侵犯。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回家过年路过添漫

梁刘牛寨子住夜，晚上因肚子痛用手枪顶肚子，枪走火而致死。

张继雄（1915—1950）。是张步程的儿子，毕业于绥远省立第一小学。他先在家中经管自己的家业，其父逝世后出任骑兵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为了纪念他父亲，自己集资在各丁盖创办了“私立步程小学”，令其堂弟张继华和小妾崔云芬担任教员，是当地第一个创办私立小学校的人。一九四六年被选为东胜县参议会参议员。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东胜县县长贾克让筹建东胜自卫十六团，任命他担任十六团副团长。一九四九年春东胜解放前夕，他带领残兵败将逃出东胜城。解放军伊盟支队写信劝其起义，但因团长贾克让还想继续顽抗，谈判未能成功，随后被解放军伊盟支队包围在罕台庙西李飞雄寨子，全部歼灭，缴械投降。所有俘虏经过教育全部释放。一九四九年七月，经表兄武国和拉拢，到郡王旗警备司奇全禧部任

第三大队大队长。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后，他率部在东胜不彥门肯接受董其武主席代表安春山点名整编。后来他没有跟随部队，全家迁到包头准备另谋生路。在包头拾掇了一辆胶车自己驾驶，一次在黄河畔跑运输途中，牲口受惊翻车致死。

高光耀，字朗峯(1904—1951)，出生于东胜西区漫赖乡柴子梁一个小康家庭。曾在包头上小学、初中，后考入北京第十三中学上高中。其父高红山带自产的畜产品去包头出售，给他准备学费，途经达旗王二窑子被拦路抢劫的土匪杀害。高光耀因学费发生问题，中途失学返回归绥，在绥远体育场担任文牍会计。卢呈瑞在东胜任县长时被邀请回来任东胜县政府财政科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一度任过东胜县公安局长、民训处长等职。后受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委托，在东胜筹建国民党县党部，随即担任了东胜县党部第一任书记长。一九四三年调任河套

米仓县党部书记长。一九四五年任绥远省国民党党政总队第三分队少校分队长，驻地在杭锦旗木花稍。抗战胜利后党政总队撤销，到绥远省干部福利社任秘书。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宪政时期，被东胜县选为省参议员和国民大会的代表。一九四七年伊盟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他在“绥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河西五十万人民呼吁”的文章，恳求绥远省政府拨粮拨款救济伊盟三县处的灾民。一九四八年在包头私立崇祯中学任教员。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高光耀在包头被逮捕，判处死刑。

一九八五年七月，在落实绥远省军政人员起义政策时经包头市人民法院复查，按起义人员对待，既往不咎，撤销原判，给予平反。

曹克让，字仲和（1905—1945），出生于东胜西区宗兑壕，经营商业兼营土地的曹柜。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抗日战争前在外地作事，抗日战争开始后返回东胜，先任东胜县政府

警察局长，一九四三年调任东胜县党部书记长，一九四五年夏天突患脑充血病故。

陶世英，字育才（1900—1951），出生于东胜县东区陶油房，小学文化程度。曾在其父陶四儿区董的推荐下当东区区董，抗日战争期间任东胜县保安处保安队长、警察局长等职。

一九四六年东胜县参议会成立时被推选为副议长，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后回家务农，一九五〇年被选为郡王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按反革命逮捕，判处死刑，在郡王旗一区淖壕公审后镇压。

李廷卿，又名李毛团（1907—1951），出生于东胜东区古城壕一个富裕的家庭，小学文化程度。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在二十二军骑兵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一大队任连长，与日伪军在新城战役中作战负过伤，一九四三年部队改编后告辞回家经营土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被罕台庙当地人选为孝友乡长。一九四



八年回家种地。一九四九年“九·一九”起义后他参与奇全禧策划的反共新庙会议，一九五一年镇反时逮捕按反革命论处，当年判处死刑被镇压。

武丕芝，又名武侯为，出生于东胜北区水头沟一个较富裕的家庭，粗通文字。担任过北区保安队分队长，任职期间打骂百姓，敲榨勒索，胡作非为，当地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武阎王”的外号。抗日战争期间在家经营自己的家业，因政治嫌疑被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陈长捷逮捕，遭受该部军法处酷刑拷问，始终没有供认。事实是，他得罪了一个总部参谋，这个参谋图报复，向总部编造伪案告发，全家被抄，两个儿子一起入狱，一直押到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撤销后获释。回家后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九四六年患病身亡。

刘永佑，字导宽，又名刘牛（1900—1940），出生于东胜北区添漫梁小康农民家庭，小学文化程度。其叔父刘银罗原任北区保安

队保董，在添漫梁与土匪战斗中牺牲，他接替了北区保安队长职务。该人打仗勇敢，善于用兵，平时注意士兵的射击训练，是全县战斗力最强人数最多一支保安队。因为多次打败来犯土匪，成为黄河南岸有名的打土匪英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的北区保安队进一步扩大，人马达三百多骑。因为当时没有列入正式编制，又害怕别的军队吃掉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位，曾暗中和已投日的达拉特旗康王森盖有联系。一九三七年冬，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来东胜按投日罪先捕了达旗康王后捕了他，将其部队全部遣散。被关期间，在哈拉寨与东北军看管排长姓周的结为好友，一起越狱潜逃。一九三八年回东胜后，又将遣散余部收集起来编入二十二军骑兵游击第三支队，担任该部第二大队大队长。一九四〇年因为他反对上级，并扬言要篡权，以此罪名被支队长王伯谋逮捕，在达旗王爱召就地处死。

王瑞森，字兆麟（1909—1952）。

出生于东胜东区板洞门一个富裕的家庭，毕业于陕西榆林中学，曾任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五一五团连长。抗日战争开始，任东胜县政府公安局长、保安处副处长，后来离开东胜又在二十二军任补训营营长，一九四七年任郡王旗警备司参谋长，一九四九年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后，部队在东胜不彥门肯接受了董其武主席代表安春山整编后，部队大部自动流散。他也离开部队没有参加整训，在伊盟各地流窜，一九五一年镇反时在杭锦旗被捕，一九五二年被判处死刑镇压。

杨文煥（1915—1952），出生于东胜西区阿拉善湾一个富裕的家庭，粗通文字。他父亲杨绵羔曾任过东胜保安队团总，其父死后他在家中从事经营土地。一九四六年东胜县参议会成立时被选为县参议员。一九四七年东胜自卫十六团成立后担任第二大队大队长。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军伊盟支队在罕台庙西李飞雄寨子围歼自卫十六团时被俘，经教育后又逃跑回家。一九

五一年镇反时潜逃，后在杭锦旗被逮捕，后因患病治疗无效死在狱中。

刘开亮（1919—1946），出生于东胜东区补洞沟一个富裕的家庭，曾在包头马王庙小学念书，后考入绥远省土默特中学上初中。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失学回家。一九三八年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教导队学习，结业后在山西可岚县做抗日救亡民运工作，后因家中给他找下妻子多次派人找回来结了婚，从此脱离了革命。一九三九年到河套考入国立绥远中学上学。一九四三年上高中时由学校选送去重庆边疆师范学校五年专科上学，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随学校迁到江苏无锡市。一九四六年暑假三青团中央在庐山组织夏令营活动，他以绥远旅外学生代表参加了活动，因失足堕入玉渊潭溺死，葬于江西芦山棲贤寺。

韩增栋（1903—1948），出生于东胜南区耳林兔一个大户人家。自幼在陕西榆林

上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在杜聿明部下任师长、军长等职务，尔后在东北四平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刘承楨（1907—1952），出生于东胜北区添漫梁一个富裕的家庭，是刘牛的堂弟。幼年读私塾，曾被东胜县政府选送到绥远省区乡指导员训练班受训，结业后分配到绥东某县担任区指导员。抗日战争暴发后返回东胜，在二十二军骑兵游击第三支队第二大队任连长，其堂兄刘承佑被支队长王伯谋处决后回家务农，一九四六年被当地仁义乡选为民选乡长，一九四七年又被选为东胜县参议会参议员。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捕判刑，一九五二年在劳改中病故。

贺文富（1902—1968），出生于东胜西区一个边商家庭。主要职业以经商为主，同时也兼营土地，是万盛隆字号的掌柜，曾长期担任西区区董（管区地方财政）。抗日战争胜利后，东胜县参议会成立时被选为智勇乡县参议员。一九

五〇年东胜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被推荐为东胜县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出席过县入代会。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致死。

李逢唐，字直哉，一九〇二年生于东胜东区皂火壕玉成泉商业兼营土地的家庭，是绥远省立第一师范第一班六年制学科毕业，毕业后又在山西党政学院学习一年。在绥远省政府任实察员期间结识了绥远省政府秘书长王谦（地下党员）。其同学好友刘履泰（地下党员）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被捕，他多方设法营救无效被解到北京，而他自己也有了赤化嫌疑，不能继续呆下去。这时王谦调回太原被阎锡山任命为晋华卷烟厂总经理，李逢唐经过王谦的介绍由绥远到了山西太原，先任卷烟厂的股长，后任副经理。抗日战争暴发后太原沦陷，经王谦介绍准备到晋东南参加薄一波组织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因路线被日伪军封锁走到沁源县过不去，寄居在沁源山区砍柴为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绥远分署第二工作队

队长，曾多次回伊盟各旗县发放救济物资。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返回东胜，一九四八年在皂火壕自己的家乡试办合作农场。一九四九年“九·一九”起义前和中共伊盟东郡工委联系，在伊旗圪丁盖组织了“反贾克让运动委员会”，实际是东胜县新的临时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先任东胜第一完小校长，后任东胜县文教科科长，一九五二年调绥远省供销合作总社企业加工处搞烤烟工作，蒙绥合并后筹办呼市亚麻厂。一九五八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被误打为历史反革命，放在呼市挑花公社劳动改造。一九六〇年释放，被任命为内蒙文史馆通讯馆员并发给生活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政策时彻底平反，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待遇，现已离休在家养老。

李先唐，一九〇四年出生于东胜县东区皂火壕玉成泉商业兼营土地的家庭，毕业于绥远省立第一师范六年制科。起初在绥远省立第一小学当教员，有一度在安北设置局任区助理

员、小学校长、教育局长。在安北辞职后又回到归绥任省立第三小学教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归绥沦陷，返回家乡在张步程的骑兵第三支队任军需。一九三九年任东胜县政府督学，后任绥远省立东胜小学校长、东胜西区自生堡小学校长。一九四六年东胜筹建县参议会推选为议长。“九·一九”起义后被东胜县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二完小校长，一九五二年因历史问题被捕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迁送原籍监督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落实起义人员政策时彻底平反，现按离休待遇。

李廷辅，一九一一年生于东胜东区古城壕一个富裕的家庭。包头中学初中毕业后，入绥远省区乡指导员训练班受训，结业后分配在托县二区任指导员。抗日战争开始后河东沦陷返回家乡，曾在东胜县政府任民训指导员、督学、东区区长。一九三八年在罕台庙筹办城厢小学，担任校长。一九四二年调任东胜县民教馆长。一九四四年因共产党嫌疑一案，被国民党六十一军逮捕后解到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军法处，后因案无实据经同学好友营救结案释放。一九四五年出狱后进入绥远省干部训练团党训班受训，结业后分配绥远省党政总队第三分队任干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该组织撤销回家闲住。一九四六年东胜县参议会成立后被选为县参议员，绥远省“九·一九”起义后在家种地经营油坊业。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逮捕，按历史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刑满释放后移居乌审旗与儿女们一起生活。一九八四年东胜市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时，经市法院复查核实，推翻原判，恢复名义，按起义人员对待。

解守英，出生于东胜东区忽羊兔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高小文化程度。曾任过东胜学堂小学教员、东胜县政府警察局庶务员、县政府庶务室主任。抗日战争开始后担任过二十二军骑兵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四支队被二十二军收编遣散后又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先任教员后任

中心小学校长。一九四六年被选为东胜县义和乡民选乡长，“九·一九”起义后在东胜西区鸡盖沟民办小学任教员。一九五二年鸡盖沟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后仍担任教学工作，一九六〇年调东胜县第二完小任事务员。十年浩劫期间被遣返农村监督劳动，一九七三年平反退休。

李澄，字静泉，一九一五年出生于东胜县东区皂火壕玉成泉商业兼营土地的家庭，绥远省立归绥中学初中毕业。曾任东胜小学主任教员、灶火壕义务小学教员，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国民党二十二军骑兵第三支队中尉书记。一九四二年任东胜县政府督学，一九四四年任东胜县仁成乡乡长，一九四五年任桃力民办事处隆盛乡指导员，一九四六年任东胜县参议会秘书，一九四八年任东胜保安十六团团副。一九四九年因通匪罪被刘万春逮捕押解绥远省监狱，保释返乡后加入郡王旗警备司担任第二大队大队副，“九·一九”起义后在东胜不彥门肯接受安春山点名整编，同年

年底东胜地方人士与中共东郡工委联系成立“反贾克让委员会”，他担任秘书。一九五〇年东胜县政府接管后任东胜一完小校长、盟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保留公职，在灶火壕小学任教员。十年浩劫期间被遣返原籍监督劳动，一九七八年彻底平反，按退职处理。

# 刘牛的一生

刘懋功

前 言

刘牛（1903—1939），名永祐，字导宽。刘牛乳名为牛小子。刘牛的一生有名、有功、有过、甚至有罪。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在讲阶级斗争的场合上，不明真象的人，都说刘牛是“土匪”、“恶霸”、“地主”；而一些年老的人，甚至贫下中农中了解刘牛的人，则仍在赞颂刘牛是个好人，是对东胜地方有过功绩的人。那么刘牛的千秋功罪“谁人

會与评说”？功罪比重有多大？也应给予公正客观的评说才对。我经过对刘牛几个健在的兄弟的调查，以及与刘牛同时代的人和对一些老年的邻里们的访问，还有我幼时与刘牛数年的同寝共餐的记忆和听家里老人们的传说，对刘牛这个人的一生功罪给以评述，澄清一些不明真象的说法，对于历史人物是应该的，对东胜添一点文史资料也是值得的。

## 一、祖父逃荒北草地，揽工种地十八年

刘牛祖籍最早是山西，后迁至陕西府谷县砖厂梁。到了刘牛祖父刘兔（喜明）二十多岁，清光绪年间，陕北府谷一带连年旱灾，家境贫穷无米可炊，刘兔就挑一担破烂，领上父母妻子逃荒来到东胜添漫梁（原属达拉特旗）给地主杨翰锁家揽工种地十八年。刘兔憨厚老实，大字不识一

个，只知勤勤恳恳地劳动，省吃俭用，直至他的儿女们（五儿、三女）长大成人，个个辛苦劳动，生活才开始好转。

为了摆脱揽工受苦的苦境，就租种了二地主郭四保大（达拉特旗蒙古人的二地主）几十亩山梁薄地。但在这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加之匪盗频繁，总是常年不得温饱。每逢秋末冬初，秋风瑟瑟时，老地主杨翰锁早早穿上新绵羊皮袄站在刘家对门的土丘上，看着衣衫褴褛的刘家兄弟们便炫耀自己的富裕，奚落刘家的寒酸，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秋风凉，有钱人儿添衣裳，没钱人儿受凄凉。”逢到天旱无雨时，杨翰锁便站在自己的粮食窖上用脚踏墩说：“这些糜子又出窖呀！”他“借一还二外加三”地剥削穷苦农民的机会来了。刘家却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艰苦生活。梁外地方有一帮泼皮专欺刘兔不识字，每年拿上“帐本”对刘兔说，他父亲在世时会欠他们

多少银两，敲榨勒索，无休无止。有一年这帮泼皮又来要“帐”，翻开“帐本”说还欠银二十两，这时刘兔的大儿子昭仁才十来岁，在旁边看这本“帐”跟皇历一样，就悄悄对父亲说，“我看不是帐，是皇历，上面有戴草帽人赶牛的图象。”刘兔听了，便叫儿子去把地主杨翰锁请来他家吃饭。杨先生来家见众泼皮躺在炕上抽大烟，他也躺下闲混，谈话间说起欠债事，看了“帐”本果然是皇历。他马上把“帐”本收起，叫人备马，他要去衙门告状，“告这些拿皇历年年讹人的人”。这些家伙一听，丢盗撩甲地溜走，再也不敢来要“帐”了。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刘兔老汉，他决定让四儿子刘银罗上学念书。这且不说，郭四保大二地主借口刘家租种他的土地每年三元五元地向老刘兔“借钱”。其实刘家每年的地租才六元。这样，累计达八十多元，要顶地租却不能，他横行霸道，贪得无厌。刘家只好忍气吞身，任人欺侮。

聪明忠厚的刘银罗入了冬书房，由于家贫买不起灯油，他借东家油房磨房的灯光，冬夜苦读，学有所成。长到十五六岁时，就感到郭地主欠钱不还，又不能抵租，欺人太甚。有一天，他自己到郭四保大家讨债。郭地主首先就问“是你爹叫你来，还是你自己要来”？以大话吓唬说：“我牛圈里有牛、有马、有骡子，你随便拉，看准哪个拉哪个”。他满以为刘银罗能被唬住，不料刘银罗却说：“是我自己要来的，四叔，你给我我就敢拉，你敢给吗？”郭四保大恶狠狠地进牛圈随便拉出一条大犁牛交给刘银罗说：“给，你拉走吧！”刘银罗说：“你给我就拉走。”刘银罗把牛拉回家。老实的刘兔一见儿子拉回地主家的牛，就呼天唤地地说：“我的天呀，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可惹下大祸了。”一时郭地主骑着马从刘家门前经过，刘兔老汉紧着给说好话往家里让，可郭地户连马也不下，说他要到城塔（当时达拉旗官府所在地）告



状。刘银罗却劝父亲不要挽留，“让人家告去”，并说“我正等着要和郭地户打官司”。这时郭地户见小刘银罗毫无惧色，又自知理亏，且有人挽留，就顺水推舟地留下乖乖地商量地租与欠债问题。后经人说合，一条牛就顶了刘家的八十多个银元算了事。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刘兔老汉，认为养子不读书，愚昧无知，任人宰割。所以他会说：“三辈子不念书，真牲口”。

## 二 刘银罗当保东 牛小子露锋芒

刘家有了牛，就自耕起来，生活年复一年地好转。接着刘银罗被地方举荐，县政府任命为地方保东<sup>※</sup>。他到了机关戎装在身，秉公办事，回到家里换一身劳动衣服和弟兄们一起干活。他开明豁达，平易近人，博得家里家外一片好评与敬重。

刘兔老汉深吃不识字的亏，所以他的孙子们  
※保安队长

到了上学年龄时，全部让念私塾冬书，统由长孙润鼠（永社）带领在邓四先生的私馆念书。上学期间唯有刘牛不好好用功，他要赌串门不听话，奇装异服常打扮自己。有一年春，他身穿一套十分窄紧的紧身衣走近一个正在春耕种地的邻居跟前，指手划脚地和人家说话，结果骡子受惊奔跑，把耩斗打烂。这家邻居找到刘牛的父亲刘二说：“二哥，你家牛小子要好好管管，太不稳重了，那天编把腰细地把我的骡子惊跑了”。刘二听了好好训斥了一顿他的儿子。看看年复一年长大了，文不成，武不就，刘二见儿子唯有惧怕和听四叔父刘银罗的话，所以就从十八岁起就到刘银罗身边当警卫。刘牛入伍以后，在四叔父刘银罗的管教下，苦练骑射。到了二十岁，刘牛长得粗壮结实，骑射功夫十分娴熟，可以说百发百中。

### 三、快炭窑梁激战 刘牛报仇出名

民国初年至抗战暴发之前，伊盟地方匪盗作乱，不得安宁。什么杨猴小、陈秉义、康存良等

土匪，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民国十四年（1925）冬初，土匪杨猴小一部分二百多人在东胜城北其兀塔北边的快炭窑梁与刘银罗和巩加郎的蒙汉联合部队遭遇，经过一场恶战，由于众寡悬殊，巩加郎的蒙古兵被土匪打散，他们丢旗弃马，钻了炭窑。土匪们把巩部的马和旗抢去，到快炭窑梁的高峯向刘银罗摇旗招呼，刘在另一山头以为是巩加郎向他招呼，于是带领勤务兵们牵马步行往摇旗处走，走到近处，突然枪响刘银罗和他的勤务兵佟瑞应声倒地。这才发觉是上了土匪的当。弟兄们背着老队长的尸体，边打边退，脱了险境。老刘队长血染沙场，为地方老百姓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仗三十八岁。当时刘牛放声痛哭，发誓报仇，全体战士含泪响应，并拥戴刘牛为他们临时带头人。刘牛当即派遣人马请求郡王、准格尔两旗蒙古兵助战。他的请求得到郡王旗王爷的同情与支援，拨兵一部与刘牛部联合追击土匪，在罕台窑一带恶战一场，土匪向

西退去。

刘牛出重金雇了一个机灵可靠的老乡骑快马连夜探听土匪的确切行踪与驻扎地。探信人走后，刘牛和衣而卧，夜半时作了一梦，梦见他四叔父告诉他要以快速夜袭的方法打击这帮土匪。他从枕头上哭醒后，这时探信人也已回来，告诉他土匪有多少人马，今晚住西昌汉沟刘万喜家。刘牛会同郡王旗部队商量剿匪计划，马上集合队伍，布置了任务，挑选三十几个精壮战士，全配备长短枪，轻装快马飞速前进。他们的队伍临近土匪一里左右时，全部下马，把马匹隐蔽在一个暗渠里，队伍全部轻轻地向土匪驻地爬行前进。刘牛首先带领一个警卫向土匪的哨兵摸去。初冬夜晚的梁外地区气候严寒，群星闪烁，万籁俱寂。当刘牛摸到哨兵背后时，只见那个土匪哨兵身穿大皮袄，抱着一支枪正在打盹。刘牛和他的警卫突然将哨兵的嘴捂住捺倒在地，嘴里塞上毛巾，然后用一条绳子结结实实地捆住拖到个沟

里。这时三十几个兵手持短枪，悄悄进入刘万喜大院。五间大房的房顶、窗口、门上都为刘牛的兵把守。刘牛舐破窗纸往里一看，只见土匪有的在喝酒猜拳；有的三五成群围着大烟灯在抽大烟；有的在调戏玩弄民家女子。刘牛见状咬牙切齿，首先照准当官儿模样的几个抽大烟的土匪就是一梭子。与此同时，三十几把盒子枪同时打响。土匪被这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打得懵头转向，顿时，狼嚎鬼哭，乱作一团。只十来分钟就全部结束了战斗。土匪大部被打死，俘虏三十多人，在乱中逃走四五个。这时，东方渐白，霞光灿烂，太阳渐渐升起来。刘牛把土匪的马圈打开时，首先看到的是他四叔父的坐骑大青马，仍然备着原来的鞍辔、驮着老主人的行李，这马一见主人就象哭诉似的放声长嘶向刘牛跑来，刘牛抱住马头泪如泉涌，痛哭一场。从此，这匹有功的战马就成了刘牛可靠的坐骑。

复仇的战斗胜利地结束了，刘牛和郡王旗部

队驮着战利品，押着俘虏，踏着灿烂的晨辉凯旋归来。回到驻地把一个顽固抵抗的土匪剖腹挖心处死了。据说还由八个老刘队长的卫兵将人心炒菜下酒吃了。在审讯俘虏中才知道正打死老刘队长的土匪张三友在混乱中逃跑了。

这一场报仇雪恨的剿匪活动，使年仅二十二岁的刘牛声威大振。当时任绥远省都统（省主席）的李培基曾对刘牛传令嘉奖，认为刘牛是东胜一支强有力的剿匪队伍，指令各地要好好供给支持这支队伍，并任命刘牛为北区保安队长，正式接了老刘队长的班。后来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表彰刘牛剿匪有功授与“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地方上的老百姓更是添油加醋大肆渲染，姿意赞美。有的卖唱要饭的人更是编成小曲歌颂刘牛。在土匪营中传也十分离奇，传说刘牛如何智勇双全，双手打枪，能打善战。而且刘牛此后与土匪多次的作战屡战告捷，一帆风顺。在打死土匪秃手杨后虏其妻作妾。所以土匪们听到刘

牛，无不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地方乡绅赵格、赵梁、王鼠鼠、武二以及韩院等，为了防匪抗匪倡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集资修建刘牛寨子。寨子建址添漫梁最高峯占地1200多平米。寨子里正面是供军队用的营房和办公室，东面是伙房，顺溜而下的是各家各户私建的躲土匪时用的房子，西南面为贮草场和马厩，西边一溜为刘家的房子和粮库，西北角有一个带套间的房子为刘牛的“公馆”。从此，只要有土匪袭扰，来刘牛寨子躲土匪的人，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就如过会，十分热闹。

#### 四、受训归来收勇士 刘牛打死康三三

刘牛打土匪出了名，声望日益高涨，他有个长处是平易近人，济困扶贫。特别是对于乡里年长的一辈，不管什么时候遇见，总是下马致候，问寒问暖。对于他手下当兵的战士，没有成亲的，

他都给找了对象，安了家。而且他也认为办学育才之重要。因此，他出资在寨子旁边兴办一所学校，聘请地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郭元信和王玉两位老先生为师，除让本家子弟入学外，邻里子弟，凡未入学者，都给免费。

一九三一年刘牛二十八岁时，就奉命去绥远省的归绥城参加地方保安队长的军事训练。训期八个月，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知识，战略战术，提高了他的军事素养。毕业归来后，知识与体魄同时增长，变成一个黑红壮实的小伙子。

这时远近地方，甚至敌人营垒里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而且凡来投奔者多为饶勇善战，百发百中的勇士。如齐起世、高得亮、崔诚厚、杨外、柴伟伟、苏长命、韩润驹等，都是一把好手。最后从土匪康三三营队里盗康的大黄马、二黄马两匹“千里驹”式的坐骑，归顺刘牛的孟金贵，更是一个才貌双全，拼命向前的人。刘牛受训归来后，也对自己的队伍展开了从队列式到骑步兵战术的系



统的正规训练。所以，刘牛的队伍之所以打土匪出名，真是以一当十，拼命向前，并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加上与附近旗郡的蒙古武装配合默契，每逢土匪来犯，总是鸡毛信疾飞，互相支援。

孟金贵改邪归正，以康三三的两匹坐骑为进身礼，归顺了刘牛。把土匪头子康三三气得暴跳如雷，他发誓要打死刘牛和“叛徒”孟金贵。因此，一年腊月临近春节，康三三公开叫战，要和刘牛决一雌雄。刘牛来了个将计就计，联合达拉旗、郡王两旗的蒙古兵共同抗击土匪。与康三三在羊场壕马莲圪卜附近两军相遇时，刘牛故意骑上康三三的大黄马，孟金贵骑上二黄马，在阵地上疾走冲杀。康三三一见眼都红了，因此他驱兵进击，大黄马名不虚传，快速如风，待到康三三露面时，刘牛故意装出逃走的样子，康三三死追不舍，刘牛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康的马就跑在刘牛的右前方，刘牛举枪射击，把康三三来了个前后穿心。康三三一死，刘牛的队伍一涌而上，土匪溃

不成军，四散奔逃。这次战斗，刘牛的威名震彻梁外。当时老百姓编山曲唱道：“骑上黄马转弯弯，刘队长打死康三三”。“眼又豁 眨，嘴又张，康团长活到这下场”。（形容康三三被打死后，土匪们张口结舌，眨眼无计的丑态）。

一时添漫梁的老百姓引以为荣地编了几句三不怕的话：“天不下雨有红龙①；土匪来了，有刘牛；得了病有杜医生。②”

## 五、送隔送旗 表彰功德

抗战前夕的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刘牛这风云人物，红极一时，威震河西。当地老百姓颂歌四起，趋炎附势者，无不以与刘牛攀附为荣。这几年由于刘牛打土匪出名，东胜四周的匪患也

①红龙——添漫梁的红龙王爷，属迷信的，

老百姓中十分相信，每逢天旱，求雨必“灵”。

②杜医生——是河南来的一个种花医生，兼看一

大为减少，加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出现了一派歌舞升平之象。刘牛走到哪里前拥后卫，夹裹一片，这些人中卫兵不过两三人，大多为捧场者，尤其在乡村的社戏会上，只要刘牛一到，会首们拣最好的位置给刘牛。而且，开戏之前，戏子们总是端上玉带凤冠为刘牛“加官祝福”。在鼓点唢呐的吹奏下，身着华丽戏装的戏子们在上走步祝拜之后，总要高呼：“给刘队长高升，给刘队长加官！”这时刘牛便命勤务兵把赏钱送给戏子们，好不威风。

地方乡绅们为了感谢刘牛“保佑”有功，就倡议为刘牛送匾、送旗，以表百姓之寸心。送匾、送旗两次活动前后相隔二三年，每次活动，热闹隆重。地方士绅长袍马褂、瓜皮帽与礼帽错杂辉映。前面有四人抬一对红底金字的大匾或一对大旗上写“万民爱戴”、“威震四方”等颂词，后面是成双的整猪整羊上插彩色纸花。刘牛的部队全着灰兰色的新军装，全副武装，列队来迎。

送匾送旗的群众，把刘牛簇拥在匾旗的中间，欢呼四起，鞭炮齐鸣，爆竹声声，欢天喜地，热闹非凡。到了寨子里，则大摆筵宴，饮酒作贺，整整一天。从此，每逢春节的初一早晨，“迎神”“出行”时刘牛的两对红旗，迎风招展，簇拥着刘牛，登上他家的高峯，威风凜凜，令人赞叹。

## 六、奇怪短工 陕北来人

刘牛军威大振，声望日高，各方面争取靠拢的人越来越多。一年夏锄时分，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来刘家要做短工。夏锄紧张，年年雇短工，正需要人，所以经过商谈，就雇成了。这两个人，白天和刘家的弟兄媳妇一起下地锄苗，晚上总要到刘牛的房子打开大烟盒，请刘牛抽大烟，天南地北地攀谈。后来日子长了，就与刘牛躺下共同吸大烟，并逐渐对刘牛讲一些红军闹革命的道理。奉劝刘牛以他之勇武精干，最好南下

投红军，将来定有光明的前程。刘牛听了很新奇，也很惊讶。怎么陕北的红军敢来这里作他的工作。其实并不突然，而是在一九三四年春刘牛因母病讲迷信许愿回府谷的海潮庵寺庙烧香时，曾结实了当地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韩峯并受到款待，也初步对红军有了一些了解。这次来的两个人还是前次的继续，其中的一个名叫王琪。但刘牛毕竟由于他的家庭和所受教育的限制，经多次考虑，认为他“深家大户”，不能只顾自己，万一他南下投共，他一家八十多口人就不堪设想了，因此，革命的火花终究是昙花一现，毫无作用。

## 七、抗日烽火 歧路徘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日寇得寸进尺，长驱直入。不久整个华北并绥远省凡属交通方便的地方都先后沦陷。日本人占领了平绥路的末端包头后，紧接着把势力

向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扩展，沿滩地带的蒙古上层人物一部分或明或暗先后投降了日寇。梁外地区，兵荒马乱不得安宁。国民党的杂牌队伍计有抗日将军马占山的部队，五十八军黎明军长的部队，新三师白海峯的部队，鄂友三的部队以及二十二军高双成的部队等。这些队伍的驻扎，使小小的东胜顿时红火起来。刘牛这时已被五十八军的黎明军长任命为第二梯队第九团团团长，要他招兵买马，扩充兵力。刘牛大肆招兵，但马匹无着，又无钱购买，所以手下一些目光浅短的参谋认为“乱世为王”，有人有马就有力量。因此，建议派人抓老百姓的马为战马，刘牛本人也认为“抗日救国”这办法也好。于是一连几天几夜把梁外地区的马抓了五六十四匹，闹得群众怨声载道，影响了这个打土匪英雄的声誉。

这年十月间达拉特旗的王爷府一个蒙古人与刘牛有交往的马之喜，偷偷地来到刘牛寨子，吹嘘日本人如何厉害，坦克、飞机、大炮无坚不摧。

同时又说日本人如何看重刘牛本人劝刘牛归顺日军。刘牛仍以“深家大户”的家族为重，犹豫不决。这时马占山将军的队伍在日本人占领包头后，退到五原临河一带，然后过河沿滩到了达拉特旗。只见沿滩达拉特旗的王公府地遍插日本的膏药旗，军队都挂膏药膀号。马将军见此十分痛恨，遂即让他的军队也带日军膀号伪装日军进入康王府将康王(济民)扣捕。同时也探知刘牛也有投日嫌疑，所以在扣捕康王往东胜走的途中将刘牛扣捕并电告五十八军黎明军长称：“贵部第二梯队第九团团团长刘导宽易帜投逆被我扣捕。”黎明军长得悉后，一方面派人前来东胜营救刘牛，另一方面令刘牛所部由刘永祯带领南下榆林接受编训。可营救人来到东胜时，马将军已开拔到准旗，刘牛也被带到准旗沙圪堵囚禁。

刘牛被马占山将军扣捕后，所属部队群龙无首，人心慌慌。又且都是出身伊盟，都不愿离开家乡，军队走到神木地方就哗变四散，各奔前

程了。

## 八、周排长看守“黑煞虎下界”

马占山将军扣捕刘牛后，让军法处审讯。刘牛承认自己与马之喜的往来。对马的劝降，囿于对家庭的顾虑和对国家民族的信念与背叛祖国当汉奸的可耻，投日并未形成事实。要求马将军调查事实，从轻处理。同时，东胜地方老百姓选派代表，上万人签名盖章陈述刘牛对地方有功，恳求马将军允保释放。马将军对此深有感触，遂给刘牛以优厚的生活待遇，将其单独囚禁，着周子林排长看守。起初，刘牛不戴手铐脚镣，只是一间小屋里坐禁闭，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尚可对付。日子长了，刘牛平易近人，落落大方风度，深得周排长的好感。于是对刘牛的看管就随便起来。他俩可以躺在一个枕头上抽大烟，可以倾心交谈。刘牛把他的一生简短地向周排长作了介绍，周对刘的胆略过人，英勇善战，十分敬佩。周子林



是辽宁人，他耿直厚道，迷信信佛，他供奉着一尊小佛像，晨昏焚香磕头摸拜，是一位虔诚的信徒。

据传，在刘牛被押一个月之久的一个冬夜，周排长一觉醒来，只见一盏油灯，灯苗如豆，半明不灭。他下地进里间去看刘牛，一推门只见刘牛身上卧着一只双目如炬的黑黧虎，他吓的倒抽一口冷气，退出去，再定睛一看，虎已不见，刘牛气息平稳，睡得正香。他轻轻地将刘牛摇醒，问他是否作梦？刘牛说，他未曾作梦。讲迷信的周排长从刘牛房间出来，十分吃惊，认为刘牛不凡，一定是“黑黧虎下界”。从此，额外敬重，并在生活上加意照顾，而且周走坐在作谋，应该帮助这一个不平凡的人脱险，也胜造七级浮屠。这虽是迷信传说，但说明周排长搭救刘牛的动机与决心。所以他有一夜悄悄和刘牛说：“马将军队伍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你也将随部队带走。”刘牛听后泰然处之，并不惊慌。他说既被囚禁，只得任人驱使。

周却认为到了山西前途难卜。他试探刘牛敢不敢越狱？刘牛不知周排长是什么心思，或在开玩笑。周却认真地说，他是实话。他想帮助刘牛脱险，要刘牛考虑。刘牛喜出望外，问他怎样计划行动？周排长斩钉截铁地说，“今晚就行动”。当天夜里周排长备办了一桌酒菜让看守刘牛的弟兄们痛饮一场，十来个人喝了三四斤酒。酒后弟兄们醉眼朦胧，昏昏欲睡。周排长让卫兵们都去睡觉，看守刘牛的事由他负责。到了后半夜，大约凌晨两点多，士兵横七竖八，酣声如雷。周排长带领刘牛悄悄走出院外，只见满天星斗，一片漆黑，他们仰观北斗，辨认方向，跳下一条深沟，然后顺沟速跑。大约跑了三四里路才听到后边有几声枪响。他们两人翻过几道沟，已筋疲力竭，汗流浹背，只得坐在路边休息，抽起烟来。这时东方渐渐亮起来，只听得有的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他俩警觉地躲在一个小沟里窥视，只见一个五十多岁老汉骑一头黑骡子，驮鞍鞴行李看相

当富有。当这人走近时，他俩从沟里出来拦住骑骡人要求骑骡人送他们一程。骑骡人翻身下马，见这两个人的衣服穿着不是一般老百姓，就探询地问道：“你们是哪里人？往哪里去？”刘牛见此一人一身正气，老实憨厚，就以实相告：“我姓刘就是东胜打土匪的刘牛，他姓周是周排长。请问您贵姓？”那人一听显出一副惊喜的样子：“啊！您就是刘牛？早听说了也真想见您，只是无缘高攀。我姓吕，我是要给我的大女儿聘女行礼，既然这样我就不去了，我可以送您一程，但不知您要到什么地方去。您怎么到了这个地方？”刘牛将他被马占山将军扣捕的事简要说了一便，并说请老吕把他送到高家岩蒙名叫董葫芦的白营长那里，因为白营长与刘牛厚交。白营长见刘牛脱险出来，十分高兴，设宴招待后把刘牛安排在自己的寨子里，由两个连的兵力保卫。

## 九、日本人攻打东胜 刘道宽勇敢参战

过了春节，古历二月的一天，是一九三八年的三月十一日，日本人配合森盖的蒙古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在一个夜里沿喀什浪川直至东胜城东碾盘梁和进而占领了东胜城东的东炮台（今雷达站所在地）向城里发炮轰击。守军二十二军的李涵芳营长奋力抵抗，接着东胜城南敖包图驻扎的刘营长调兵支援，迂回敌后，抄其后路，前后夹击。李、刘两营长的部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主要目标是夺回炮台，在这一场争夺战中李涵芳营长亲自指挥，直扑敌人脚下，使其大炮无能为力，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以大刀与鬼子拼杀，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终于攻下了这个据点，而李营长的一营人最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中华民族的抗战健儿以鲜血保卫了东胜。

日本人攻打东胜的当夜，刘牛所在的 高家

岩，就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探知是日本人打东胜的消息后，刘牛异常兴奋，认为保家卫国立功的机会到了，他要求白营长支援他一部分人马，他去东胜与日本人作战，白营长给了他一个连，交刘牛带领火速赶到东胜，经联系后李涵芳营长把刘牛的军队布置在城北瓦窑渠一带与部分杂牌军配合，对日军展开激战。第二天，梁外地区的各个杂牌军分头助战，从各个角落一齐向日本人开火。当时刘牛计划从喀什浪川东西两山的险要地带扼守，堵死日本人的退路，而全歼之。可是由于东胜的二十二军主力伤亡过甚，杂牌军失于统一指挥，结果第二天下午日本人退却时，仍由原路逃跑。这次东胜保卫战刘牛表现英勇，指挥有方，受到二十二军的表彰。又得了几十支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出箱的汉林冲步枪和一些其它枪支弹药与军用物资。从此又奠定了重振旗鼓的基础。

## 十、王伯谋拜见 张步程自毙

东胜保卫战胜利之后，刘牛才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天，二十二军派来一个支队长王伯谋拜见刘牛。王伯谋陕西蒲城人，军人出身，他受军长高双成之命来见刘牛。刘牛设宴招待了王伯谋，席间宾主举杯互相祝贺，王伯谋伸出大姆指称赞刘牛能征善战，并说明军长高双成的仰慕之情，要他参加二十二军组建的第三支队，任他为二大队长，统辖四个连的兵力。刘牛当即答应。

刘牛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他那些在南下中失散的旧部，纷纷前来看望并要求重新跟随刘牛当兵抗日，如齐起世，杨外等，后来又来了一个在马占山将军的部队里当兵的二十二岁的东北人袁春礼。刘牛招兵十分成功，很快就招收了四百多人，他的大本营是他的寨子。

一九三八年腊月底，老队长张步程从达旗滩上驻地回家过年的途中来到刘牛寨子。刘牛对

张步程很尊敬，因为张步程与他已故的四叔父是结拜弟兄，素以叔侄相称。刘牛设宴款待了张步程后，就离寨回家，安排了他的堂弟刘永祯陪同过宿。当晚睡觉时，张步程与刘永祯和地方绅士郭八以及他的两个贴身勤务兵焦绵羔和金三小同屋。睡到夜半时分，突然一声枪响把大家从梦中惊醒，刘永祯紧挨张步程，马上点灯察看，只见张步程在血泊中呻吟，心窝部一个弹孔上穿后颈部出去，一股股地往外喷血。刘急忙扶起张步程高声问道：“拜爹，你这是怎么啦？！”张步程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叫我的几个勤务兵都来，你们听着，我是因为心口疼用手枪顶心口走火的……我不行了，你们回去告诉继雄，我的死完全是自己走火，与刘家无关……你们都听着，我死了，埋了就算了，千万不要胡猜乱想……要好好和刘道宽搞好团结……我们世代相交……”。张步程说一句，刘永祯在旁用纸笔记一句，最后，张步程就与世长辞了。张步程的几个

勤务兵金三小等有的备办后事，有的回家通知张继雄。刘牛虽然向张继雄作了明确的交待，且有东胜县公安局的验尸证明，也有他父亲临终遗言的笔录，但张继雄从此耿耿于怀，觉得他父亲之死与刘牛有关，其实这真是一桩奇冤，张步程之死纯属自己走火身亡。再说刘牛要杀张步程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可以，他再傻也不能在自己家里刺杀张步程的。

## 十一、驻守新城 张王密谋

一九三九年初，二十二军已将达拉特旗沿滩地带的日本军，除大树湾之外，全部扫清。由二十二军一、二、三、四、五等支队占领驻守。三支队的驻地在王爱召，刘牛的二大队在新城驻守。站在新城的城墙上可以遥望黄河对岸往来于平绥路上的一列列火车。

刘牛驻在新城紧靠河口，为了对日本人的封锁和防止汉奸特务的活动，口岸各点都派兵把



守，与日本军的几次接触都有斩获；卡缉走私商贩也颇有收获。所以刘牛日益趾高气扬，显得骄傲起来，言谈之间常有扬才露己，鄙视别人的话语。有时竟连自己的顶头上司王伯谋也不在话下。这些形迹王伯谋早有觉察，苦于无计对付。王伯谋为了考察与控制自己手下各个大队长的言行，从各大队沿河驻防以来，就早已将自己的耳目或副官、或参谋等安插在各大队长的周围，同时专门窥伺刘牛的言行，而经常向王伯谋秘密汇报。

张步程的儿子张继雄，自从张步程在刘牛的寨子自己手枪失火身亡以后，总是念念不忘，总认为他父亲是刘牛杀害的。张步程虽然与刘牛“叔侄”相称，但两人之间是有些嫌隙：一是“七七”事变日本人占领包头后，在东胜的邢宝鸿县长看到日本军的侵略气焰，吓破了胆。认为东胜迟早也要沦陷，所以他在逃走时要带东胜县公安局的全部枪支南逃。当时地方保安团队刘

牛、张步程等，提出这些枪支是东胜地方用东胜人民的钱买来的，不让邢宝鸿带走，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将邢县长周围和东胜公安局的全部枪支给下掉。邢慌忙逃走，地方保安团队就将这一部分枪支分掉了。分枪的过程中，刘牛认为下邢县长的枪他出力最大，应分好一些的枪支，张步程等则主张好坏搭配平分。而刘牛则仗自己年富力强，就由他主持分划了。结果张步程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的过去了。其二是，在日本人攻东胜失败后，东胜地区的国民党各部队随着日本人的退却，尾追下去，将达拉特旗沿滩地带凡是投降日本人的蒙古王公府第全部剿平，一次在攻打一个王公府时，刘牛的勤务兵刘宝成在战乱中逮一匹墨黑的好马，可刚刚到手，此马又挣脱缰绳跑掉，被张步程的勤务兵焦绵羔抓住，刘宝成紧紧追去，两人在争夺的过程中刘宝成掏出手枪硬逼焦绵羔放开，将马拉回，作了刘牛的坐骑。这些事张步程都忿忿不平，但都忍过去了。因此，

张继雄每见到刘牛耀武扬威，就感到全身不舒服，总想伺机报仇，但他在刘牛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为此，张继雄日夜焦虑不安，他突然想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就动用他家的黄金白银在王伯谋名下用心周旋，今天宴请，明天送礼。把王伯谋请到张家张继雄双膝跪地斟满美酒向王伯谋诉说他父亲被刘牛刺死于刘牛寨子的种种“过程”，要求王替他报仇。然后专人送上一包包的黄金银元。真是“白银买动黑人心”，王伯谋见钱垂涎三尺，而且又不断听到刘牛一些连他也瞧不起的傲慢形状，就此答应找机会收拾刘牛。刘牛旁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觉察王伯谋与张继雄近来的频繁往来，要刘牛小心，可刘牛性强，从不在乎，他认为他与王关系不错，不会有什么意外。

一九三八年秋，刘牛派便衣侦察到打死他四叔父的凶手张三友现在赵三脑部下当排长，家住达拉特旗南红桥。一天，他派他的堂弟刘永祯带领人马去扣捕张三友。张三友正在炕上抽大烟，

见有人马来到，以为是什么人来拜访他，他起来应酬。可是只见刘永祯等好几把手枪对准他问道是否张三友，张三友满口答应，并问他们是哪一部分？刘永祯说：“我们是刘道宽部下，特来府上请你到刘大队长处走一趟”。张三友说：“明白了，走吧！”同时给家里人说：“我欠刘牛家一条命，今天刘牛来要命来了，你们随后领我的尸首来吧”。说罢穿衣随刘牛部出来，两个勤务兵把张三友缚在马上就走。张三友被刘牛扣走，家里人飞报赵三脑，赵火速派人追赶，刘永祯等见有人来追，把张三友推下马去就地枪决。赵部听到枪声就停止追赶，半路折回。此事，赵三脑备文上报了王伯谋。王看了十分惊讶，认为刘牛此人太厉害了，多少年的旧事仍要如此了结。

与此同时，在大青山一带活动的八路军游击队也不时派人来新城与刘牛接触。一九三九年春从大青山八路军处来了一个姓孟的人，此人以商人模样出现，先后贩来一些刘牛紧缺的物品，后

来逐渐熟悉了就将抗日形势和发展前途以及刘牛的恶劣处境都向刘牛讲清，并要刘牛拉队伍上大青山与八路军一道打游击抗日。刘牛听了很有道理，他感到他再不能以“深家大户”自误了。他决心不顾一切投向光明。他把这件事托给他的堂弟四连连长刘永祯具体办理，最后商定在七月底一天夜里刘牛带部乘船过河，八路军在对岸接应上山。首先就着刘永祯备办渡河大船三十余只，隐蔽在南岸的芦苇丛中待命。

## 十二、关三台告密 王爱召枪声

一九三九年入春以来，王伯谋几次想要借机收拾刘牛。有一次调刘牛来王爱召开会，会后，王伯谋手下的一些人拿出许多新手枪要给刘牛，要刘牛本人和他勤务兵都把旧手枪放下换新手枪。老实的刘牛不以为然，就解枪时，他的贴身卫兵袁春礼和排长齐起世感到情况不妙，各自将二十响的盒子枪拔出在手，并向刘牛使了个眼

色。刘牛突然醒悟说：“谢谢支队长的关怀，我和我的弟兄们这一批枪现在还好用，不必更换，请给缺枪的兄弟部队吧”。王伯谋的人一见刘牛和两位战将拉枪在手，又且刘牛说这些话，就顺水推舟地说，那就以后不好使再换吧。离开王爱召后，他手下的卫兵们把刚才发生的事说给刘牛，刘牛很强，也自信不会发生什么事，反而认为他的卫兵们神经过敏，他总认为他与王伯谋平日无怨无仇，怎能会有异心？

古历六月初刘永祯已把与八路军姓孟的人联系的安排决定都向刘牛作了详细汇报。刘牛要他不动声色，绝对保密。同时决定他回家安排后，归来再走。这时王伯谋收买了刘牛手下的一个小兵关三台，要他注意刘牛的言行，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并答应将来要给他一个小官儿当。关是睡思梦想要捞个排连长干干的人。有一天关三台突然听到一个弟兄说河畔集了二三十支大船，是四连连长刘永祯调集的，不知是什么意思？关听

后马上给王伯谋作了汇报，王伯谋认为刘牛有渡河投日的企图，再加张继雄一再要求报仇，这正是收拾刘牛的好时机。刘牛回老家一连住了七八天，在夜静的时候与家人悄悄说知他今后的行动，有抗战初期马占山将军扣捕的教训，这次选择正确道路应该走下去。

刘牛回家的消息王伯谋随时就知道了，于古历六月初十王伯谋打发快马到刘牛家送来一封急信，要刘牛在归途中来王爱召支队部一趟，有要事相商。对这封信刘牛身边的人都有警惕，认为王伯谋从来送公文都是到大队部，这次直送到家必有蹊跷，要刘牛不要去，先回新城多带人马再去。可刘牛生性很强，他坚信他在王伯谋名下问心无愧，所以决定走一遭。古历六月十三日他带贴身卫兵四五人经王爱召回新城，途经什拉台，他岳父家打间宰羊吃饭后，又踏上往北的大路。在孤子梁马儿正走欢的时候，路旁有一个碾骨碌后突然钻出一条白狗。他的马经战火并驮过他四

叔父的老坐骑大青马受惊一躲，把刘牛摔在地下。这是刘牛骑此马以来第一次跌跤，他不以为然，继续上马往前走。到了王爱召是下午四点多，王伯谋知道刘牛到来故意躲起来，让手下人接待。王伯谋手下的一个姓张的排长来接待刘牛，倒茶递烟，刚开始寒暄时突然拉起了防空警报——日本人飞机来轰炸了。大家各自逃散钻防空洞时，刘牛身边的警卫也散开防空去了。这时刘牛正要藏身时，突然两支手枪同时对准了他的太阳穴。“不许动”同时缴了刘牛的枪，与此同时他的几个警卫也同时被下了枪。刘牛大发脾气要见王伯谋，这是什么意思？他有何罪？都要回答清楚？死也有个明白。回答是“支队长不在，事情只有支队长本人知道，待支队长回来再讲”。同时手铐脚镣都给带上。刘牛独坐静室暗自思量：莫不是上大青山的事暴露了，他思前想后认为此事绝密，除他本人和兄弟刘永祯以及姓孟的人外，绝无第四个人知道。他又想到平常人



们传说张继雄与王伯谋来往密切，这时才想起了张步程死在他寨子上的事。今日被扣乃是王伯谋、张继雄密谋报仇的结果。他遭这~~不白之冤~~有口难辩。唯一可望的是他的两个好朋友二支队长王永清和五支队长段宝山两人前来搭救。所以见在三支队当秘书的李澄路过他的门口，就悄悄地告他速发急函通知王永清、段宝山从速营救之事。李澄与刘牛同是东胜人，又是自幼好友，所以李澄本来也是要看看刘牛，但监禁甚严，才假装路过门口与站岗兵说知和刘牛说了几句话。

这时，王伯谋在他的房子里开会商量对刘牛如何处置的问题。王伯谋说：“根据我几次调查张步程确系刘牛所杀，他侮慢上级，不可一世，且有投日举动，已经军座批准将他扣捕，如何处置，大家发表意见”。有的说，刘牛有“投日举动”没有证据，他集船可能是要过河打游击；有的说，还不如先解送榆林坐禁闭，施以教育，然后看其表现如何再处理；有的说，就在王爱召

监禁请示上级发落。这时有一个副官戴××说：“刘牛这只老虎，既然捕获，只能速杀，不能拖延，更不能放还。此人地方上声望高，势力大，而且他记仇心很强，君不见他最近打死张三友？这是十几年前的旧事，是为他四叔父报仇。请支队长恕我直言：“你如果不马上处理他，待到明天就有人来说情搭救。你把他放了，他决不会感谢你活命之恩，而是此仇非报不可。说不好听话，如果放了刘牛等于放虎归山，你王伯谋是不会生还你的蒲城的。因此，只能今夜干掉，千万不能留待明天，更不能放回新城”。一席话提醒了王伯谋，决定当夜枪杀刘牛，为了免除新城方面的动乱，又速派兵将刘牛两个亲信连长刘永楨和贺文明扣回。

古历六月十三日星夜，月亮高挂天空，群星闪烁，山峦沉默，万籁俱寂，大地沉浸在一片乳白色的夜雾之中，王爱召的三支队营房上十几把铜喇叭嘹亮齐奏，响成一片，这时刘牛身戴镣铐走

在十几个士兵之间向前面的沙梁走去，他自知这是他最后的时刻了，他以仰望苍天喊了一声“冤枉”！一声沉闷的枪声响后，刘牛倒下了！这个半生叱咤风云，戎马倥偬，冲锋陷阵的抗匪英雄，竟这样默默地倒下了！真使他壮志未酬，抱憾终身。

刘牛的死是冤枉的，刘牛的死也是感天动地的！古历六月十四日晨，全伊盟竟落了一场重霜，将玉米、豆角、山药、黑豆等夏田作物全部冻死！因此，迷信的农民更相信刘牛是有“天星”的人，怎么能在初伏天气出现“感天动地六月雪”呢？其实只不过是伊盟反常多变的气候之巧合而已。

## 后 记

刘牛短暂的爱轰轰烈烈的一生就此介绍完了。我作为刘牛的一个曾经和他一起饮食起居数年的侄子，许多事情是我目睹的或事后听刘牛在内的

老人叙述的。全部记述都是凭借与刘牛同时代的人的讲述和我自己的记忆。故事的全貌是真实的，遗漏的不少，过头的没有。限于时间和访问局限，以及个人文字水平，仅能提供一个地方人物的史料而已。如果说这点文字可以还一个人的本来面目的话，那我就安心了。

# 我是怎样当选为国民党国民代表 大会候补代表的

郭岐山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沟地区，土地瘦瘠，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风调雨顺，居民尚能得以糊口，若是遇上灾年，群众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因此，多数人家的儿童上不起学，即使上得起学也没有教学的老师。只有当地个别有钱的人家，才能从陕西神木、府谷两地聘请来识字的人当老师，办个私塾，供他们的孩子上学。

上一个冬学需要给老师缴纳的学费计银币一元、米五升、麦粉五斤、猪肉五斤、油或酒一斤、水烟一块。所以，贫苦人家的儿童哪能上得起学呢？我的前辈们能识几个字的寥寥无几，每

年春节都要东奔西跑的请人写对联。我的家庭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到了九岁时开始上冬学，一连上了三个冬学后，才转为正常学习。在私塾里所学的课文是“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千字文”、“四书”、“诗经”、“易经”等书。到了十五岁，我上了公办小学。小学毕业后，报考了包头中学，仅上了一年，遭遇“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绥包相继沦陷敌手，我也由此而失学，回到家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入冬后，我主持办了个私塾，教十几名儿童学习度冬。由于包头与达旗沿滩地区毗连，所以我的家乡又成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有不少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杂牌军云集在这里。当时我认为，抗日是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只有抗日才能有出路，所以冬学结束后，我就到伊东游击第三支队当兵。当了一年多，我感到杂牌军缺乏训练，军纪不振，在这样的军队中呆下去是没有多大出息

的，还不如另找他途为好。所以，我于1940年冬脱离了这支队伍，请假回到家中从事农业生产。

1941年春初，达旗第二参领龚寿山、粮台主任孙岐山（粮台的业务是向当地群众征集粮食，然后供给抗日军队）让我去粮台附近办个小学，吃的暂由粮台供给，至于薪金多少待请示达旗保安司令马子礼后再议（马子礼是达旗康王的部属，康王投日后被国民党马占山的军队俘获解送重庆，马子礼弃暗投明，率部反正，任达旗保安司令兼管旗务）。但直到夏季放假还未得到批示，这样我就白尽了几个月的义务。暑假后，我又到了包头游击县政府找了个小学教学。在此期间，该县的区长、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谢兰田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他对我说：“只有加入了国民党才有前途，不然以后就连保甲长也当不上”。这也是我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之一。

1942年1月，达旗民众组训处成立，处

内设民、财、建、教等办事机构。农村设六个大队（也就是乡保甲制度），四所小学。学校极其简单，校长与教员独人制。我承担了一所小学，名曰万盛泉小学，开学后，当年来上学的儿童有三十多名，第二学期开学后，报到上学的儿童就增加到百余名。此时，我向组训处长崔振孝要求增派教师，但由于师资缺乏，只给派来一名。以后我又多次向组训处提出要求，继续增派教师，但处内没有师资来源，无法增派。于是，我就给在伊盟中学上学的胞弟郭嵩山写信，让他代聘几个老师，巧遇伊中放寒假早，他就给我介绍来几个体寒假的同学。有这些同学来当老师，就给学校增添了新的力量。对这些人的待遇是，组训处只供给吃的（每月一斗五升小米），不给薪金。这些人都是寒假休息的学生，而且大部分家中都不富裕，所以只要给吃的就行了，给不给薪金都不以为然。从此，这个高小班成绩日益显著。组训处长崔振孝就将情况上报第三行政专员公署，



专员公署又转报绥远省教育厅。时隔不久（1943年1月），教育厅批准组训处万盛泉小学为完全小学，从此学校的教师和工友人数也就正式确定下来了。教师的薪金和学校的其它费用由地方筹集供给。

1943年春，绥远省政府委派贾克让接任了组训处长的职务。贾到任后，将原来的六个大队改编为十二个中队（实则是十二个乡），给所有的中队都设立了学校。原万盛泉小学为处立中心小学。该中心小学由于成绩优良，在当年夏天获第三行政专员公署通令表扬。

1944年元旦，组训处举行了各小学奖学金考试和体育运动竞赛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处立中心小学的成绩又名列前茅，并且获得了国民党暂三军军长孙兰峯先生的奖旗和第三行政专员公署的奖旗。从此以后，偏远乡的学龄儿童来中心小学上学的也日益增多了。

1945年春，组训处长贾克让把我调离中

心小学，分配在行政上工作。在行政工作期间，历任乡长、乡指导员兼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保安骑兵二十团副连长、组训处自卫团长等职务。这一系列的职务给我打下了当选国民党的国大侯补代表的基础。

1947年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具体办法是在它所辖的区域内，每个县市都要选出国民大会的代表。参加竞选的人必须是政党提名或有五百选民的签署，才有资格做为代表的候选人参加竞选。我参加竞选时政党提名和选民签署两项条件均具备。

绥远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所属的东胜县、桃力民办事处、达旗组训处也需要选出代表，但达旗组训处、桃力民办事处不是县制，没有选举代表的资格，恰值东胜县人口较少，所以就把桃、达二处的选民并归东胜县合选代表。在选举时，东、桃、达各为一选区，各选区又以乡为单位分设票箱。投票结束后，将票箱送回各选区开箱公

布自己选区当选人名单，最后由东胜县政府报送上级核批。按照选举情况和上级审批，公布了正式代表高朗峯（东胜人），第一候补代表郭岐山（达旗人），第二候补代表姜吉祥（桃力民人）。出席这次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是高朗峯。按规定，正式代表缺席就由候补代表出席补缺。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后，我所在的保安团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包头军分区独立团，我任副连长，1951年提升我为连长。1952年5月，我响应号召转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 高广俊在十六团是怎样活动的

杜炳彦 王金虎

木肯淖属于东胜县的六台区，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党的地下活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对木肯淖的围剿。上级党为了保存木肯淖地区的力量，加强对木肯淖地下工作的领导，于一九四五年将云北峯同志从延安派到木肯淖领导我党地下工作。

云北峯同志到了木肯淖以后，广泛接触地方上有活动能力和上层人物。时间长了就和东胜自卫团的中队长、木肯淖乡的乡长王明星交往得十分好，在共产党活动比较困难的时候，王明星给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开路条和良民证，使地下工作人员在合法身份的保护下开展地下活动。当国民党要搜捕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时候，王明星

提前派人通风报信，保护了我们的力量。

一九四八年准格尔旗解放了，东胜县的国民党政府官员惊恐万分，把自卫队全部调回东胜，并把过去的自卫团改编为保安十六团，同时让各中队和区、乡的头面人物积极组筹扩充人马，云北峯同志乘此机会派地下党员高广俊（即高官子）到王明星的中队当了兵。

高广俊在保安十六团当兵以后，中队在东胜县敖包图驻防，国民党军队向当地的老百姓大量摊派粮草款项，抓民工应差，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的老百姓给不了摊派下来的粮草，当兵的去就哼鼻子瞪眼睛。高广俊同志看到这些情况，就在背后给士兵们做工作说，都是些穷苦老百姓不是不给，看来实在是穷的没办法，我看所摊派的粮草食物，有了咱们就拿上，没了拉倒。当时每户人家给摊派三斤葫油，有的人家没葫油给不了，高广俊跟老百姓说：“你们没有就不要给”。老百姓告诉

他，不给不行吧，如果不给，人家来了轻的哼鼻子瞪眼睛，重的不是打就是骂，甚至把你吊到二梁上。高广俊说：“万一不行，你们就把葫油和水掺起来给狗日的们，给一斤油内倒进二斤水不就成了三斤了！”

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政权，把凡是可疑的人都逮回去审问，问不出来的就严刑拷打，有的被打的遍体鳞伤，高广俊就利用晚上站岗的机会把逮回来的人放走。

高广俊经常把了解到的国民党军政情况，找各种借口到准格尔旗沙圪堵，向盟委进行汇报。伊盟支队政委高增培、副司令员高平等同志指示高广俊，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国民党内部的军政情况摸准摸细，同时要想办法做士兵和干部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顽固到底没有出路，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以免让子孙后代还骂他们。另外还告诉高广俊准备配合解放军解放东胜，让他做好思想准备。正当快要解放东胜的时候，由于国民党

严密封锁和交通不便等原因，高广俊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黄河流凌，东胜与包头无法取得联系，只能依靠县政府仅有的一部电话，国民党县政府向包头汇报东胜的情况，挂了好长时间电话才要通，但不是真正的包头，被中途接走，打电话的人抓紧时间汇报，汇报完包头方面告诉东胜：你们的汇报很好，我们是包头，庙是旧庙，可神仙不是旧神了，我们是解放军，今日早上×点×分解放了包头，缴获了大批汽车和枪支弹药。最后还说，我们下午×点就到东胜！闹了半天是给八路军汇报了情况，吓得打电话的人放下话筒就跑。

这天下午，解放军果然向东胜挺进了。五点钟的时候，解放军冲到了东胜东城外（现在的烈士塔附近），城内已是空城一座，守城的十六团早就吓得跑到不也门肯和色连一带。解放军没有追击，而住进了城里，相持三天到第四天晚上，十

六团团长集合队伍讲话说，根据咱们派出去人探听，八路军明天就要离开东胜，现在根本不守城门，步兵打起了背包，骑兵马没下鞍仗，咱们准备一百多名精骑，在拂晓的时候向城墙上打几枪，这样八路军走了，我们一方面可以向上邀功，另一方面我们也好进城，不然的话让老百姓说我们，八路军来了你们吓得跑了，八路军一走你们又来糟踏老百姓了。

这天夜里是半夜到的东胜，打了几枪以后，十六团又退到色连原地休息。根据探听回来的人说，八路军从南门出城向准格尔旗的方向走了。

十六团的偷袭，激起了解放军的极大愤怒，太阳刚出头解放军骑兵和步兵配合跟踪追去，追到色连时十六团有的刚吃了饭，有的正在吃饭，见八路军追来，丢下饭碗就跑。解放军紧追不舍，追到平台庙的北梁上接了火，战斗一开始就打死了团直属警卫队队长辛开其。追到补芦沟将步兵全部俘虏，骑兵跑到问家湾集齐后，内部分



崩离析，怨声载道，有的怨指挥不灵，有的怨士兵打仗不坚决，大部分骑兵要求逃往扬七寨子。高广俊乘此机会说：“在野外打仗，我们能打到这么个程度还算不错，我们的步兵让俘虏了，骑兵跑了，这样对不起我们那些步兵弟兄们，我们还应该打，不然的话让人家外人听见笑话咱们，骑兵有腿吓的跑了，步兵没腿让俘虏了，我们应该返回李飞雄寨子，利用掷弹筒和机枪，凭借寨子的优势地形，还能给步兵弟兄出口气”。团长听了他的话感到有道理，就命令部队进李飞雄寨子。大队长杨文煥首先跑到寨子里，并派一名副大队长持枪向士兵威胁说，都进寨子，谁敢跑，我一枪就打死谁。在他的威胁下，百余名骑兵全部集中到这个破寨子里。

解放军见骑兵全部进入寨子，就从四面把寨子紧紧地包围起来，向寨子边沿打了几颗八二迫击炮。炮一轰，敌人内部乱作一团，有的亡命之徒主张还击，有的士兵主张不打，就在七嘴八舌

没有主意的时候，高广俊对一些士兵说：“我碰到组训处的俘虏兵说，八路军不虐待俘虏，愿意当兵的就当兵，不愿意当兵的发给路费回家，我看咱们也不能打了，人家武器这么好，再继续打下去，咱们都是死，还不如及早投降留条命。再说即使杀，也只能杀一两个当官的，咱们当兵的是绝对不会杀的”。经高广俊这么一说，好多士兵都向当官的请求不要打了，再打都是死，不如投降。在大多数士兵的强烈要求下，团部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协商后同意投降，决定派一名连长或排长出去和八路军商量，但连长和排长谁也不敢出去。高广俊就自报奋勇说：“我这个人就是去了不知道跟人家说个甚，我倒是敢出去”。团长听到后很高兴，并教给他说：“你出去后就说，我们准备投降，让八路军停止火力”。高广俊从拿指挥旗的人手里夺过旗子，从寨子的西南角跳下去，边摇旗边爬行，快到解放军跟前的时候，指导员云成烈认出了他，跑上来迎接他，并

告诉他司令部的驻地。高广俊用了十来分钟的时间，翻越了两座山，跨过了两条沟来到了司令部，见到了政委高增培、副司令员高平，政委高增培说，打仗之前没有和你联系上，都以为你牺牲了，我们看见从寨子里出来摇旗的，估计就是你还活着，不然的话敌人说什么也不敢往回返了，肯定是你给出的点子，好把他们一网打尽。

高广俊汇报了情况后，政委对副司令员说：

“那就下命令吧！只听一声号响，战场上枪声停止了，高广俊带领解放军去李飞雄寨子俘虏了全部骑兵，缴获了全部枪支马匹，保安十六团到止灭亡。

# 国民党东胜县党部概况简介

陶立栋 李振华

解放战争时期，我和李振华曾先后在国民党东胜县党部共事。关于该党部的史料档案，一九四九年三月由原党部工友苗德明在他家烧毁殆尽。为给东胜文史征集工作提供材料，特将国民党东胜县党部的组建及其活动概况从实忆写如下，以供参考。

## 一、国民党东胜县党部的筹建及其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高光耀负责筹建国民党东胜县党部，当时仅雇用张存义一人开始活动，主要任务是在绅士、富户、机关、学校等中间发展国民党党员，宣传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和抗日防奸除奸等。第二次国共分裂后，中心任务转变为做防共反共

宣传。

## 二、东胜县党部的组成及其历任人员概况

一九四〇年春天，国民党东胜县党部正式成立，书记长高光耀，干事武克经、康逸山，秘书兼助干贺万选，助理干事靳贤、孟志永，工友郭富山，炊事员郝红。

一九四一年七月调出武克经、靳贤，增补李振华、苗德秀为助理干事。

一九四二年冬，高光耀调米仓县党部任书记长后，东胜县警察局长曹克让升任为东胜县党部书记长，并增高俊嶽为妇女干事。

一九四三年，曹克让仍任书记长，秘书、干事助理康逸山、孟志永、高俊嶽、李振华等。

一九四四年春，曹克让病故后，由秘书康逸山代行书记长职务，同时调出贺万选、苗德秀，增加周仰山为助理干事，李廷辅、王敬轩为指导员，苗德明为工友。

一九四五年，书记长康逸山，秘书李生瑞，干事孟志永，助理干事李振华等。

一九四六年春，书记长原由康逸山担任，调出周仰山、高俊嶽、李廷辅、王敬轩，增补陶立栋、张廷芳、周善修。

一九四七年冬，党团组织合并后，康逸山继续任书记长，张铭卿为副书记长，陶立栋任干事兼秘书，工友苗德明，其他（包括三青团人员）全部转调。

一九四八年夏，康逸山调省党部后，由张继雄任书记长，张明卿为副书记长，陶立栋任干事兼秘书，苗德明为工友。

一九四九年初，东胜已处于即将解放的动荡时期，党部人员全部转职归保安骑兵第十六团，因此，国民党东胜县党部的工作就此彻底停顿。

### 三、国民党东胜县党部基层组织建制情况

第一区党部设在罕台庙，书记苗德秀担任，

下设六个区分部：

色连区分部，书记刘海世；

土盖沟区分部，书记刘永厚；

罕台庙区分部，书记苏富；

龙胜兴区分部，书记郭八、戴玉玺；

九成功区分部，书记吕才；

阿卜亥沟区分部，书记张金驹。

第二区党部设在活羊兔寨子，书记由赵起盛、陶世英担任，下设十五个区分部：

板洞梁区分部，书记赵三、郝致源。

灶火壕区分部，书记边风章、李澄。

活沙兔区分部，书记刘永厚。

全和长沟区分部，书记尚德胜。

活羊兔区分部，书记陶润生。

活蝉塔区分部，书记郭文亮、李旺林、郭文治。

淖壕区分部，书记李凤鸣。

漫赖梁区分部，书记苏外、李桂林。

七盖沟区分部，书记杨恩山、赵青山、李廷弼。板洞门区分部，书记王文明、王瑞杰。

补连塔区分部，书记宋志圣。

补连梁区分部，书记武建义、王开明。

尔林图区分部，书记韩廷瑞、韩廷秀。

马秦壕区分部，书记张殿玉、张杰义。

万寿地区分部，书记不详。

第三区党部设在杨七寨子，书记杨霖山、张仲臻担任，下设区分部共十一个：

柴登区分部，书记崔三外。

板旦梁区分部，书记边静业。

石畔补龙梁区分部，书记王耀文。

石股壕区分部，书记吴锡、赵留林。

山炭庙区分部，书记李明山、高连。

泊江海子区分部，书记赵继武。

特拉区分部，书记杨文焕

杨七寨子区分部，书记李外生、王怀礼。

漫赖区分部，书记张海鱼。



特并庙区分部，书记何世明、苏玉山。

大康巴区分部，书记王明星。

桃力民区党部设在母花儿稍，书记苗同春、  
阎杰生担任。

组训处区党部设在耳字壕，书记杨秉明、郭  
岐山担任。

桃力民及组训处两区党部所辖区分部不详。

直属区分部共十三个，管辖原北区、城内、  
各机关学校等，分别有：

第三专员公署区分部，书记郭良田、薛华  
亭。

东胜县政府区分部，书记李盛林、乔占英、  
余思源。

党团区分部，书记孟志永、杨居仁、

商务会区分部，书记李向武，张雷申、刘德  
安。

城厢妇女区分部，其人选不详。

郝兆奎区分部，书记折毛女，郝二毛。

营盘壕区分部，书记张方树。

巴彦门肯区分部，书记杨银柱、张进才。

羊场壕区分部，书记王留柱。

郝家圪卜区分部，书记郝致成。

旧庙沟区分部，书记麻富其、麻万林。

特拉壕区分部，书记李生芳、王根亮。

水桃沟区分部，书记刘润月、刘国宾、刘治方。

#### 四、组织整改及党团合并简况

一九四六年夏秋时期，国民党东胜县党部全面进行过一次党员甄别活动。其主要目的是要清洗掉少部分老弱病残和不健康的党员，包括有共产嫌疑的分子。甄别后保留的党员和合并接收来的三青团员共计有三千四百多人，设区党部五个，区分部四十五个。

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东胜县党部奉命召开过党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选出国民党东胜县执

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东胜县监察委员会，选举康逸山、张继雄、李先唐、李振邦任李成、李立、李瑞、苗德秀等为执行委员，康逸山任执委会专职书记长；选举陶世英、张仲臻、李生瑞为监察委员。党部由此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东胜县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东胜县监察委员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国民党员代表有四十多人。

一九四七年冬，抗日战争胜利后，三青团从上到下想脱离国民党的领导，另立山头。中央党发现当时如此严重的分裂趋势，立即实行党团合并的措施，以此彻底取缔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制。

党团合并之后，中央党专门设立了一个青年部，由蒋经国担任部长，赵仲容任副部长。东胜县党部也增设了一个青年干事，由张守宽充任。

# 解放前夕伊盟的灾荒与救济工作

王森柳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即发动了全面内战，就在国乱当头，烽火遍地的時候，伊盟广大地区连年遭灾。特别是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的大灾荒，更使伊盟各族贫苦百姓饱受天灾人祸之害，生活无着，苦不堪言。

一九四七年，伊盟连续发生了严重的旱、涝、冻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土地荒芜，粮食基本颗粒未收，加之兵荒马乱，民心不稳，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牧民，因不堪忍受困苦，受饥饿所逼，便纷纷奋起，爆发了抢粮事件。抢粮事件中，规模较大的发生在两处。一处是抢马场壕的王祥邻圪堵粮站，一处是抢盐店的魏家梁粮站。当时，两个粮站附近的灾民，各自聚集起来，拥

到两个粮站声言要抢粮活命。两个粮站的负责人听到饥饿的群众要开窖抢粮，早已逃之夭夭，吓得不敢露面。因此，灾民们拥到粮站，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任凭驴驮人背。事发以后，粮站的负责人才报请所属县处和专员公署，请求处理。后经法庭调查，两处抢粮事件，实在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便决定所有参与抢粮户都到该粮站申明所抢的粮数，订正核对清楚后，责成各抢粮户待秋后如数归还粮站，这两处抢粮事件就此了结。

一九四八年，伊盟遭受了更大的灾荒，是年先旱后涝。旱得赤地千里，不仅草不能生长，连梁上的沙蒿都枯死了。农业地犁插不入，粪堆未动。养牧户院内房顶整体牛羊腔堆晒得很多。牛羊牲畜尸骨遍野。人们吃青草，剥树皮。有个老婆婆从山药地里拣吃干山药，连山药上的泥土都生吞了。长期饥饿，使不少人先浮肿，后丧命。当时饿死的人的确切数字已经难以统计。现在记得

的，象东胜孝友乡郭栓狮，不彥门肯杨树林家中的小孩，府谷人刘罕宁等都是毙命于饥饿的。由陕西神木、府谷、山西河曲到伊盟逃荒，饿死在路上的也屡见不鲜。耕畜无草料，疲累至极的牛卧在犁场上就起不来了。

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许多人举家颠沛流离，外出逃荒，尤以神木、府谷一带的人居多。逃荒者中不少妇女迫于生活，或改嫁，或随便跟人走了，还有的妇女随着汽车司机来往乱跑。东胜县府的科长刘子后，专员公署保安队分队长刘太仓都从难民中各引回一个妇女。

在这种情况下，东胜县县长贾克让和驻伊盟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张国林商讨解决办法。商量结束由专员公署召集河西三县处（东胜县、桃力民办事处、达旗组训处）负责人，地方绅士，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共同解决灾荒问题。经过会议研究，决定火速派员前往绥远省政府要求赈济。经多次催促，并经省方查明伊盟灾情后，方

由善后救济总署拨了救济款、衣物、布匹等财物，进行救灾。这些钱物都随员发放农村，东胜县是由李直哉监发。款物下来后，名义上是发给灾民的，但各级官员中饱私囊者甚多。发放的衣物，每到一机关，官吏们就把好衣物拣走，真正发到广大农牧民手中的只是少数赈款和残旧衣物。

在救济衣物中，其中有美国发来的一部分救灾物资。美国的这批物资，由四名美国人和一名翻译，随同我国绥远省善后救济总署发放的衣物一次运来东胜县府。为此，伊盟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特意举行了茶话会，各单位官员三十多人出席陪同。美国的这部分物资由善后救济总署监督发放，善后救济总署指派李直哉监督，县府委托参议会人员配合。美国人来东胜送救济物资，乘的是大卡车（载重三万斤），在东胜住了五天，把物资分配完就走了。

除钱款衣物外，还有救济粮。发给伊盟的救济粮共一千六百石（每石以三百斤计），由绥远

省直接就分配了。东胜县五百石，桃力民五百五十石，达拉特旗五百五十石。到省府领粮的人，东胜县派的是会计主任王森柳，达拉特旗是警察局长郑明道。省府要求救济粮一次全部领回，并由省里讨论订立了十条规则（包括接送粮食时间、地点、运粮办法、发放原则等）。根据规定，这些粮食一律拨到后套五原县粮站，由省里调用大量汽车限三天时间把一千六百石粮食赶到包头河畔，再用三天时间发动渡口全部舟船再运到河西大树湾河畔。领粮的人据此在省府给各县处打回电报。每县处又派有管理能力的负责人到大树湾河畔接收救济粮，并负责收存发放。为了顺利接收粮食，还向省方借了两支大帐篷，苦粮和人住。一切就绪，果然在七天之内把一千六百石粮食全部运到了河西大树湾河畔。县处派出的接收负责人立即分配出给各乡、保应领的数字，由各乡、保自行筹马、驴、车驮运，直接交给每户灾民食用。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用半月的



时间，大部分粮食都分发出去了。就在最后还剩下了一小部分的时候，赶上了下雨。这场雨不停地整整下了四十天。高处的庄稼被冲毁，低处的庄稼被淹没，到处沟渠河叉洪水长流，东胜城内街道上积水横溢，向城外放不出去。城内房屋倒塌一百七十多间，县府的砖瓦房漏得办不成公，不少居民烧不成火，吃不开饭。结果，东胜县的救济粮有一小部分雇用汽车一次拉完，不想拉在半道罕台，大水迎面冲来，载粮汽车中有一辆陷于泥潭之中。等水过以后，掏出来拉回东胜县府，已经淹湿。经过多日晾晒，还有些霉坏，最后也分给了灾民。总之，这一批救济粮、财物，对伊盟人民起到了扶危济难、减轻灾祸的作用。

就在大雨四十天的期间，还发生了水冲刘国宾粮站的事。刘国宾粮站在东胜城内。由于该站所收的粮食没有入窖，存在库房内，房子不坚固，连绵大雨，仓库倒塌，库里的粮食被雨水冲了出来，满院都是糜子，整库的粮食将被冲掉。

公署专员张国林亲自带领一批人和县府管粮人员冒雨进行抢救。把去门口子用大柴堵住，不让雨水把粮食冲走。还经过研究请城防二十二军部队的武力炮火（轻重机枪）对空猛烈射击了一个半小时，天还真晴开了。刘国宾粮站仓库的粮食，经过翻晾，虽受水泡的影响，损失还不算太大。这些粮食后来供给了难民站。

东胜是包榆公路的要驿。由神木、府谷来的难民较多。青壮年人自谋生路串城就走了，剩下老人、小孩，饿得走不了，就留了下来。东胜县府和专员公署联合成立了难民站，由公署专员张国林兼任站长，东胜县府秘书王森柳兼任秘书，由难民中选一人担任副站长，办理供应难民的伙食等问题。难民站每逢一批老少接待三至五日，让他们在这个时间内自找生路，陆续收容，陆续打发。每人每天按二两五钱粮食计算，每天需供给小米二百五十斤至二百斤。每天开饭两次，由难民站做出稀粥供给。从五月份起到七月份，连

续举办了七十多天，共接收难民人数一千一百人左右，共吃小米七千三百多斤。待到伊盟地方雨后种上的庄稼收成有望，难民人数也渐趋稀少的时候，难民站才撤了。

一九四八年冬天，准格尔旗警备司令部闯入山西河曲县城，进行抢掠，扰乱地方安宁，返回准旗时，竟把河曲的居民在护城楼上一下子逮了四十人，把每个人都捆起来，又用长绳子连在一块儿，当做八路军的配合组织部分，要送交东胜警备司令部立功。押解途中，到了府谷一带冻死一人，带回东胜警备司令部时是三十九人，其中老的有六十多岁，小的有八人都**在**十五岁以下。这些人在路上走了几天，被捆绑了几天，捆得紧，受了冻，血脉不流通，人的手腕个个浮肿，有的绳子勒进肉里解不开来，有一半人冻得脚手流着血水。东胜警备司令部接收后，一来没有容纳人的地方，二来嫌麻烦，便把这三十九人全部交给东胜县政府收容，支持食宿问题。县府接收

后，逐一进行点名登记，哪里是什么八路军，都是些平民百姓，实属可怜，于是对这三十九人的食宿给予妥善安置，让他们住上暖炕，吃上饱饭。县府还特意将救灾衣物调出一部分给这三十九人每人一件，解决他们受冷问题。七天以后，用汽车一次把他们都拉到包头市，又转送呼市。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东胜文史资料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2 5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